



李聚奎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書贈李聖奎

陳雲  
時年八十



陈云同志的题词



一九四〇年时的  
李聚奎。



抗日战争时期，  
在冀东南与宋任穷、  
陈再道同志合影。



在军调部工作时，与李立三、伍修权同志合影。



建国后，陪小平同志、卓琳同志、张爱萍同志在解放军某部观看军事表演。



建国后，陪贺龙同志在解放军某部观看军事表演。



与李富春、王鹤寿同志在莫斯科合影。



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送王界石铺红一方面军  
 先遣队负责同志  
 李聚奎

西水外理佛烟  
 敬

敬者：读你们的来信，非常高兴。你们在艰苦的斗争中，坚持了红一方面军的革命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希望你们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而努力。此致革命敬礼。

李聚奎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李聚奎写给驻界石铺的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负责同志的信。

# 序

李聚奎同志约我为他的回忆录作序，我答应了。

一九四一年春，八路军前总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命李聚奎同志为山西抗日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从此我们便在一起战斗和共事多年。聚奎同志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参加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参加和指挥过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斗。无数次的艰苦战斗使他锻炼成为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我与聚奎同志开始共同战斗的一九四一年，正处在抗日战争最严酷的阶段。当时日军集中重兵多次向太岳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屠杀根据地的群众。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指战员与敌人浴血奋战，终于渡过了难关，赢得了胜利。对这段历史，聚奎同志在回忆录中作了详尽的叙述，我不再赘笔了。需要说明的是，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党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

聚奎同志的回忆录记述了他青年时期以及参加革命后的斗争历程，其中还回忆了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业绩。这本书对于青年一代进行革命理想和传统的教育，无疑将起应有的作用。

潘坡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六日

# 目 录

## 第一章 投身革命

- 青少年时期 ..... (1)
- 参加北伐 ..... (4)
- 南县闹饷 ..... (10)

## 第二章 平江起义

- “刑场练兵” ..... (17)
- 暴动前夕 ..... (21)
- 暴动成功了 ..... (27)
- 暴动之后 ..... (33)

## 第三章 留守井冈山

- 千里转战 ..... (38)
- 宁冈会师 ..... (41)
- 激战井冈山 ..... (45)
- 回师井冈山 ..... (50)

## 第四章 返回湘鄂赣

- 溆陂桥战斗 ..... (53)
- 发展湘鄂赣根据地 ..... (57)
- 误杀袁文才、王佐事件 ..... (61)

## 第五章 攻打长沙前后

- 成立红六军 ..... ( 68 )
- 从打南昌到打长沙 ..... ( 73 )
- 撤离长沙之后 ..... ( 83 )
- 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 ..... ( 85 )
- 被诬为“AB团” ..... ( 90 )

## 第六章 在五次反“围剿”的日子里

- 第一次反“围剿” ..... ( 96 )
- 第二次反“围剿” ..... ( 100 )
- 第三次反“围剿” ..... ( 102 )
- 第四次反“围剿” ..... ( 105 )
- 第五次反“围剿” ..... ( 111 )

## 第七章 长 征

- 从兴国出发 ..... ( 115 )
- 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 ( 117 )
- 遵义会议前后 ..... ( 124 )
-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 ( 138 )
- 会合红四方面军 ..... ( 152 )

## 第八章 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 任三十一军参谋长 ..... ( 157 )
- 千里跋涉找党中央 ..... ( 165 )
- 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 ..... ( 180 )

## 第九章 在抗日前线

挺进敌后 .....	(185)
发展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	(190)
重振鲁西北 .....	(196)
<b>第十章 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b>	
我所知道的“薄委员” .....	(202)
来到决死第一纵队 .....	(207)
殊死的斗争 .....	(209)
齐心协力反“扫荡” .....	(214)
<b>第十一章 出席党的七大</b>	
参加甄别工作 .....	(219)
代表资格审查 .....	(221)
迎来抗战胜利 .....	(225)
<b>第十二章 解放战争前夕</b>	
奔赴前方 .....	(228)
古北口争夺战 .....	(231)
<b>第十三章 在北平军调部</b>	
初到北平 .....	(235)
黄村调查 .....	(237)
正确的方针 .....	(241)
复杂的斗争 .....	(246)
<b>第十四章 从东北到中南</b>	
撤出承德 .....	(251)
去东北工作 .....	(253)

在东北野战军后勤部 .....	(256)
大军入关 .....	(260)
<b>第十五章 迎难而上</b>	
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 .....	(263)
确保战争的胜利 .....	(267)
<b>后 记</b> .....	(274)

# 第一章 投身革命

## 青少年时期

湖南省的中部有一条河，河水流经四百余里，缓缓汇入湘江。这条河叫涟水。涟水上游有个市面繁华的市镇，即原属安化县的兰田镇。全国解放后，由安化、湘乡、邵阳（宝庆）三县各一部合成一县，因地处涟水的源头，故名涟源县。县府就设在兰田。从兰田西行四十里，有一个村落——西坪村。这就是我家祖祖辈辈劳动、生息的地方。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出生在西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为了讨个吉利，给我取名叫“新喜”。

我家共七口人，土地多半是坎田（旱田），完全靠天吃饭。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勤劳节俭，尚可自给自足；如遇大旱之年，田裂禾枯，颗粒不收，一家人就要忍饥挨饿。

我七岁时，父母把我送进本村的私塾读书。这个私塾共有十来个学生。每人一年交三吊钱、两斗米作学费。先生是从外村请来的。此时，正值辛亥年，外面闹得天

翻地覆。清帝退位，民国初立，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但在乡间并没有什么变动。入学第一天，我们被私塾先生领着拜过孔夫子的牌位之后，便开始懵懵懂懂地念起“子曰诗云”来了。上课时，先生的手边、案前总离不开一把戒尺。学堂里不时响起抽打学生手心的“啪啪”声。我也被打过手心，所以我对先生的那把戒尺又怕又恨。

第二年，我继续上学，但只读了两个多月。有一次，先生挥着戒尺又要打我，我一气之下拾起一块石头向他扔了过去，虽然没打着，但这下可闯了祸：一个毛伢子竟敢还手向先生扔石头。这在先生眼里是大逆不道的事。先生发怒了，把我揪到“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前，罚我跪了半天。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就逃学了，从此再没进过学堂。

结束了学生生活以后，父亲便让我在家当个帮手。我每天放牛、砍柴、割草。到十岁时我就能帮助父亲干些地里的农活了。我十三四岁时，已长得虎虎实实，力气很大，扛犁、耙，播种插秧，样样能干，成了村里的种地能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我和父亲就共同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那时，我家除耕种自己原有的土地外，还开了些荒地。这样，粮食不但能自给，还略有剩余。此外，我一有空就去给别人打零工，赚些油盐 and 零用钱；冬天农闲时，我还干起挑炭的营生。头一天到金鸡坑、

苦株山的炭矿，花七八个铜板买一担石炭（类似无烟煤），挑回来后掺上一半黑土（油泥），第二天分作两担，挑到离家十五里的桥头河镇上，卖给有钱人家。买主拿着一根有倒钩的竹筒，插进箩筐里，抽出来一看，见钩上挂的黑土多了就压价。每担炭一百三四十斤，只能卖三十来个铜板，也就是三百文钱。

我年轻时，曾受到旧社会不良风习的影响。那时乡村里赌风很盛，逢年过节就连一般农民也有偶然一赌的。我曾让人拉去，背着父亲赌过几次。“输钱只为赢钱起，何想输钱输到底。”越输就越赌，越赌就越输。赌了几次，总是输的多赢的少，而且输了人家要现钱，赢了人家就拖欠不给，“输的是钱，赢的是水”。一来二去，我吃苦受累赚下的血汗钱化为乌有。在赌场上，还经常看到许多丑恶的现象：有的人输了钱就卖房卖地，倾家荡产；有的人输打赢要，武霸强抢，打架伤人；有的人弄虚作假进行舞弊，坐收暴利……这一切使我看清了赌钱是既损人又不利己，伤风败俗的不道德行为。尔后，我再也不去赌博了，撞上赌钱的人也尽量避开。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二年，从童年、少年直到进入青年。在这二十二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动，也波及到我家乡的那个小坪坝。我耳闻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我尤其亲身感受到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盘剥压榨穷人的罪恶事实

和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贫苦农民，在饥寒交迫中煎熬的痛苦生活。我在稍懂事的时候，就开始感到世上的贫富悬殊是不合理的。但那时我还不懂得为什么发财的人那样发财，穷的人那样穷的原因。我曾天真地梦想，大家都一样多好！村里饱经沧桑的老人说：“大家都一样，坐轿子的谁来抬？发财的人那是命好。”当时我还不晓得革命的道理，尽管不服也不愿认这个“命”，但也不能判定老人的话是对还是不对。

我从八岁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掌上打满了茧，肩头磨出了厚厚的硬皮。长期的劳动生活虽然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好穿的，但却炼出了一副健壮的身板，铸就了一个倔强的性格，使我能够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经得起艰难困苦，挺得住挫折打击。这是我从父母身上继承下来的，也是故乡所给予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 参 加 北 伐

一九二六年，我二十二岁。

这一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全省。五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入湘。六月，湘军唐生智宣布参加北伐，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七月，北伐军誓师广东，正式出征。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工农运动的大力配合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北伐军战兰田，攻醴

陵,克平江,进长沙,迅速占领湖南全境。接着,又大战湖北的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胜利进军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城乡各地。

国民革命军一面继续向北推进,一面四处招兵,扩大军队。在离我村不远的桥头河镇,就设有招兵站。九月的一天,我挑炭进镇,见招兵站高悬彩旗,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身穿灰色军服的国民革命军的士兵,有的向过往群众教唱革命歌曲:“来来来!大家团结起来!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歌声响彻云霄、震人心弦;有的慷慨陈词,历数北洋军阀的罪恶;有的大声疾呼:工友农友们投身国民革命,加入到北伐行列中来;也有的则高声喊道:“来当兵吃饷吧,吃穿不愁……”

这一切,都使我耳目一新,被强烈地吸引了。

当天晚上,我就和本村几个要好的伙伴一起,议论起国民革命军的事来。大家觉得,国民革命军买卖公平,不扰民众,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同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大不一样。同时也觉得国民革命军中待遇高,士兵每月有七八元薪饷,除维持个人生活外,还能寄点钱回家。我们议论来议论去,越说心气越盛,当下就相约去投革命军。那时,在一般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估计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事不会得到父母同意,就背着家庭人员,趁晚上偷着跑走。

翌日,天不亮,我就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口气跑到桥头河镇报名当了兵。报名时,登记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怕家里寻来当不成兵,便改名为“李聚奎”。从这一天起,“李聚奎”这个名字就伴随我度过了六十年的军旅生涯。

参军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即出发去省城长沙。到达后,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一连。这个连都是由各地刚刚招募来的新兵组建的。我们在长沙训练了约三个月,主要科目是土工作业和射击,训练紧张、严格,也很正规,特别是土工作业,完全按照战斗条令的要求,一丝不苟地进行操作。当时所学的这些东西,在后来保卫井冈山构筑野战工事中都用上了。

大约在十一月间,我们工兵营归入湖南独立第五师编制,成为该师第一团第三营。我在三营九连当兵。整编后,队伍开至湖北孝感,担任向前方运送装备的任务。不久吴佩孚残部向南阳逃窜,我们经当阳开往宜昌。一路上,农会会员主动为我们当向导,作挑夫,架桥修路,妇女儿童送水送饭,给了我们很大支援。队伍畅行无阻,残敌早已逃之夭夭。岁末,我们到达宜昌,在这里送别了轰轰烈烈的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我们返回湖南,驻在常德县。这时,作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农运方兴未艾,四乡农民纷纷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斗争不法地主。跑到县里来

的那些身穿长袍马褂的豪绅日渐增多。农民协会的威风 and 土豪劣绅的狼狈,使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兵士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痛快,甚至以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没料到,北伐战争的烽火还未熄灭,蒋介石就在上海叛变了革命,把枪口对准了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支持了北伐战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当时湖南虽然还在武汉政府的统辖之下,但情况也已日渐紧张。这是由于参加北伐的独立第一师毕竟是湖南地方军阀的旧军队,军官中大都是一批投机分子。随着国民革命的日益深入,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这时他们也一面散布流言蜚语,向农民运动泼污水;一面磨刀霍霍,到处挑起冲突。

有一次,我们三营的营长杨超凡派遣十一连的一个排长,到常德西边的漆家河去侦察,干涉农会“闹事”。双方发生冲突,这个排长被当地农会作为反革命杀掉了。杨超凡得知后暴跳如雷,命令各连全副武装待命出发,准备血洗漆家河。眼看一场大流血就要发生,我惴惴不安,眼睁睁地坐了一个通宵。最后,因为没有得到师部的批准才作罢。大概是师长周磐慑于工农声威,不敢贸然行动。

这年五月,队伍由常德开到岳州驻防。不久,就听说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形势顿时紧张万分,到处都在戒严。当时,我们这支队伍虽然打着革命

军的旗号,但面对反革命叛变活动却按兵不动,反倒对上兵们严加防范。我们九连连长魏输文,家庭是大地主,不久前他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农民协会的好话,现在却一把撕下以前的假面具,大骂起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来了。他在队前训话时,狠狠地叫着,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你们站岗放哨要注意,小心共产党来杀人抢枪。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准离开营区一步。

那时,我没见过共产党是啥子模样,对共产党的真正主张也不了解,虽然并不相信当官的话,却也有几分紧张。

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悍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

十月间,蒋唐战争(又称“宁汉战争”)爆发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为了同蒋介石争夺权利,令所属部队沿长江两岸东征讨蒋。一团由岳州赶到汉阳,沿长江以北推进到安徽的舒城县,我们九连在舒城县以北的桃溪镇担任警戒。不久,东征部队被南京方面的李宗仁、朱培德击败,我们由舒城一直退回湖南的南县、华容、安乡地区。这时独立第一师由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鲁涤平指挥,改番号为独立第五师,师长为周磐。这次所谓的“东征讨蒋”,其实不过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一场厮杀。此时的中国,旧军阀还未清除,新军阀又燃起了战火。

队伍刚刚返湘,屁股还没坐稳,又忙不迭地同黔军打

了一仗。当时盘踞在鄂西的贵州军阀袁祖铭一部占据了津市、澧县、新州一带，鲁涤平、周磐、何健就联合进攻黔军。我们三营担负攻击新州附近敌人的一个前哨阵地。这是一个独立高地，经过约两天的战斗才夺下了高地，一直追敌到津市才停下来。这一仗后，三营又回到华容县驻防练兵。

一九二八年二月底，三营由华容移驻南县。这次三营移驻南县，听说是因为三营营长杨超凡及下属的一些军官原是三十六军叶桥师长的老部下，师长周磐怕杨超凡把队伍拖到三十六军去，所以才把三营调到师部的驻地——南县来，并准备将三营解散。我们队伍一到南县，还没有进营房，周磐就给部队作了一番安抚性的讲话，他说：“外面传说杨营长要把三营拖到三十六军去，说我要解散三营，这完全是谣言，杨营长是我的老部下，我们共事多年，他对我很忠诚，我对杨营长是很信任的，所谓我要解散三营的话完全是谣言，是根本没有的事。”经周磐这一讲，队伍虽然安定了，但最后杨超凡还是请假走了，并带走了一些班排长离开了三营。我们九连被他带走的就有一个排长和四个班长。

此后，周磐为了加强对三营的控制，就调了他的一个亲戚来我们九连当连长。新来的连长不学无术，平时在操场上连个立正稍息的口令都不会喊，但却处处摆官架子，他对士兵的管理除打骂外别无他法。士兵都很恨他，带枪

逃跑的事时有发生，一天晚上，就有十八个人带枪跑了。这时彭德怀同志刚新任一团团长不久，即下令把这个不学无术的连长撤了职，调随营学校的黄纯一同志来担任九连连长。

我从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军起，在将近两年的国民革命军的行列中，经历了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后者则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绞杀革命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我看到我所投身的军队，其性质、作用以及和民众间的关系是那么不同。昨是今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经常引起我的深思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 南 县 闹 饷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有一天师长周磐集合部队训话，他在训话中透露：本师已经奉命即将开往平江“剿匪”。这时，全团士兵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发饷了。按规定，士兵薪饷的标准是：二等兵每月六块五角，一等兵每月七块，上等兵每月八块，下士班长每月十块，中士班长每月十二块。其中除了扣除每人每月三块钱的伙食费外，本应按月发给士兵，但是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很少发全饷。我从桥头河镇报名当兵到南县，前后共十七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七个月的时间中，我由二等兵逐步升到了中士班长，

按理饷银也应该相应增加,但实际上发到手里的钱却一个月比一个月少。有时甚至分文不发,心里很不满。特别是对到南县以来连续五个月不发饷,更使我十分愤慨。因此,在周磐训话后,我就和我们连平时很要好的七班长曾春鉴在一起议论,我说:“我们出来当兵,过去说是来革命,为工农服务,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可是如今既不讲革命,又不发饷,现在又要开赴平江打仗,日子实在难熬啊。”七班长听完我的话后,也悄悄地跟我说:“听说一营的班长们也都在议论这件事,并准备起来闹饷,我们九连的班长们是不是也起来响应?”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好,便拿定主意在本连进行闹饷活动。在旧军队中,士兵闹饷是要“问斩”的。民国九年,湘军中发生过一次士兵大闹饷,带头的人后来有不少遭监禁和枪杀。但这时,我一心想闹饷,根本不考虑自己性命的危险。经过秘密串连,很快全连多数班长都行动起来了。随即,我们连的士兵委员会也成立起来了,成员有我和其他三四个人。士兵委员会连里过去有过,那时是公开的,军官士兵一律都参加。由全连选举连士兵委员会,班组织小组。这种士兵委员会,由于所有军官都参加,当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这次成立的士兵委员会,是秘密的。士兵委员会成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士兵闹饷。要求按月发给薪饷,并补发过去所欠的饷银。理由是当兵的上有父母,下有妻小,要吃饭怎么办?当兵的要穿草鞋、吸黄烟,没有钱怎么

办？请长官替我们士兵想一想！

这次闹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湖南反动当局就肆无忌惮地屠杀工农群众；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大小军阀更是由于已经争得了自己的地盘，分到了一块块肥肉而弹冠相庆，早把为国民革命浴血作战的广大士兵抛在九霄云外，他们层层克扣士兵的饷银。这时，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生活十分艰苦，每月不仅没有钱寄回家中供养父母，甚至连买黄烟的钱都没有。一些吸烟的士兵，只好经常利用星期天到车站、码头去散步，拣人家丢下的烟头。记得我当时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小铁盒，每次从车站、码头拣到烟头，就装在这个铁盒里。拣满一铁盒，节省着可以吸一个星期。连里的士兵见我从小铁盒里拿烟吸，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高级香烟呢。后来他们知道了，就跟我开玩笑说，李班长，别人吸的是“大刀牌”香烟，你吸的是“车站牌”、“码头牌”香烟；别人吸的烟只有一种味道，你吸的烟却是多种味道，真不赖啊！弄得我哭笑不得。我还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的士兵的父母妻小从老家借钱作路费到部队来探望，可是回去时连买一张车、船票的钱都拿不出来，不得已只好徒步甚至要饭回家。士兵们不满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整个军营象一堆干柴，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烈火。

然而，那时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套军阀的行政管理制度。他们宣称军队是国家的，服从军令和服从上级就是服从国家。士兵们除服从之外，没有别的自由。任何违反上级命令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轻者要受笞责、禁闭，重者要军法从事，判刑、杀头。而他们对军官则给予优厚的待遇。一个团长每月薪饷达四百块大洋之多。目的是使军官为“党国效劳”，为军阀尽职。此外，他们为刺激士兵“奋发上进”，引诱士兵死心塌地为其服务，还在士兵中进行所谓“任何劳绩、战绩突出人员，人人皆可晋升为军官”的宣传。其实，旧军队中当军官的几乎都是上司的亲朋故友，非亲非故而靠“劳绩”和“战绩”得到晋升的寥寥无几。不过，他们这一套恩威兼施的办法，也使一些人受蒙蔽和欺骗，但更多的人是敢怒而不教言。

一九二七年底，彭德怀同志由一营营长升任为一团团长，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彭德怀同志就肩负起党所赋予的策动一团武装暴动的重任。随之，这个团就逐渐发生了变化：连队成立了“救贫会”，演出了反对军阀豪绅的“活报剧”，进行了一些通俗的宣传；组织了士兵委员会，扩大了士兵管理自己的权力，改善了官兵关系。但是，当时一团有官兵两千多人，而党派到这个团做兵运工作的党员，加上彭德怀同志，也不过七八个人。其中，直接掌握战斗连队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一营二连连长李灿，一个是我们三营九连连长黄纯一。虽然彭德怀同志

从入湘军当兵到最后当团长,在这支队伍里前后有十来年的时间,情况熟悉,威信很高。但是,要把如此庞杂的一支旧军队引上革命的道路,却是困难重重。为了启发全团官兵的政治觉悟,一团的党组织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反动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南县闹饷”就是这些斗争中重要的一次。

在同一个时候,全团大部分连队的班长们都起来闹饷,并向一些社会团体散发了传单。不久,团部的传令排长张荣生同志(共产党员)在南县一个文庙里,秘密地召开了一次全团中下士代表会议,每连都有代表参加。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荣生同志讲了军阀克扣军饷的情况和闹饷的目的及行动计划等,并提出了“不发饷就不出发”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成了大家的共同要求。闹饷的消息传到在长沙的周磐师长那里,起初他仍用过去盛气凌人的口气说:“发饷是上级的事,发就发,不发就不发,不许胡闹。”但是,由于这次闹饷大家团结一致,态度坚决,步调统一,声势越来越大,把周磐闹得惊慌失措,最后,他也只好让步,答应以他的名义向当地商会借款,给部队发饷。我们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然而,彭德怀同志发动这次闹饷的目的,是团结进步士兵,提高部队觉悟,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自觉起来斗争,为部队走上革命道路作准备。而我们提出“不发饷就不出发”的口号,显然和他的意图相对了。一天晚上,

彭德怀同志来到了三营营部，给全营班长讲了话。他首先对我们的闹饷活动表示支持。他说：“你们很久没有发饷了，生活艰苦，现在你们要求发饷，我完全支持。周师长也不敢再拒绝了，让我向地方筹款。但是，队伍开赴平江的命令已经来了，过两天就出发。他们答应把钱筹集后送到湘阴，待队伍到达湘阴，每人先发一点钱。”他的话音刚落，十连的一个中士班长提出：“如果在南县不发饷，我们还是不走。”这时，彭团长令他站出来，并严肃地说：“大家要听招呼，你们知道，闹饷是要枪毙人的。现在第八军来接防的队伍离南县只有六十里了，南县四周都是水，你往哪里跑？所以，命令要执行，不能把要求发饷作为执行命令的条件。”当时，彭德怀同志所以强调要执行开赴平江的命令，是因为平江地区接近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一团举行武装暴动有利。可是，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也还不晓得他对士兵们闹饷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现在见他这样讲，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觉得情况不妙，怕他惩办这个班长，就急忙向紧挨着我的六班长小声说：“你们是同乡，你出来说几句取保的话吧。”他马上站出来说：“报告团长，班长的话不对，我们要求团长原谅他。”团长当即面露笑容，让他站回队伍里去，并和气地说：“大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到了平江以后，本团长自然要给你们想个办法。大后天出发时要执行命令，不准离开队伍。”听了彭团长后面这些话，我紧

张的心情才缓和下来。

第二天,我分别和其他连的班长串连了一下,认为虽然要求发饷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昨晚团长的讲话给了一点希望。大家说,团长历来讲话是算数的,队伍出发不能违令不走。就这样,队伍于五月底离开南县,乘船横渡洞庭湖。到湘阴上岸后,每人预支了一块钱。六月中旬,队伍到达了平江县城。

## 第二章 平江起义

### “刑场练兵”

南县闹饷，经过彭团长的解释说服，到湘阴时每人又发了一块钱，大家的情绪虽然有所缓和，但由于问题远没有解决，所以队伍开到平江以后，全团中下士班长继续串连，进行闹饷活动。不同的是，这时的闹饷已经由原来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了。

平江是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县城位于巍峨苍翠的幕阜山下，奔腾不息的汨罗江从城南扬波而过，然后扭头向西，咆哮着注入洞庭湖。自然景色很秀丽。但是我们进入平江城里时，见到的却是一片萧条的景象，商店的门面半开半掩，街上行人来往匆匆，三三两两的保安队，端着枪走来走去。全城充满着一种临危的气氛。我们一到，国民党县长就领着一群绅士们迎了上来，说了不少“贵军到此，一县之光”一类的奉承话。接着又是送猪、送羊，大行“慰劳”。可以看出，他们是把我们当作最可靠的“保护者”看待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平江县的老爷们对我们大献殷勤，

是别有原因的。平江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湖南全省最有名的革命地区之一。早在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出广东韶关时,中共湖南省委就派罗纳川等同志到平浏地区从事革命活动,迎接北伐军。这年八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进攻平江时,当地农民自动参战,其声势和规模为全省之冠。但是,从宁汉合流,国共分家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向平江的工农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为了反击反动派的大屠杀,以罗纳川同志为首的平江县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即我们到达平江的前三个月,曾组织二十万武装农民举行过一次“扑城”运动。但由于缺乏经验,指挥不当而失败了。农民“扑城”失败以后,湖南反动当局派来了“清剿”司令阎仲儒和国民党县长刘作柱,他们收买千余地痞流氓组成清乡队,经常下乡残杀群众,抢掠财物;企图“斩草除根”。在他们眼里几乎是“无农不暴,无工不匪”,因此,城里的三座监狱都关满着工农群众。但是,镇压愈凶,反抗必然愈烈。四乡的农民游击队仍经常出没打击敌人。搞得他们魂惊魄落,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第一团到达平江后,团部驻城里,一营驻城东天岳书院,二营驻离平江城五十里的思村,三营驻城北关,我们九连驻在北门外的一个龙王庙里。这个庙很大,三营十连也驻在里面。离龙王庙大约有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柘树坪广场。在我们刚驻下的头几天里,保安队天天在这

里杀“犯人”，一次杀十来个，有时几十个。开始我们觉得杀“犯人”是地方政府的事。后来我们见到被杀的都是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和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在临刑前，有的还喊着“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见我们从旁边路过时，则大声呼喊“革命的兵友们，快来救救我们吧！”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平江怎么有这么多的“犯人”？杀的不都是些农民和学生吗！我们到平江后，彭德怀同志经常下连向士兵谈话，启发大家的政治觉悟。有一天，彭德怀同志到我们连，他问，你们连这个星期是哪个排长值星？你们的连长、排长打不打人？你们这个星期打牙祭（会餐）没有？你们寄钱回家没有？还问，土豪劣绅好不好？资本家好不好？军阀好不好？开始问这些话，除属于日常生活的有人回答外，对其他的谁也不敢回答，只是说不知道。团长走了以后，士兵就议论起来，为什么团长问这些事。有的士兵说，团长以上的军官本身就是军阀，家里也说不定是土豪劣绅、资本家，可不能乱讲。团长是来试探的，若讲错了，要“一打二革三扣饷”，不杀头也会把你送去坐牢。彭德怀同志察觉到士兵的顾虑，以后再来时，他就直接了当表示他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态度。他说：“土豪劣绅、资本家都是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寄生虫，军阀是抢地盘、杀百姓、喝兵血的野兽。我们当兵的是土豪劣绅、资本家的看门狗。”还说：“我们奉命来

此‘剿匪’，其实这里的人不是土匪，全是劳苦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就象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苦日子过不下去了，反起来了……”彭德怀同志走后，我们士兵委员会组织人家谈感想，黄连长也参加了。大家纷纷讲起愤恨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派的话来了，大家越谈越气愤，情绪很激昂。黄连长看到大家发言很热烈，一再鼓励大家说：“讲得好！讲得好！”这样，我们的斗争目标，就由反对克扣军饷，逐步扩大到反对土豪劣绅和他们的清乡队了。

有一天，我们连里的采买买菜返回时，路过柘树坪，见到几个刽子手带着马刀在铺子里喝酒，并听说有四十名男女共产党今天要在柘树坪杀头，就赶回来报告黄连长。黄连长正在讲课，听了报告后，立即要值星班长到柘树坪去阻止。那天正是我值星，我马上跑步赶到柘树坪。见到店里有四个人正在喝酒，桌子上放着铮亮的马刀。我抑住心头的怒火，向他们行了个军礼说：“老兄弟，这里是我们队伍出操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杀人。”他们听后却说：“这是上司的命令，我们是雷公神，天老爷让打谁就打谁。”我想，这些人都是刽子手，同他们讲只是对牛弹琴，继续交涉下去只会耽误时间，就立即跑步回连报告黄连长。连长马上停止讲课，带着全副武装的队伍赶到柘树坪操场，到了操场之后，把队伍分成五人一班，把整个操场占满了。队伍刚刚摆开，清乡队约一个排押着几十名“犯人”也来了。这时，黄连长站在队伍前面，提高嗓门

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操场，不准你们在这里杀人，如果你们不立即离开，老子就要开枪了。”那时，因为我们是正规军，他们是民团，不敢和我们对抗。只好把“犯人”押回去。当天夜里，我们又贴出了“打倒屠杀工农、学生的土豪劣绅”的标语，煞了他们的反动气焰。从此，当地反动政府再也不敢在柘树坪这个地方杀人了。以后，他们又把“犯人”拉到东门外去杀，驻在那里的一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每次见到保安队要在那里杀人时，就立即吹起出操号，借口队伍要出操，喝令他们离开。这种用“刑场练兵”的办法来阻挡反动政府屠杀革命人民，是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采取的办法。

## 暴 动 前 夕

这次独立第五师开到平江，是奉湖南清乡督办署的命令来接替阎仲儒旅的防务，进行“剿匪”、“清乡”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竟成了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威声寒敌胆”的地方。

独立第五师第一团早在开赴平江之前，即一九二八年春在南县时就已经开始酝酿起义了，原想起义以后把队伍拉往湘西，但当时条件不成熟，到了平江以后，部队接近了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这里又有深厚的革命群众基础，起义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但是，当时一团

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平江地区的反动势力，除民团外，还有独立五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及师部的政训队，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起义，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识之外，还要有缜密的计划和巧妙的安排。

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首要的是迷惑和稳住敌人。那时，我们经常见到彭德怀团长出入县政府。国民党县长和当地士绅也常到团部“拜访”彭团长，双方打得“火热”。后来我们才知道，彭团长除了不得不敷衍他们对下乡“剿匪”的请求之外，还不时地揭露他们残杀群众的行为。有一次，彭德怀团长当面质问国民党县长：“你口口声声说平江的‘匪情’严重，可是这么多的‘土匪’哪里来的？你们的民团清乡队，到处捉鸡杀猪牵牛，随便杀人放火，官逼民反嘛！你作为县长能辞其责吗？”弄得国民党县长和土豪劣绅们张口结舌，有嘴难辩，狼狈不堪。当时，他们对彭德怀这个人，可以说是既失望又抱希望，失望的是彭团长虽然答应“剿匪”、“清乡”，但始终按兵不动；抱希望的是一团是湖南当局派来的正规部队，在他们眼里当然是唯一的“靠山”了。

说起一团下乡“剿匪”，其情形也很特别。一团驻平江两个月，一营和二营始终以警备县城、保护县政府为借口，一次也没有到过城外。二营驻在思村，倒是出去过一两次，但是彭德怀团长早就向部队交代，此地的游击队不

是土匪，而是农民，如果他们来骚扰，不要开枪，叫他们回去，彼此互不扰乱。彭团长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大部分士兵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湖南各县被反动派追捕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大家很乐意和农民游击队保持这种关系。他们外出“清剿”时，总是无目标地朝天放枪，并丢下一些子弹。开始地方党的组织还认为是国民党的军队子弹多，士兵背不动而丢掉的呢！这样，一团在平江与其说是“清剿共产党”，不如说是直接帮助游击队壮大力量，游击队不但没有因我们的“清剿”而削弱，反而一天天发展起来，后来成为起义的一股力量。可是在“文革”期间，有人竟写文章说什么“彭德怀在平江清乡杀害了农民，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彭德怀同志回答得好：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团的党组织，为了团结全团广大官兵，还着手对这支旧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造工作。彭德怀当团长后就下了两条禁令：一是取消军官的小厨房。原来连队设有小厨房，就餐人员除连、排长之外，还有司务长、军需、文书和上士，每餐四菜一汤。他们吃的喝的，都是从士兵的大厨房剥削来的。彭团长当众宣布取消了小厨房，官兵同吃一样的饭菜，我们士兵的伙食也随之有所改善，很受大家的欢迎。第二条就是取消了军官手里拿的打人的鞭子。过去连、排长带部队出操上课，每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皮

鞭子，动不动就挥起打士兵，现也宣布取消了。这些改变，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士兵们的眼里，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大家正是从这些实际行动中来衡量自己的长官是好还是孬的。我们连长黄纯一到连队任职时间不长，就能很快取得全连士兵的信赖和爱戴，并在平江起义中，他指到哪里，士兵们就打到哪里，使九连成为一团在政治上较强的一个连队，这和他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有很大的关系。

平江起义最后还是借闹饷的名义发动起来的。当时所以采用闹饷的办法搞起义，是因为闹饷对内可以充分发动全体士兵，培养骨干分子；对外可以蒙住敌人眼睛，给敌人造成错觉。大概在七月初，一团的党组织发动各连的士兵委员会再次进行闹饷活动。这次闹饷同南县闹饷有很大的不同：南县闹饷是以经济为目标的，而平江闹饷是直接为了暴动的；南县闹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带有自发性的，平江闹饷则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同时这次闹饷比起南县那一次来规模更大，因为到平江又有两个月没有发饷了，闹饷的理由更充足了，更能发动群众了。由于士兵委员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一团又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因此党的意图还不能完全讲明。而我对许多人包括对连长黄纯一同志在内也还不完全摸底，这样，我们的闹饷活动仍然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谁是带头人，那更是完全保密的。这样，在闹饷中，彼此就免不了有些戒心。记

得还出现过一点小误会。那是七月中旬的事，一天夜里十二时左右，我正在睡梦中，连长的勤务兵突然来叫我到连部去，说是黄连长有事找我。我心想连长半夜找我，恐怕是因为我带头闹饷的事情暴露了，一时心里很紧张。勤务兵见我磨磨蹭蹭，继续催促说：“李班长，快走吧，他们几个在等你。”我一听“他们几个在等我”，内心更有点紧张了。心里想，如果是事情败露了，就不能坐以待毙，得想法逃到乡下的游击队那里去。我随着勤务兵到了连长房里，见在座的除连长外，还有同我在一起搞闹饷活动的二、三、六、七、九班的班长，都在喝酒吃花生，见此情景，我才放了心。我一进门，黄连长马上递给我一杯酒，并说：“李军士，听说你在带头闹饷？”我愣了一下，正想如何回答好，不料机灵活泼的九班长何静安一嘴插上，代我作了答复：“是的，我们连是李班长负责。”我一听九班长把我们闹饷的事向黄连长公开了，心里吃了一惊，头上冒出汗珠。黄连长见我脸上流汗，就问我：“李军士为什么这样出汗。”我回答说：“天气太热了，我这个人爱出汗。”黄连长看出我的紧张心情，就向我们表示说：“你们在一起闹饷很好，我也来。听说二连连长李灿是全团闹饷的代表，彭团长也赞成。不过，军队里闹饷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要有计划，有组织，要保守秘密，严守纪律，不是心腹之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他最后说：“我提议，我们连里就由李军士作为代表，

以便和二连李连长联系,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负责转达给他,以后你们就可以直接得到他的指示了。”当时,大家都同意连长的提议。这一晚,我们就这样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了闹饷的问题,一直到天快亮时才散开。从这次和黄连长的长时间接触中,我隐约地感觉到,这次全团组织闹饷,除了要解决经济问题之外,还要解决比经济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故又不便问明。我从当了连里闹饷的代表以后,在黄连长的支持下,活动更积极了,不仅在本连活动,有时还到其他连去活动,并经常把活动情况向二连连长李灿报告。那时,我心里经常暗暗地想,现在是快要实现彭团长在南县讲的“到了平江以后团长自然给你们想个办法”的时候了,而且,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很可能就在最近时期内。

就在我们闹饷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黄连长突然“病”了。一天下午,我到黄连长的住处去找他,发现他的屋里有一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滕代远同志。他是在两天前穿着长袍坐着轿子化装成富商模样进城的(当时平江等地,只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坐轿子,坐轿子进城照例是不受检查的)。当时他是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分来平浏地区巡视工作的,这次来到第一团,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沟通了一团和平江党组织的联系,商定了起义的时间和行动计划。

这个时候,一方面,一团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

地进行；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和上豪劣绅们仍然在做着他们的好梦，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动，很快就要在这个小小的山城爆发了。

## 暴 动 成 功 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黄纯一同志把我们积极参加闹饷的六个班长找去，对我们说：“暴动的命令来了，就在今天下午一点钟开始行动。”他一边从军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一边继续说：“这是团部刚才派人送来的信”。我们几个人互相把信传阅了一遍。信中规定了我们九连这次行动的任务，信末署着团长彭德怀的名字。举行暴动的消息对我们来说，虽然是在意料之中，但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一时大家都很兴奋。随即认真研究了全连人员的思想情况和本连的战斗任务。在研究全连的情况时，大家认为，兵士们对长期不发饷积怒已久，完全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但是对三个排长、三个班长、两个上士以及司务长的态度还不十分清楚，而他们的表现如何，关系不小。大家共同的意见是把他们找来，当面向他们宣布彭团长的命令，如果他们赞成，就允许他们参加；如果他们反对，就把他们暂时扣留起来，待暴动以后再放他们走。决定之后，我们作了点准备，就让勤务兵把他们找来了，黄连长向他们简要地说明了为什么要举行暴动，同时

把团长的命令向他们宣布了。这时，除司务长及上士的态度不够坚决外，三个排长都激动地说：你们干的事我们完全赞成，可惜你们没有早告诉我们。三个班长也表示积极参加。我们感到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也就松了一口气。随后我们一起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九连的任务。当时平江城反动势力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师部政训处及所属特务连；另一股是国民党县政府及其保安队。至于独立第五师的第二团、第三团，都驻在离我们五六十里以外，一时不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当时，团里把解决县政府及保安队的任务交给一营二连完成，我们连的任务是解决师政训处与特务连。大家说，师政训处和特务连，是平江县城的一个大钉子，如果不能顺利地拔掉这个钉子，就会影响整个的行动，必须坚决把它拿下来。最后我们查看了平江县的地图，规定了行进的路线和攻击的位置，就分头到各班向士兵们口头传达任务，要求全副武装待命出发。同时，在驻地周围加派岗哨，防止走漏消息。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万里无云，烈日当空，阳光沐浴着整个平江城。随着紧急集合号音的响起，全连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迅速来到连部门口集合。黄连长给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劳苦终日，连吸烟的钱都没有，生活很苦。大家经常说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今天，我们就要到城里去捉那些克扣军饷的军官，打倒土豪劣绅，救穷苦的工农大众，

大家赞成不赞成？”黄连长的话音刚落，士兵们齐呼“赞成！”全连欢声雷动，个个喜形于色。接着黄连长立即下令：“大家装好了弹，马上跑步出发。”

师政训处和特务连，当时驻在福音堂的大院子里。下午一时，我们九连到达福音堂后面的小山坡上，连长当即布置：二排插到福音堂的大门口，把门堵住，不准政训处的人和特务连的人跑出来。一、三排在山坡上掩护，如果特务连敢抵抗的话，就冲下去消灭他们。接着，我们二排排长何桂安对我说：“李班长，你们四班沿这条小路下去，直接堵住特务连的大门口，并将卫兵的枪缴了。我带五、六班占领门前五十米处的小土堆掩护你们。”根据排长交代的任务，我带着全班冲到大门口，很快把卫兵的枪缴了。当时，正是部队午睡时间，特务连的官兵和政训处的人员都在屋里休息，对我们的行动丝毫没有发觉。待我们进入院子里时，我才见到特务连的一个排长背着值星带子走了出来。这个排长原来在我们连当过见习官，他认得我，一见面就问道：“李军士，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见习官，今天很对不起，我们全团暴动闹饷，你们赶快把枪放下，人都徒手出来，如若不然，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一听是暴动闹饷，就笑嘻嘻地说：“千万不要误会，闹饷我们也参加。”我说：“那好，欢迎你们参加！”这样，特务连的官兵都以为只是士兵们的一次闹饷风潮，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并协助我们把政训处解决了。当时除政训处

处长外出漏网外,其余的军官全被我们扣留了。前后不到一小时,我们九连就拔掉了平江县反动势力的一个大钉子。任务完成后,黄连长集合全连宣布纪律:缴获的东西要交公,不准私拿,违者要军法从事,就地正法。

一营二连拔掉国民党县政府及其保安队这个大钉子的战斗进行得也很顺利。听说他们在出发前,彭德怀同志亲自给全连官兵讲了话,并带头系上了鲜红的布带。该连把队伍分为两队。当其中的一队人马扑兰县政府时,县长刘作柱正在宴客,挤满一堂的土豪劣绅看见起义的队伍象从天而降的神兵,全都吓得面如土色。士兵们解开腰里缠着的麻绳,把他们一个个地捆绑起来。这时,彭德怀同志也赶到了。他们见到彭团长,以为是“救星”来了,都说:“彭团长,这是怎么回事,你要管束你们的士兵呀!”彭德怀同志当即向他们宣布土豪劣绅的罪恶,并说:“今天是由士兵来管束你们,你们的末日到来了!”二连的另外一队人马向保安队冲去,震天的喊声,吓得正在午睡的保安队员丢枪乱窜。起义部队当即收缴到长短枪八百多条。

与此同时,起义部队打开牢房,把关在那里的八百多名工农群众都放了出来。这些重新获得了自由的工农群众,有的抱着起义战士,欢呼跳跃;有的含着泪水拉着起义战士哽咽难语;有的要求马上参加队伍。其欢乐的情形,难以言状。

短短两个小时,未放一枪,未死伤一人,起义部队就

把全城反动武装摧垮了，把反动的统治机器砸烂了，暴动成功了！平江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全城红旗飘，标语、传单满街都是，真是人人高兴，个个喜气洋洋，大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革命的威力大无穷。

参加此次平江起义的部队除第一团外，还有师随营学校和第三团三营。师随营学校当时驻在岳州，贺国中是该校的代理校长。为了使随营学校能开来平江参加暴动，彭德怀同志以一团团长的名义向师长周磐写了一个报告，建议让一团全部下乡“剿匪”，守城任务由师随营学校来担任。同时还建议师参谋长同随营学校前来，一方面督促部队“剿匪”，一方面抓随营学校的训练工作。周磐接到彭德怀团长的报告后，深信不疑，下令师参谋长带随营学校开来平江。与此同时，彭德怀给贺国中发了一封密信，约定他们参加二十二日的暴动。贺国中接到彭德怀团长关于参加平江起义的密信之后，就带领全校学员前来平江。但队伍到达距平江县城约六十里的渔口镇时，已是二十二日下午，当他得知一团已举行暴动时，就立即派人去抓在队伍后面的师参谋长，可惜他跑掉了。于是贺国中带队伍迅速赶来平江，于二十三日清早和我们起义部队会合。第三团三营驻在平江县属的嘉义镇。黄公略任该营营长。当时他到职时间不到一个月，因时间短，情况不熟，工作来不及展开，故未能取得士兵们的信任。在接到彭德怀团长关于举行起义的通知以后，黄公略以惊人的胆略，利用

全营士兵对上级长期克扣军饷的积怨情绪，把自己的钱全部拿出来分给士兵，并借机宣传当地豪绅如何不筹款，上级又如何克扣军饷等，然后向士兵宣布，我的钱都发给你们了，以后怎么办，你们自己掌握。从而，把全营士兵都鼓动起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完全听黄营长的，黄营长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七月二十一日，黄公略同志杀掉了反动的第十连连长和在该营的三团团 长 刘济人的侄儿后，宣布全营武装起义。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他把队伍带到了平江城北约五里处的地方休息，自己单身到城里和彭德怀、滕代远同志联系。可是，第三团三营毕竟原来基础差，在黄公略同志进城后，该营受第九连连长的欺骗，大部分叛变逃走了，只留下少部分比较坚定的同志入城和起义部队会合。

平江暴动成功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七月二十四日，地方游击队和四乡的农民，扛着梭镖、举着红旗，象潮水似地涌向月池塘广场。几万军民在这里一起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会上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讲了话，宣布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彭德怀同志任军长，滕代远同志任军代表。（即党代表，因当时党还没有公开，故称为军代表）。原来一团一、二、三营，改为红军第十三师的一、四、七团，共二千多人。彭德怀同志兼任师长。我们三营改为第七团，黄纯一同志担任团长，贺国中同志担任团代

表。接着,临时革命法庭公审了国民党县长刘作柱和一批土豪劣绅,宣布了他们的罪恶,并将他们立即处决。处决这批长期骑在平江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分子,是由我们连执行的。地点就在他们过去枪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的柘树坪。曾何几时,这里是反革命的杀人场所,如今成为革命人民伸张正义的地方。我和大家都为自己能够亲手替工农群众报仇雪恨感到无比的痛快。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到掌握枪杆子与政权是何等的重要。

## 暴 动 之 后

平江暴动后,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联合颁发了施政纲领。这个纲领除了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之外,还规定了军队废除打骂,实行经济公开和官兵平等的制度。

根据纲领的精神,部队在起义之后,迅速建立各种组织,并民主选举了初级军官。我记得在起义的第二天,我们九连就在黄纯一同志的主持下(此时他已是七团团长),召开了全连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军官(当时没有干部这个词)。那天会场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选举箱(一个糊着红纸的大竹筒)。首先,黄纯一同志简要地说明了由士兵选举军官的意义和办法,他说:“从现在

起，我们军队再也不是地主资本家的看门狗了，而是工人农民的革命军队了。因此，我们必须用崭新的民主制度来代替旧军队的军阀制度，今天开会由大家民主选举连、排长，就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开始。”当他宣布“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大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我们九连起义后的第一任连、排长。我们二排排长何桂安当选为连长，我和七班长曾春鉴、六班长李楚南被选为排长。历来的军队军官都实行委任制，民主选举军官是破天荒第一回。当时这样做，目的在于发动士兵清洗不可靠的军官。这不仅对于巩固刚刚起义的部队有好处，而且对于破除旧军队的军阀制度，建立新军队的民主制度，树立士兵们的主人翁思想，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次被选掉的军官和一些不可靠的分子，除个别极端反动者外，都被资遣礼送出境。这种做法很得人心。

紧接着，部队党组织吸收那些在闹饷和暴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我就是起义后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之一。

当时部队驻在平江城东北约一百三十里的龙门厂，刚由师随营学校分配到我连工作不久的宣传员潘泗滨同志经常找我谈话，询问我的家庭情况，以及何时当兵，为什么当兵等等。有一天，他对我说：“团代表贺国中同志今晚有事要和你谈。”晚饭后，潘泗滨同志领我去找贺国中同志。我们俩来到贺国中同志的住处时，天已经黑了，

但贺国中同志的屋里还没有点灯。借着月光，隐约可见贺代表坐在一个小桌旁。我俩落座后，潘泗滨同志首先向贺国中同志介绍我的情况。他讲得很认真，很详细，连我家里有什么人，怎么当的兵，怎么带头闹饷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到这时，我才知道潘泗滨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他所谈的这些情况，都是在平时和我们“摆龙门阵”时了解到的。他一边说，贺国中同志就一边问我。他讲的对不对？接着，就举行入党仪式（当时叫入学式），由贺国中同志领念誓词，由于没有灯看不见，潘泗滨同志就划着火柴照亮，贺国中同志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接连划了几根火柴才把誓词念完。因年代长了，誓词的全文记不清了，但其中“服从组织，保守秘密，遵守纪律，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的话，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仪式结束后，贺国中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我们走到一起来了！”顿时，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高兴的时刻。从贺代表的房子出来已经是半夜了，野外一片寂静，我们借着月光，沿着崎岖的小路回驻地。我想到自己已经和彭德怀、贺国中、黄纯一等优秀的人站在了一起，将投身到人类最伟大、最光荣的事业中去，心情非常激动，脚底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那时，党是绝对秘密的，每个党员都是个人单线联系，没有横的组织关系。我入党后，经常与我谈党的工作的是潘泗滨同志。贺国中同志也与我谈过话，因他在团部，

谈话次数就少一些。记得军代表滕代远同志还给我们作过两次政治报告，讲了国内形势和我们红军的任务。在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我还记得在战斗的空隙中开过两次小组会，其中一次是在万载大桥战斗失利后召开的。这一仗部队损失很大，逃亡的人很多，如何巩固这支刚刚诞生的革命军队，是摆在当时党组织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在党小组会上贺国中同志首先提出：“万一部队打散了，我们党员不能散，在任何情况下党员都要团结在一起。”他讲完话后，见大家一时没有吭声，就用试探的口气说：“我们是不是也来喝一杯血酒，此后谁也不能离开队伍、叛变革命。”听了他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大家都很激动。我说：“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至于喝血酒，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我们是共产党，就不用了吧。”贺国中同志听了我们的话特别高兴，连声说：“讲得对！讲得对！”不久，我们连又接受了一些同志入党，连里就单独组成了党小组，组长是潘泗滨同志。一九二八年底，部队上井冈山以后，我们连（当时已改为大队）由红四军调来了朱义敏同志任党代表。他来后进行了党员登记，组成了支部，朱义敏同志任支部书记。这时，党组织在部队中才开始公开。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入党的情景仿佛就在我眼前。特别是那严肃、庄重的入党仪式，更使我终生难忘。“文革”期间，邱会作一伙为了结党营私，竟诬陷我

是假党员，他们为了达到打倒我的目的，甚至对我的入党介绍人、平江暴动的领导者之一贺国中同志也加以怀疑，说什么贺国中是不是共产党员还值得考虑。可见他们怀疑一切，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上是我对平江起义的回忆。当时，平浏地区的党组织和平浏地区游击队对这次起义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不甚了解，因此不作赘述。

## 第三章 留守井冈山

### 千里转战

平江暴动成功了，红五军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诞生了，这里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如今有了自己的军队，有了自己的政府。影响所及，浏阳、醴陵、岳阳、通城、通山、修水、铜鼓、万载等县，也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这个地区的革命风暴，威胁着长沙、武汉、南昌，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为了扑灭这团熊熊烈火，湖南反动当局慌忙调集了八个团，直向平江扑来。他们以六个团的兵力围攻平江城，以两个团的兵力直插长寿街，堵击我军退路，妄图一举消灭我们这支队伍。当时，我们想利用平江城的有利地形，消灭来犯之敌，以提高红军的声威，再撤出平江县。为此，把一团布置在城周围，正面迎敌；把第四团、第七团分别布置在城南城北各三十里处，两面夹攻。七月二十九日晨，战斗打响。攻城之敌猛攻我第一团阵地，被我杀伤三百余人。位于城北的我们第七团，在黄纯一、贺国中同志的带领下，从敌侧后出击，又歼敌二百余人，激战一天，打成

相持局面。因敌我力量悬殊，久战于我不利，到黄昏时刻，彭德怀同志果断下令一、七团撤出战斗（四团在敌进攻之前一天去浏阳）。此役，红五军伤亡一百余人。第七团团长沙纯一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黄纯一同志是我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后的一位连长，也是和我朝夕相处，给我以直接革命教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外表象个文雅的书生，但性格刚毅，遇事沉着果断，作战勇敢，对士兵胜似手足，对革命忠贞不渝，想不到竟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首次战斗中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期以来，我每想及此，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七月三十日，我们在悲壮的气氛中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告别了平江城，向黄金洞方向转移。从此，开始了频繁的游击战。

八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制订了湘鄂赣三省的“会剿”计划。随后进攻红五军之敌增至十五个团之多，并把彭德怀、黄公略起义的部队和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相提并论，称为“四大匪部”，可见敌对我平江起义部队之恐惧与重视。此时，红五军一边迎敌一边转移，于八月上旬进占修水，九月初，我军占领铜鼓。敌人继续进攻，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遭敌张辉瓒三个团的突然袭击，损失较大。部队撤回平（江）、浏（阳）一带活动，又遭湘赣两省白军夹击，我军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等地区发展，所到之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

反动派，散发财物，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在九宫山体整时，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五个大队，贺国中同志任第三大队大队长，我任中队长。

从平江到九宫山近两个月的转战中，我军屡遭敌人前阻后追，几乎每天都要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奋战数次方能前进。我记得最多时一天打过八仗。其战斗之艰苦激烈可想而知。在频繁的战斗中，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光荣地倒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些人经不起革命严峻时刻的考验，临阵脱逃或叛变投敌。甚至还发生过一大队大队长雷振辉企图凶杀彭德怀同志的事件。那是在队伍缩编为五个大队后不久，部队来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四大队的大队长李玉华和一大队的大队长雷振辉两人准备一起带队伍投敌，当晚，李玉华以去放连哨的名义把队伍带跑了。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贺国中等领导当即商议，决定把雷振辉监视起来。第二天早晨，队伍集合准备出发，彭德怀同志正在队前讲话时，雷突然伸手抢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同志手里的驳壳枪，企图枪杀彭德怀同志，两个抱打在一起。雷身高力大，薛洪全同志个子矮小，敌不过雷振辉，这时我正站在队伍前边，一个箭步上前将雷抱住，把他摔倒在地，适大队长黄云桥上来，一枪结束了雷的性命。事情发生后，彭德怀同志照常讲话。在讲话中，他没有提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却向大家简要地总结了这一段转战的情况。他说，在一个多月的转

战中,由于敌强我弱,队伍损失很大,但我们也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就是必须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尽量避免同敌人硬打硬拼,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能把敌人拖垮并战胜他们。现在部队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政治质量提高了。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讲着讲着,他袖子一卷,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暴动是为了干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定的道路,就一定要走到底,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干下去。”大家从他那坚定的目光和斩钉截铁的语言中,感受到一股巨大的鼓舞力量。事隔很久,彭德怀同志在和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才感慨地谈到雷振辉企图行凶叛变这件事,他说,雷振辉是我在一团一营当营长时的老连长,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没想到他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看来,要在一起干革命,光靠个人感情、私人关系不行,必须靠政治觉悟,靠共同信仰,才能百折不回,团结革命到底。

## 宁 冈 会 师

十一月下旬,起义部队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向井冈山进发。这时,红五军已将原来的五个大队编为五个纵队。其中第二纵队由黄公略同志带领,在平浏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和第三纵队是红五军的主力,由彭德怀、

滕代远同志率领奔赴井冈山。这时，我在第九大队任中队长。红五军的第一和第三纵队在第二纵队的掩护下，甩掉了“追剿”的敌人，向南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军威大震。部队在渣津还消灭了朱培德的一个整营，途经万载城时，又消灭了驻在该城的地主武装数百人，缴获甚多。为了尽量多带一些生活必需品，部队还把缴获的布匹，每人一卷，象少数民族的包巾一样，缠在头上，带上井冈山。部队到达莲花城北四十里处时，红四军特务营在何长工、毕占云同志的率领下由宁冈县赶来了。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得知红五军向井冈山开进后，特地派何长工、毕占云同志下山来接应我们的。两军相见，大家无比高兴。这时正值初冬，天气晴朗，农民秋收已毕，广阔的田野呈现在我们面前。所到之处，人民群众象接亲人一样，把我们迎进了自己的家门。早在平江起义不久，彭德怀同志就常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红五军的榜样；任凭敌人多少次的围攻清剿，工农武装割据坚如磐石。当时，我们对彭德怀同志这些话，半信半疑，现在见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接触了根据地的群众，心里的疑问都消失了，一切是那么新鲜、亲切、温暖。大家经过几个月的辗转苦战，想到很快就要和毛泽东、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了，心情更是无法平静。

十二月八日，部队到达宁冈县属的茅坪。第二天一

早,朱德同志在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那时我们这支队伍,大部分还是国民革命军的老兵,听说红四军的朱德军长来了,认为一军之长,一定是穿得很好,可是朱德同志却是上穿一件黑棉袄,下穿一条黄裤子,头戴一顶八角帽。队伍一集合,彭德怀同志向大家介绍说,这是红军第四军的朱军长,欢迎朱军长给我们讲话。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笑了起来。心想,军长就是这个样子啊!朱德同志马上明白了大家笑的是什么。他说,同志们不要笑,无产阶级的军长就是这个样子的,革命总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不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阶段,革命就不能成功。接着,他讲了形势、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等问题。这是朱德同志给我们的第一次讲话,他那乐观、慈爱的笑容,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随后部队开出茅坪,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遇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我们就在路边的田里集合,让红四军先走,这时,毛泽东同志来了。彭德怀同志说,大家等一下,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毛主席身穿一套中山服,没有戴帽子。他一面讲话一面抽烟,走过来,走过去,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的道理。他讲,工农兵弟兄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他提问地说,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

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我们听了这些话，启发很大，因为我们是农民出身，懂得的道理不多。

会师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县新城的广场上召开的。这天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一万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毛委员、朱军长等领导同志上去后，台子就垮下来了。那时，部队里有些老兵，还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掌好，倒下来了，非把掌旗的打顿屁股，取个吉祥。今天台子垮了，有的人就议论开了：“哎呀，这可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军长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同志们，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因为没有捆好，所以垮了。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

会上，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红四军、红五军胜利地会师了，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军、更多的根据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朱军长、彭军长、滕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

话。两军会师以后，不几天红五军就上了井冈山。

## 激战井冈山

当时，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已彻底失败，他们正纠集兵力，准备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会剿”。根据前委决定，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下山，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法，向“会剿”敌军的后方打去，以解井冈山之围。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以打击来犯之敌。

留在井冈山的红五军，为两个纵队，分一、十、八、九四个大队。我当时在九大队三中队当中队长。我记得这四个大队也就是五、六百人，四百多支枪，每支枪只有几发子弹。仅有几挺重机枪，还是水机关（枪筒子要装上水才能打）。此外，有红四军新收编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还有红四军后方留守人员，但大多是伤病员和兵工厂人员，山上总共也就是一千余人。而敌人却集中了二十个团的兵力，把井冈山团团围住，他们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留守在井冈山的红军一举歼灭。

井冈山地势险峻，方圆数百里，只有四条大路、五条小路可以上下，易守难攻。但是，一旦有一处被突破，其他几处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很难守住。又因敌众我寡，没有预备队，一处被破，其他处无法增援。在这种孤军作

战的紧迫情况下，一些同志有顾虑。彭德怀同志召集了各级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动员全军同志一定要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并作了具体分工。一大队，十大队由李灿同志指挥；八大队、九大队由贺国中同志指挥。由一大队守黄洋界哨口；十大队守八面山；八大队守白泥湖；九大队守黎坪。军指挥部设在茨坪。

红四军下山不久，敌人进攻的枪声就打响了，敌人的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泥湖。黄洋界的敌人攻得很紧，但因地形险要，敌人兵力太多展不开，再加上我军在阵地前沿埋上了用竹子削成的竹“钉子”等障碍物，我们又是居高临下，敌人一直攻不上来。敌人见正面攻不破，就从黄洋界侧面的山沟里绕到我军阵地的后面，截断了我军后路。据说是敌人收买了当地的一个富农带路引上山的。十大队守的八面山，是就地砍树做的工事，敌人用机枪打了四天四夜，把工事里的木头都打碎了，再用炮一轰，把工事打垮了，只跑出来十几个人，大多数同志都被压在工事里面。

敌人进攻白泥湖的战斗也是异常激烈的。我们在黎坪的山上，就听到白泥湖那边的机关枪“嗒嗒嗒嗒”地响，一直不停。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同志带领八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四天四夜。我们九大队守在黎坪，敌人来了一个

营，是试探性的，加上我们在山上插了许多小红旗，敌人也搞不清我方虚实，打了一天，没有怎么猛攻就撤走了。

彭德怀同志在茨坪首先接到的报告是黄洋界告急，他立即带领警卫排，一口气向黄洋界跑去，还未到峭口就遇上了敌人，他立即指挥部队向峭口方向反击，想与李灿同志指挥的一大队两面策应，把敌人打下去。战斗刚刚开始，他又接到报告，说攻八面山的敌人打进来了，白泥湖我军伤亡很大，即将失守，情况十分严重。彭德怀同志立即带警卫排赶回茨坪。他考虑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已有两个口子被敌人打进来了，我孤军无援，如果不突围出去，死守到底，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经与党代表滕代远同志商议，决定马上收拢队伍，突围出去，待把敌人引下山，再与其打游击战。

彭德怀同志带领部队一边打，一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荆竹山方向突围。大路都被敌人封锁了，只好由群众带路，在石头崖上爬。天下着小雪，我们只有一点点干粮，大家互相谦让着吃了一顿饭。没有水喝，就吃几口雪，一连在山上爬了两天才到了荆竹山。

我们越过荆竹江，来到大汾圩，在那里打了下山后的第一仗。当时，部队的情绪比较低沉，彭德怀同志想打一个漂亮仗，提高一下士气。他集合队伍给同志们作了动员。他大声地说：“前面大汾圩有敌人一个营，这是我们突围出去的最后一道难关，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过去，只

要坚决、勇敢,就一定能够冲过去! 冲过了这个难关, 本军长是有办法的。”他讲完后, 部队就开始行动。一打起来, 我们才知道这里的敌人不是一个营, 而是两个营加一个民团, 并已埋伏在我军前进路上的两侧山坡上。我们九大队是前卫, 贺国中同志带我们这个中队担任尖兵。彭德怀同志、贺国中同志分别指挥部队从两边打, 很快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带领全中队同志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 架上机枪, 用火力压制敌人, 掩护我军主力通过。但是, 最后面一部分非战斗人员还是被敌人截住了, 一些同志光荣牺牲, 一些同志返回井冈山坚持斗争。

从井冈山突围出来之后, 我们在彭德怀同志的带领下, 一边行军, 一边打仗, 整天穿树林、钻山沟, 与敌人转圈圈, 抓住时机就打一下, 打了就走。记得打于都时, 我军仅有八、九两个大队和十大队的一个排, 一百八十三支步枪, 总共四百多人。人数虽然不多, 但还是保存了有生力量。敌人妄图消灭红五军在井冈山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 反而被我们拖得疲于奔命, 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

井冈山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同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如瑞金、延安等地一样, 历来是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因此, 人们对它存有特殊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 战争从来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卫每一块革命圣地不受敌人的侵犯, 不落入敌人之

手,则只能根据当时战争的客观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而不能单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感情。可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却利用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了人们对井冈山的特殊感情,把井冈山根据地一度失守作为彭德怀同志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说彭老总“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行逃跑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无端的诬蔑。其实,彭德怀同志早在平江起义之前,就把毛泽东同志创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当作革命的明灯,视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榜样,因此才历尽艰险,转战千里,带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当时,我们这支队伍上井冈山的目的是学习红四军建军、建政、建党的经验,并没有打算留在井冈山。只是上了井冈山以后,根据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联席会议的决定,才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当时,蒋桂战争还没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处于暂时稳定时期。为了摧毁井冈山根据地,反动头子蒋介石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策划,调集湘赣两省二十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而且,红四军缺粮、缺盐、缺药、缺衣服,经济极为困难。这些都危及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以“围魏救赵”的策略来解井冈山之围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彭德怀同志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不顾自己的安危,说服了周围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勇敢地挑起了保卫井冈山的

重拒，全力抗击比自己多十几倍、几十倍之敌。从而，拖住了两省“会剿”敌军的大部分兵力，掩护红四军顺利地向赣南转移。最后又同“会剿”井冈山之敌，血战了四天四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令突围，保存了红五军这支革命队伍。这一切，正是彭德怀同志对井冈山斗争的贡献，也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一页。何罪之有！

## 回 师 井 冈 山

部队冲过大汾圩之后，大家的情绪好多了。抵达南康附近的新城时，正值春节，彭德怀同志说：“请大家过个好年。”我记得是一九二九年大年三十下午到达新城。当天晚上，鞭炮齐鸣，很是热闹。我们从地主那里搞来了肉和酒，吃了顿好饭。我们大队长黄云桥喝了一点酒，很早就睡了。我和勤务兵两人盖一条毯子。刚睡下不久，勤务兵说外面枪响，我开始还以为老百姓放鞭炮呢，跑出去一听，果然是敌人的枪响。我立即报告黄大队长，他不信，仍睡着，我又去报告朱党代表，他马上就起来了。我们立即集合队伍，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谁也看不清谁，我就把班长一个个依次排好，战士来了，就“对班入列”。这时，黄大队长也来了，他派通信员和军部联系。可是因为晚了点，军部已经出发了，我们大队还是掉了队。我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呢？向哪个方向走呢？我们模模索索地朝新城

左边走，觉得左边有山，问题不大。走着走着，见到右后方有队伍，我们就趴下，连问了三声，才有人答应，原来是贺国中同志来接应我们。这时，我们才发现右边有敌人的火光。如果这时没有贺国中同志来接应，就可能误走到敌人那边去了。从这天晚上起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正要吃饭，又见敌人出现在我们的左前方，我们只好一边走一边吃。这时，敌人追上来了，我们中队在后头打掩护，彭德怀同志就走在我们中队前头。上山时，他的脚步放慢了。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怕敌突然袭击，为了让大家得到休息，自己就在外面走来走去，实际上是起了担任警戒的作用。通宵没有休息，这时，他实在太疲劳了。我就派了一个副班长，在后面推着彭德怀同志上坡。同时为了阻止敌人前进，令各班向敌人开火，掩护部队上山。我们部队上了山，敌人也拖累了，我们才脱离了险境。

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兴国县的九堡，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群众见了我们很高兴。听老百姓说，离此百余里的于都城只有敌刘士毅部的一个营把守。我们决定当即出发，奔袭于都城。一天一夜急行军，走到离城十多里地的一个村子里这时天还未亮。我们准备了梯子，拂晓时进了城里，突然围住敌人的营房，全歼了该城的守敌。这是从井冈山突围后第一次占领县城。随后，我们又乘胜奔袭了安远县城，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

地。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敌人的正规军,情况比较好。就在这里,红五军接到毛泽东同志从汀州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们,红四军将从汀州回到瑞金,让红五军到瑞金同红四军会合。

一九二九年三月底,赣南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我们胜利到达瑞金,再次与红四军会师了。我军在瑞金休整了约一周的时间。当时,蒋桂战争已经爆发,江西省军阀内部也矛盾重重,“会剿”井冈山的湘赣白军已回防,似无力来追击我们了。因此,前委决定我们红五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四月初,我们离开了瑞金,经于都于五月二日回到井冈山的茨坪。这次回井冈山和上次退出井冈山的形势完全不同,沿途几乎未遇见敌军。当时井冈山地区虽遭敌“会剿”造成严重破坏,但是红五军回来不久,经过发动群众、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建立革命组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井冈山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生气勃勃的面貌。

## 第四章 返回湘鄂赣

### 滇陂桥战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恢复以后，红五军军委和湘赣特委共同确定了“向外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被湘赣两省的白军摧残得很厉害，特别是在敌人撤退时，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造成盐、药、布等日用品奇缺，兵源、弹药的补充也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迫切需要向外发展。

一九二九年夏，红五军和王佐特务营共同行动，首先攻占湘东的酃县、桂东等地，筹集了一批款项和物资，继又夺取粤北的城口、南雄，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购买了大批药品、布匹及食盐，带回井冈山。这对于解决井冈山地区军民经济上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胜利这个东西，可以鼓舞部队的士气，但同时又容易使人盲目轻敌。就在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不久，湘赣边特委和永新县委就提出要红五军夺取安福城。当时，安福县周围的永新、莲花、吉安等县城都有敌人的正规军把

守（少的一个旅，多的两个旅）。安福城守敌虽然只有一个营加一个民团，但城墙既高又坚，我军攻城需费时间，而且进攻安福县城，是入敌腹地，易受周围邻近之敌的夹攻，以红五军千余人之兵力，又无攻城的重武器，去进攻设防坚固的敌人，确有很大的冒险性，可是当时特委和县委的一些同志只考虑安福城的守敌较少，认为攻下安福城，敌人就会从永新、莲花等县城撤退。因此，不顾彭德怀同志的反对，令红五军向安福城开进。

当红五军进到距安福城三十里的演陂桥时，即与敌遭遇。那天天空黑沉沉的，暴雨下个不停，能见度很低。枪声一响，永新、莲花、安福三路之敌即同时包围上来，向我军猛烈射击，显然是中了敌人的埋伏。情况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立即下令突围。我们九大队在大队长黄云桥的带领下，勇猛冲入敌阵，迅速杀出一条血路。部队且战且撤，但敌人尾追不放。这时，纵队长贺国中同志又带领我们中队占领一处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脱离险境。在激战中，贺国中同志不幸头部中弹，在我身边倒下，我们立即进行抢救，终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了。

贺国中同志系湖南涟源县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黄公略、黄纯一同志一起在湘军当兵。后他们由湘军部队选送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又继续读完军校高级班，并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黄公略早年结识彭德怀，于是他们三人在一九二八年春

一起来到南县，通过彭德怀的介绍，他们三人又一起到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工作，分别担任随营学校副校长、教育长、区队长等职。不久黄公略和黄纯一同志相继调到团队任职，贺国中同志就成了师随营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时年他才二十五岁。他身材高大，体魄魁伟，性格豪放，胆识过人。在随营学校工作过的同志都说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官。他政治上敏感，当第一团士兵在南县进行闹饷活动时，他就密切注意闹饷的发展情况，并发动随营学校的学生积极响应。他对我们这些带头闹饷的积极分子，更加重视和关心，因此平江起义之后，很快就在他的主持下吸收我们入了党。他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从担任我们第七团的党代表以后，既做思想政治工作，又指挥打仗，并以英勇善战著称。他在每次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我们全团共产党员的楷模。所以，大家对于他的牺牲，都极为痛惜。我更为失去这位象长兄般的关怀和教导我的领导同志而悲痛万分。时至今日，他那光辉的形象和音容笑貌，还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贺国中同志牺牲的当天晚上，我们把他的尸体埋葬在演陂桥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当时来不及为他树碑立牌，只作了个简单的标记，原想在情况许可时，另移墓地，但因以后战事频繁，经常转移，无暇顾及。多少年过去了，一九八一年，我在北京突然接到贺国中同志的儿子贺松云从家乡的来信，询问他父亲埋葬的地点，读着他的来信，

我悲喜交集，感到贺国中同志在平江起义以后的辗转战斗中，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历尽千难万险，虽然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却有了自己的后代。我对贺松云的情况虽然不太了解，但我相信他一定会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把先辈们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演陂桥遭遇战，我军伤亡二百余人，纵队以上干部，除贺国中同志牺牲外，还有军参谋长刘之志同志阵亡，李灿同志负伤。那几天我军损失很大。此后，部队撤到永新地区进行整顿。八大队大队长郭炳生接替贺国中同志任纵队长，我由九大队的中队长提任八大队大队长。

是年八月，红五军又相继同敌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打了一仗。这次，我们“避实击虚”，乘敌不意，袭击敌之尾部，掠敌辎重甚多。随后又“避强攻弱”，迅速北进，连克万载、铜鼓，从而回到了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

此时的湘鄂赣边区，经过黄公略和地方党的同志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留在这里的第二纵队也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湘鄂赣边支队，黄公略同志任支队长，人员由原来的一二百人增至上千人。并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建立起几小块根据地。

红五军一进入湘鄂赣边区，就受到了黄公略同志和地方游击队的热烈欢迎。一些为躲避白军“会剿”而上山的群众，也纷纷返回家园。我们更为回到红五军的发源地而感到十分喜悦。大家相见，分外高兴。第二天，黄公略

同志给我们大队以上干部介绍了一年来这里的斗争情况，他说：“从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之后，我们在湘赣边的万山丛中度过一个艰苦、寒冷的冬天。吃的是红薯丝，喝的是雪水。下山时，我们倒着身子向后走，为的是不在雪地上给敌人留下痕迹。那时，我们困难很多。以后，我们紧紧地依靠地方党和游击队，采取‘旋磨打圈’的游击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白天隐蔽起来，晚上出击敌人，因此敌人不但没有‘剿’光我们，反而被我们搞得心惊胆战，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接着，黄公略同志风趣地说，“不过，由于我们白天活动不多，很少见太阳，所以大家都有了白面书生了。”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通过黄公略同志的简要介绍，我们都为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对黄公略同志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 发展湘鄂赣根据地

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湘鄂赣边支队重新编入红五军，黄公略同志也升任为红五军副军长。整编后，红五军兵力共三千余人，编为五个纵队，并划分了各纵队的游击区：

第一纵队司令员孔荷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

第二纵队司令员李实行，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

区；

第三纵队司令员吴溉之，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

第四纵队司令员郭炳生，活动于湘赣边区；

第五纵队司令员李灿，活动于阳新、大冶、通山、咸宁地区。

与此同时，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向这里的同志介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瑞金等地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原来湘鄂赣这个地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严重。其中尤以平江的地方游击队为最。产生盲动主义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的人是出于狭隘的复仇思想，把参加革命当作为了报仇。有的把烧杀当成是坚决革命的行动，而把反对这种错误行为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定的表现。有的人把烧掉群众的房子当作促使群众起来革命的手段，说只有这样，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农民）变为无产者，迫使他们走上革命。

对于这种盲动主义的做法，我们一开始就是反对的，觉得土豪劣绅的房子无罪，反革命是人不是房子。而且一烧起来，往往殃及贫苦农民的房子。有时，一条好好的街，顷刻变成一片瓦砾。烧掉了房子，群众往哪里住？自己的队伍往哪里住？因此，我们对盲动主义很反感。可是，那时我们又讲不出多少道理来说服他们。后来，我们到了井冈山，听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讲，工农革命军刚进入

这个地区时，农民都很亲近地围拢上来，可是，当点火要烧房子时，农民就跑开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烧房子是“烧”跑群众、孤立自己的愚蠢行为。当我们在瑞金同红四军第二次会合时，还亲眼见到红四军每到一地，就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因此，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这一切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红五军这次重返湘鄂赣边区，就以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为榜样，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作为红五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快，地方的民主政权和农民、妇女、儿童等革命组织都纷纷建立了起来，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到几个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起阳新、大冶、崇阳，南迄浏阳、万载，东到修水，西至平江的广大地区。这时红五军的人数虽然增加不多，但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战斗力大为提高。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懂得军队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性。

一九二九年秋，我军由平、浏、万地区转到莲花、永新、吉安地区时，我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终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而部队却经常要转移作战。我们大队党代表王如痴同志见我已經不能随军行动，经他请示军部并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就把我留在莲花县属九堡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养病，并派一个勤务兵陪伴我。

这家老百姓人口不多，除夫妻外，还有两个不满十岁

的孩子。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每天给我端水送饭。那时,地主的民团,还经常下乡活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还让孩子在村外放哨,一有情况,就把我背到山上藏起来。

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这家老百姓帮助我来了村里的医生,给我看病,可是一连服了几付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加重。我估计我的病可能好不了了,就把自己长期积攒下来的十几块钱,交给了勤务兵,嘱他在我死后,给我买口棺材。这时,我的勤务兵只会在一旁偷偷流泪,没有什么办法。老百姓见此情景,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到处找名医。后来,他们打听到萍乡地方有一个老中医,很有名气。但他出门看病要坐轿,没有轿子抬,就不肯来。当时,这个地区已经很少有坐轿子的人了,轿子也就难找了。经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帮助,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台轿子,才把这个老中医请来了。果然,吃了他几副药,我的病就逐渐地好起来。

我在这家老百姓家中,前后住了一个多月,临离开时,我想把身上的钱都给他家留下,但他们说什么都不肯收,经我再三劝说,最后才收下很少的一点钱。

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人民群众实在太好了,没有这么好的人民群众,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我从革命斗争中得到的亲身体会。

## 误杀袁文才、王佐事件

革命创业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创业艰难百战多”，有时还可能受到来自队伍内部“左”右倾错误的迫害和错误政策的打击。一九三〇年初，永新地区发生的误杀袁文才、王佐同志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袁文才、王佐都曾是井冈山地区的绿林头领，一直过着天地人“三不管”的生活。他们以“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旗帜，出没于茨坪和茅坪等地的高山密林中，共同打击土豪劣绅，抗击官府的进剿，得到了农民的欢迎。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这里以后，了解到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的情况，认为起义部队要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并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把这两支队伍团结过来。因而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召开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排除了一些人想用武力吃掉袁、王部队的错误主张，作出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对这两支队伍进行团结和改造的正确决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首先亲自会见袁文才（袁在一九二六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向他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肯定了袁文才及其部队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说明了工农革命

军进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并送给袁文才部队一百条枪,鼓励他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不断扩大农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这一诚恳的合作态度,使袁文才受到深刻的教育,消除了原来的疑虑和戒心,他向毛泽东同志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建设好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以表示感谢。在工农革命军团结了袁文才以后,毛泽东同志又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初,派何长工同志来到王佐部队任党代表,相继派到王佐部队工作的还有宋任穷、康健、张际春、高静山、蔡协民、谭梓生等党员干部,通过进行新旧对比教育和军事训练,使王佐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政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王佐也于同年四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袁文才、王佐都参加了边界割据的领导工作,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切都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团结和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留下熟悉井冈山地区地理民情的王佐和他领导的三十二团,配合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以打破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三次“会剿”。这时,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出征(四、五月间私自离队跑回边区),指挥三十二团的重任落在王佐的身上。在这期间,王佐顾全革命大局,勇挑

重担，服从指挥。由于他熟悉地形，因而多次陪同彭德怀同志到我们阵地视察、指导，他对我们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受到了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的赞扬。

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以后，王佐率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两个月的游击战，没有什么大的损失。随后，三十二团改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团第一营（又称特务营）。

当红五军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返回井冈山地区时，彭德怀同志在茨坪见到王佐。当王佐谈到他的部队未遭受什么重大损失时，彭德怀同志高兴得连声称好。并经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王佐部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任纵队副司令员。夏天，当红五军挺进粤北开展游击活动时，王佐主动提出随同前往，在几次战斗中都表现不错。

一九二九年八月，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区，此后有半年时间，我们同袁文才、王佐部队脱离接触，对他们表现如何，不得而知。

一九三〇年初，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的第三、四纵队，从湘鄂赣边区来到永新、安福边界活动，准备攻打安福。这时，我病愈回到驻在永阳镇的红五军军部时，一天下午，彭德怀同志对我说：“今晚部队要出发执行任务，你病刚好，就不要去了。”并令我于第二天带着军部的勤

杂人员赶到永新城里去找他们。当晚部队就轻装出发了。我把军部的马夫、挑夫、伙夫等组织起来，第二天一早直奔永新城。当我带着军部的勤杂人员到达永新城时，就传出话来：“袁、王反水，被红军解决了。”

后来我才知道，酿成这一事件不是一朝一夕的。自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以后，湘赣边特委同袁、王部的矛盾就逐渐加深。当时在边特工作的杨克敏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到上海所作的书面报告中，就曾提到此事。他认为：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克敏在《报告》中还认为，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且一冲突起来，工作更不好作。

因此，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出，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

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一九二九年湘赣边特委书记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也认为：王佐部队的“士兵成分纯是王佐的老弟兄”，袁文才部队的“士兵成分完全是老袁的老弟兄”，所以我们插足不进。

因此，邓乾元在《报告》中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策是调开此地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全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已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则好，不能行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边界特委关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八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象，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以上可见，边界地方党委个别人早就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

一九三〇年二月，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通知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带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城集中，袁、王接到通知后，于二月下旬带领部队开进了永新城。特委书记朱昌偕把袁、王及其部队安顿好以后，就把他们的住处绘成草图，连夜来到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等同志报告，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城边界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把边界地方武装为他们改编统

率。说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气势汹汹，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有将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因此，要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同志听了上述的报告后，提出一些疑问，认为袁、王的问题“不致如此严重”。并再三询问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朱昌偕说，这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的。因为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关于歼除土匪的首领这一条。当时，红四军前委在讨论“六大”决议时，曾将这一条删掉，但后来袁文才还是得知了决议的全部内容，就告诉了王佐，并说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他们的。王佐非常听袁文才的话，所以，袁、王要叛变是由来已久的。这时，随同朱昌偕一块来反映情况的还有边界特委的另一名委员，他也随声附和说袁、王确实要叛变。按照当时的规定，主力红军凡到一地，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红五军军委召开了临时会议，经集体讨论决定接受边界特委的要求，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来到永新城。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分头包围了袁、王的住地，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来不及动作，就被朱举枪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了枪声，带着他的勤务兵冲出了包围，跑到东门外。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不会游泳，终于沉入河

底，几天后，尸体在下游浮出水面。

在“解决”袁文才、王佐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特委对于袁、王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刚刚成立的红六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我们第四大队（那时我已到红六军，任四大队大队长）。我于四月初带领四大队到茅坪一带，到处寻找袁、王余部的行踪，并派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都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则备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袁、王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的。他们自身可能在组织纪律性上存在某些问题，同湘赣特委某些领导人也可能发生过矛盾，但说袁、王要叛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充其量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而湘赣特委的一些领导人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有缺点错误的同志，直至不惜残酷地杀害他们，显然是极为错误的。

## 第五章 攻打长沙前后

### 成立红六军

一九三〇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蒋桂战争刚刚结束,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又在酝酿之中;另一方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士兵哗变,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形势,对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十分有利。那时,红五军从湘鄂赣边区来到赣西。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五军的领导同志参加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遂川于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把赣西的地方武装和永新、莲花等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军第六军。

成立红六军时,我正在红五军军部等待分配工作。因在我治病期间,李寿轩同志已接替了八大队大队长的职务。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找我谈话。

彭德怀同志对我说:“红六军成立了,由黄公略同志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任政治委员。但是这支

新部队缺乏干部，黄公略同志提出要红五军派干部去，经我们研究，准备派你去做支队长。”彭德怀同志的话刚说完，滕代远同志接着问：“你有什么意见吗？”

“已经决定了吗？”我提问了一句。

“决定是决定了，但你有什么想法还可以提嘛！”他们笑着说。

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历来是我党我军一条基本的组织原则。我一听“已经决定了”，觉得不应该再讲别的，就表示说：“组织上决定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完全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我从参加平江起义后加入红五军到这时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段的战斗生活中使我和红五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里有我熟悉的上级和可敬可亲的首长，有我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性格相投的战友。由于战斗的需要，我多次转战于湘赣和湘鄂赣两个苏区之间，对这个地区的地理民情也比较了解。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红五军啊！因此，尽管我已表示服从调动，但心里仍恋恋不舍。他们看出我的心情，又给我讲了革命的形势和奋斗的目标。最后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使我们许多互相不熟悉的同志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使我们许多互相熟悉的同志分开了。现在革命发展了，成立红六军需要很多人到那里去工作，将来革命再发展了，我们队伍再扩大了，需要到新的部队去工作的人就更多了，总想

留在老部队、老地区工作,是一种缺乏发展的保守观念。”

彭德怀同志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我对他们表示:“我没有意见了,请下命令吧!”

就这样,我告别了红五军的同志和战友,同黄公略同志一道来到永新,参加建立红六军的工作。

红六军是由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五团和永新、莲花、宁都等县的游击队和当地的赤卫队合编而成的。

其中以第二团历史最久。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特委的领导下,万安、泰和、吉安地区的农民就纷纷举行起义,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两个纵队。一九二八年七月,赣西特委决定将这两个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红二团成立后,活动于吉安之延福,吉水之阜田、新余、分宜、安福一带边境,曾与反动军队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作战多次,俱获胜利。

第三团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由延福的第二纵队编成的。

第四团是第二团一部,于一九二九年初随红四军转战乐安、兴国后,同赣南十五纵队会合而成立起来的,团长段月泉,政治委员由李文林兼。

第五团是一九二九年十月,由罗炳辉同志领导的吉安靖卫大队起义改编的。编入第五团的还有由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地游击队合编之第十纵队。

红六军成立时,将以上几支队伍,分编为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由第二团、第三团编成,纵队长柯武东,政治委员李韶九,下设第二、第三两个支队。

第二纵队由第四团、第五团编成,纵队长罗炳辉,政治委员王如痴,下设第四、第五两个支队。

第三纵队由永新、莲花等县游击队编成,纵队长徐彦刚,政治委员刘作述。

我调到红六军后,分配到第三纵队工作。起初,第三纵队没有设支队,只有四个大队,同时,又因纵队长徐彦刚同志在莲花(他是莲花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没有到职,所以就让我代理纵队长。以后,徐彦刚同志来了,第四大队缺大队长,又让我到第四大队任大队长。约两个月后,第三纵队设七、八、九三个支队,我又由四大队长改任第九支队支队长。那时,大家对职务高低没有人计较,只要是工作需要,让干什么都行,确实自觉地做到了“能上能下”。

红六军成立之初,部队装备很差。队伍虽然编成了军,但没有统一的服装,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都有。枪很少,有的还是“残废”枪,有的人扛的是大刀、梭镖、鸟枪。

部队的成分也比较复杂,基本的是农民,也有的是从白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有的是被俘过来的军官,有的是为打土豪发洋财而来的无业游民。

部队刚成立时,纪律也差,农民的散漫习气很浓厚,

请假逾期不归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人地方观念很重,只愿意在本区域活动,不愿意到外地区作战。

记得在红六军宣布成立的几天之后,彭德怀同志来到永新城里红六军三纵队驻地。我们集合第三纵队驻城里的部分队伍,请彭德怀同志讲话。他看到部队动作很稀拉,有的人身上还披着大衣,不扣扣子,彭德怀同志批评了这种散漫现象,他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主力红军的一部分了,今后,将担负更加光荣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加强组织纪律性。如果象今天这个样子,兵不兵,民不民,随随便便,就有辱于主力红军的称号了……”彭德怀同志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个个咋舌,纷纷脱下身上披着的大衣,队伍顿时整齐严肃起来。

为了训练好这支新成立的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领导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我们一方面以红四军、红五军为榜样,严格要求部队,另一方面又从红六军广大指战员的实际觉悟程度出发,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工作。记得我们红六军在芦溪消灭敌军一个团以后进到安源整顿时,第一纵队枪多,人少,余枪很多;而第二纵队则相反,人多,枪少,徒手兵很多(那时二纵队还在赣南)。为了解决人、枪不均的矛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提出由第一纵队调一部分枪支给第三纵队,由第三纵队调一部分人给第一纵队,以减少人枪不均的矛

盾。可是双方一开始都不同意黄公略同志的意见。一纵队的同志说我们有枪就可以扩兵；三纵队的同志说我们有人就可以在战斗中缴敌人的枪来补充自己。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面对这一情况，黄公略同志没有采取硬下命令的办法解决，而是冷静地分析了产生这种本位主义的历史环境，分头个别谈话进行说服，终于使大家懂得了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道理，加强了整体观念，于是双方都高高兴兴地进行了人、枪的调整。随后，黄公略同志以这次调整人、枪的问题为例，对部队进行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教育，引导指战员们树立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理想。此后，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断提高，相互团结逐步加强。由于红六军军委和黄公略同志的坚强领导、苦心教练，使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了一支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好部队。

## 从打南昌到打长沙

一九三〇年四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了。这是国民党统治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兵力一百多万，激战于陇海、津浦两路沿线，历时半年多，死伤三十万人。在此期间，国民党蒋介石因忙于内部战争，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暂时放松，这就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月中旬，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组成军团”。据此，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于六月组成第一军团。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毛泽东同志兼任政治委员。所属三个军：第四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由罗荣桓继任）；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治委员（七月红六军改称红三军，由蔡会文任政治委员）；第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整个军团共两万余人。与此同时，红五军和红八军组成第三军团。红军军团的建立，标志着红军作战的战法已经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但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面前，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党中央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过低估计反革命的力量，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六月十一日，党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随后又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一军团打南昌，三军团打长沙，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六月下旬，根据中央打南昌的命令，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红十二军从福建长汀出发，经瑞金、兴国，于七月中旬来到赣西南，同黄公略、蔡会文带领的红三军会合。同时，正式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从此，我们红三军就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两军会合后，红一军团前委制订了向南昌推进的计

划，这个附有行军路线图的计划只提出“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此次率领红一军团执行攻打南昌的命令，一开始就灵活地处理了部队的作战行动问题。

一军团在沿赣江东侧向南昌推进途中，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在前，红三军在右侧后。当时这一带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反动民团，一击即溃，所以一路很顺利。只是因为时值酷暑，天气炎热，连日行军，比较疲劳，所以常有一些体弱的干部、战士中暑。那时部队既没有医院，又缺少药品，因中暑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的时有发生。

部队攻占樟树镇后，休整三天。南昌守敌曾派出几艘小汽船在赣江上巡逻。当时部队中有些人分不清什么是军舰，什么是汽船，听到江面上发出“嘟嘟”的声音，就说是敌人的军舰来了。后来，我们派出少量部队隐蔽在江边，一见敌人的汽船开过来，就瞄准扫射，吓得敌人汽船掉头就跑，再也不敢出来。

在樟树，前委对当时敌我形势及我下一步行动计划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审时度势，并没有命令部队北上攻打南昌，而是西渡赣江于七月二十九日进到离南昌八十里的万寿宫。八月一日，十二军三十四师的少数部队攻击了南昌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

随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红一军团撤围南昌,进到安义、奉新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并待机行动。在此期间,前委从晚到的报纸上得知七月下旬湖南敌军何键部从长沙向驻平、浏地区的红三军团攻击前进。红一军团为支援红三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区的局面,遂令部队西进,向湖南方向发展。当时红一军团前委的命令指出:“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七月十九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五军前进之势。”为消灭何键向我红五军出击之部队,并攻取浏阳,红一军团“拟于本月五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发,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限于本月十六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命令接着对各军的行动路线作了具体部署。八月十日,又发布了《由宜丰向万载集中的命令》。

红一军团在西进途中,又获悉红三军团已于七月二十七日占领长沙。消息传来,全军振奋。

红三军团此次攻克长沙,是乘蒋冯阎“中原大战”、南方反动势力空虚之机而获得的巨大胜利。当时“中原大战”方酣。湖南军阀何键为防桂军再度入湘(一九三〇年六月,李宗仁为配合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进攻,曾一度占领长沙,后被何键部击退),又集兵于湘桂边境,使长沙守敌的防守力量极为薄弱。鉴此情况,我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于七月中旬集兵于平江一带,并同以王首道同志为首的湘鄂赣特委共同研究了攻打长沙的部署。

随后,各兵农军组成浩大的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随红三军团行动。

湖南军阀何键闻讯,急派敌第十五师危宿钟部,分两路追近平江,企图挫败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之举。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随即指挥红三军团先后在晋坑、金井和梨梨市、七里巷等地与敌激战数天,于七月二十七日乘胜追击并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中心——长沙城。敌人一部被歼,大部溃退河西。湖南军阀头子何键狼狈逃向湘西。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攻下,我军不得不撤出城外。

八月十二日,红一军团进到万载,得知红三军团在占领长沙之后,已于六日向平江方向转移,随后又侦知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戴斗垣旅已进到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墩一线。红一军团前委遂决定首先消灭该敌。

八月十八日,红一军团在万载县之黄茅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分三路向离黄茅三十里之文家市前进。一路是红四军,于十九日从黄茅出发,经慈化、清水塘开到桐木宿营,二十日由桐木出发,经下湾、均田、上下金家湾,迅速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一路是我们红三军,于十九日经慈化进到清水塘宿营,二十日由清水塘出发,经斗谷巷、白竹坳、龙潭湾向高陞岭、棺材岭阵地攻击前进。一路是红十二军,于十九日经五家厂、桥下进到大土里,松树坳之线宿营,二十日向孙家墩前进,消灭孙家墩之敌。

二十日天刚蒙蒙亮,军长黄公略同志亲自集合红三军部队。我们第三纵队在徐彦刚同志的带领下,首先到达指定地点。这时离发起攻击的时间不到几分钟了,还不见柯武东所带的第一纵队到来,黄公略同志正在着急时,一纵队的同志气呼呼地跑步上来了,黄公略同志把柯武东同志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柯武东同志二话没说,就带着队伍按照指定方向向前冲去。一场围歼戴斗垣旅的战斗在拂晓前打响了。

戴斗垣是军阀何键的心腹,任国民党四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此时,戴斗垣只注意从长沙撤出的红三军团,没有提防悄悄逼近的红一军团。经我们闪电式的突然袭击,顿时慌成一团,敌虽多次反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仅三小时激战,我军歼敌三个团另一个营,俘敌一千余名,戴斗垣被击毙,缴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机枪三十七挺,获得红一军团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文家市战斗的胜利,给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创造了“二打长沙”的客观条件。

红一军团一举消灭戴斗垣旅后,斗志昂扬,士气更加旺盛。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到达浏阳东北之永和市,与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第二天,召开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

面军总前委书记。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四万余人。

方面军成立后，经方面军总前委讨论，“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于是部队继续西进，向长沙方向运动。

总前委在作出“再打长沙”的决定时，是有过一番争论的。记得我们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彦刚同志在同我一次谈话中，曾谈到总前委会在讨论第二次攻打长沙问题的一些情况。他说，最近几天，总前委会几乎每天都在开会研究打不打长沙的问题。有的赞成打，有的不赞成打。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军不具备打长沙的条件，因为长沙守敌有十万人，而且城内并无工人、士兵运动作为内应，取胜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毛泽东同志不赞成打。他还说，在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对一位坚持打长沙的同志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好了。而这位同志却回答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来当，长沙也得打。徐彦刚同志还谈到，朱总司令对打长沙的态度也很勉强。

我好奇地问：“那么，是谁主张打呢？”

徐彦刚同志说：“中央有命令，三军团的同志也主张打。”

当时，我们久居山区，对全国的形势很不了解，因此也无法分辨这一是非，而且觉得在每打一个大仗之前，领导人之间相互有不同的见解，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听一听就过去了。只是到了后来因久攻不克而撤围长沙时，才觉

得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

随后,一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沙猛攻。红一军团担任左路,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三军团担任中路,由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红十六军担任右路,由军长孔荷宠率领。八月底,方面军抵长沙近郊。长沙陷于我红军的包围之中。

但是,此时长沙守敌已在长沙城周围筑成坚固的防御工事,自南郊之猴子石起经阿弥岭、湖迹渡至北郊捞刀河口止,逶迤二三十公里,林立许多碉堡、巨型鹿砦,还装设了高大的电网。敌军凭此死守。我军只有步枪、机关枪,缺乏攻坚的武器,第一次攻击未能成功。

那时,红军指战员情绪高昂,歼敌心切。正当全军根据总前委的命令,准备于九月二日向长沙守敌发起全线总攻时,我军从敌人的一个传令兵身上获得一份关于敌军拟集中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方向向我军出击的命令,据此,方面军于九月一日晚上重新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三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消灭由猴子石出击之敌。

猴子石在长沙城南,濒临湘江,是长沙至株洲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也是长沙守敌为运输唯一留下的一个口子。当时,我红三军就部署在这里。

九月三日,敌人果然出来了。那时,我带第九支队正控制猴子石之东侧。敌陶广部出击时,我支队首当其冲,

我们与敌激战数小时，子弹全部打光，遂向后撤了几里地。这时，黄公略军长发出了三军全面反攻的号令，广大指战员随着响彻云霄的冲锋号音和喊杀声从山丘上一齐压了下来，我们第九支队随即掉头加入反攻的队伍，端着空枪打冲锋。敌人在我强大的攻击下，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有的被打死，有的跳进湘江，更多的是当了我军的俘虏。

敌军遭到如此惨败，是他们始所未料的。他们原以为我军已围城数日，必定疲惫松懈，企图通过出击，既为守城部队鼓气，又打破被围之困境。他们从猴子石这个狭窄的口子出击时，是鱼贯而出的，而且一边前进一边砍倒地上的树木，作为向我射击的掩蔽物。这样，当受到我军猛烈反击、溃不成军时，横在地上的树木变成他们后退的障碍。狭窄的口子变成他们后退的死门关。这就使得大批敌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除伤亡和跳进湘江的以外，不得不缴械投降。

此役，我红三军击毙敌人七八百人，俘虏敌官兵千余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我们九支队在撤回时，每人身上都背了两三支枪和大批子弹。我们的装备又加强了。

然而从此以后，敌人接受了猴子石出击被歼的教训，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九月十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红军再次猛攻长沙。但长沙守敌凭借三十个团的兵力和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据守不出。而

且敌人的阵地前沿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上既有一道道的电网，又有一座座掩体和纵横交错的战壕。靠红军当时的武器装备，要攻破这样的坚固阵地实在是很困难的。

当时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部队曾采用火牛阵的办法，即在几百头水牛的尾巴上浇上了汽油和挂上了鞭炮，点火后，使牛冲向敌人的阵地。但敌人一打枪，这些牛又转身往回跑，反而把自己的队伍冲乱了。经过试验，没有成功。

火牛阵失败了，又回过头来组织强攻，但在敌人强大火力压制下，强攻未成，部队伤亡严重。战斗的实践证明，我军还不具备进行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广大指战员有了切身的体验。因此毛泽东同志建议，将部队暂时撤出阵地，把敌人引出来，再予以消灭。这时从长江局传来敌张发奎和桂系的部队已进到湘潭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同志建议先消灭桂军再打长沙。由于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并经过总前委会的讨论，一方面军于九月十二日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攻打长沙遂宣告结束。

一方面军二打长沙，当然是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毛泽东、朱德、包括彭德怀等同志在内，在敌人据城坚守、我军久攻不克、损失较大的情况之下，作出了撤围长沙的决定，这一行动使我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其意义，正如朱德同志后来所说的，这是他们一生事业中最

重大的步骤之一。

## 撤离长沙之后

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到达株洲、萍乡一带后，始知张、桂军已到湘潭纯属误传。但这时红一、三军团的给养均已告罄，于是，部队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并筹款，一面待机行动。前后用了十天左右时间。在此期间，部队对“二打长沙”的战斗进行总结，表彰了一批作战勇敢的指战员。在总结的过程中，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深入部队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这次围困长沙十多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这是自红军诞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以前敌人曾经嘲笑我们是跳梁小丑。谁知“小丑”却扫了敌人三十多个团的威风。接着，毛泽东同志解释这次攻长沙不克的原因：一是红军虽然在文家市、猴子石消灭了敌人五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未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工事之前，因此敌人有余力守城；二是白区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城内没有工人罢工策应；三是我军装备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的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而我们没有重炮去破坏它。

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消除了部队中一些人对撤离长沙的不满情绪。但是一些受到立三“左”倾思想影响的人仍坚持要打南昌，他们的理由是：打长沙和打南昌等大

城市是党中央的指示，长沙打不下，当然应该打南昌。

对于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一开始就存有疑虑的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护全军的团结，没有直接否定打南昌的意见，而是决定部队第一步先占领吉安、峡江、新干，然后再打南昌。于是整个方面军离开株洲、萍乡南下。

十月四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我红一军团，乘敌空虚，一举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使江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在吉安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把原来的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相应改为师、团、连、排。团直接指挥连，不设营一级。我们红三军第三纵队改为红三军第九师。徐彦刚同志任师长，朱良才同志任政治委员。我所在的九支队，改为第二十七团，我任团长，贺水光同志任政治委员。

部队在吉安城里度过中秋节后，又移师北上向袁水流域推进。十月中旬占领峡江，随后又进到新余一带。一路上，机动作战，结合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措给养。并没有急于打南昌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总前委召开的“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经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反复做工作，才使原来坚持按照中央的指示进攻大城市的同志，逐渐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结果。

这时，国民党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经接近尾声，蒋介石开始集中兵力，准备对我红一方面军和红色区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会剿”。当时敌人的部署是：何健

指挥的第四路军的一部进逼安福、吉安以西地区；鲁涤平指挥的第九路军主力从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向南逼进；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由湘东进入赣南，向北进攻。敌人企图以十万之众从南、西、北三面迫使我红一方面军背水而战，把红军主力消灭在赣江西岸的吉安、安福地区。

面对这种形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进一步总结了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的，并得到了军队和江西省行委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随后，一、三军团于十一月初陆续东渡赣江，回到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 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

随着革命斗争和党的事业的发展，放在我们每个革命者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因此，我日益感到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工作起来困难很多。

那时，红军的高级干部大都能文能武，他们不但懂军事，懂政治，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就拿我们红三军来说吧，军长黄公略就念过十多年书，并曾当过两年乡村私塾教师。他投笔从戎以后，又先后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过。他善书能画，草、楷书都写得很

好,在空闲兴浓时,还常作画题诗。

军政治委员蔡会文,不但指挥作战英勇机智,而且能诗善文,有较深的文学造诣。传说他在家乡山田村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目:《我的家乡》。他根据自己平时对家乡的印象,当场就写出如下诗句:

有山又有田,  
地名叫山田。  
农民作牛马,  
豪绅象神仙。  
同生一块地,  
贫富两重天。  
何时能平均?  
我要问苍天!

由于他从小就颇有文才,所以老师给他改名:会文。

我们的师长徐彦刚同志文化程度也很高。他一九二六年曾就读于重庆中法大学,后转学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一位有勇有谋,有文化知识,深受部下爱戴的红军优秀指挥员。

领导者有知识,有文化,就会重视知识,重视文化,想方设法提高部属的文化知识水平。我把放下多年的笔重新拿起来,就是在领导同志的督促和帮助下才做到的。

记得,我们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占领了江西西部的重镇吉安后,有一天,徐彦刚师长把我们

三个团长找到一起,对我们说:

“你们现在是一团之长了,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那怎么行?从现在起,要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学习文化。”他说完,就从衣兜里掏出来三支崭新的自来水笔,送给了我们每人一支。这是他用自己节约的伙食尾子钱,特地从吉安市上买来的。

我接过徐师长赠送的自来水笔半开玩笑地说:

“师长,学习文化是很重要,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哪有时间顾得了它!你给我们买了笔,就先让它作为纪念品吧!”

徐师长听我这么一说,顿时认真起来,他说:“我给你们买笔,不是让你们作个纪念品就算了,而是要你们从现在起就学文化。”徐师长停顿了一会又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本色。学文化也可以如此,结合工作进行学习,不见得比进学堂提高得慢。再说,要作一名出色的红军指挥员,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知识,工作就会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文化和打仗是一致的,学好文化,就更能打好仗。”

接着,徐师长怕他对我们的要求落空,就又给我们规定一条,他说:今后各团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报告,必须由你们团长亲自动手。

那时下级向上级汇报战斗生活情况,除了用口头报告的形式外,通常还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例如:部队行军,

每天要写宿营报告；部队训练，每周要写训练生活报告；部队打仗时，每天要写当天的战斗详报，一个战斗结束后，要写出详细的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等等。团部编制有一名专职的书记官，过去这些文字性的工作，都是由他负责，主管干部只要动动嘴，由书记官执笔上报就行了。现在这一切都要由自己动手写了。我觉得徐师长这个要求太高了，就着急地说：“我在家七岁时只上过一年多学。学的字都忘记了，现在让我打仗可以，只要你师长下个命令，我李聚奎上刀山、下火海保证完成任务，而写报告这玩艺，我没法完成。”

徐师长见我着急的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不要着急，办法定有的，平时你汇报工作不是用“首先、其次、最后，把情况讲的蛮有条理吗？写书面报告，就是把你说的，扼要地写在纸上，开始可以由你先讲一遍，让书记官执笔整理，写好后，你再照书记官写的重抄一遍，细心体会体会；然后，把你自己抄的那一份上报给我。”他接着对我们三人说，“以后书记官写的我不要，就是报上来我也不收。你回去照我的办法去做吧，只要坚持下去，天长日久不愁学不会！”

徐师长这次同我们三个团长的谈话，给我们的教育极为深刻。从此以后，我照着徐师长的要求去做，先让书记官把写好的报告读一遍，然后，我自己再照着报告一笔一画地重抄一遍。第一次抄报告可真费劲，笔在手上不

听使唤，憋出一身汗，才抄了一行字。书记官看我这副模样，提出要帮我抄。我婉言谢绝，坚持自己抄，抄完了，我请书记官帮助检查一遍才送到师部去。

我第一份“杰作”，虽然字迹写得七歪八斜，但徐师长看了却非常高兴，他当着通信员的面连声称赞：“不简单！不简单！”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锻炼，我不但会认会写很多字，而且开始学着起草战斗命令和工作计划了。在战场上还能写简短的报告，送到徐师长那里，当他知道是我写的，很满意地说：“写得不错。”

在我和徐彦刚同志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对我每次所写的报告，总是认真审阅，对我写错的字、不通顺的句子，都改正过来，然后加上批语，再退给我看。而我对他退回来的报告上所写的字，以及给我的便条、信件，则照着描写多遍。我现在所写的行书字体，还是那时从徐彦刚同志那里学来的，当然没有他写得好。

从那以后，我一直保持了亲自动手写报告的习惯。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从西路军回到甘肃省镇原县援西军司令部时，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题目叫《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的报告。至今这份报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如果不是长期在战斗空隙中坚持学习文化，我是不可能写出这份报告的。

现在每逢我提起笔时，徐彦刚同志当年教我学文化

的动人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徐彦刚同志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江西永新牺牲的），但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崇高的品德，以及对部属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的精神是我永世难忘的。

### 被诬为“AB团”

一九三〇年十月，一、三军团陆续东渡赣江，转到新干、乐安、宜黄、崇仁、南城等地。十一月，我们红三军在黄陂、小布一带进行整训。这时，各部队进行了肃反，打“AB”团。

由于当时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加上缺乏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因此，肃反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倾向。

那时候打“AB团”的做法，是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完全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白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然后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

“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特别是在同一个地区来的人中，只要抓出一个，往往就牵连一大片。如

我们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因为都是一块来的，互相认识，所以在这个连抓出来一个吉安兵后，就“供认”出了半个连的人是“AB团”。

我们红三军抓“AB团”是从八师政治部开始的，而八师政治部又是从政治部的秘书长首先开始的。随后抓“AB团”的运动就蔓延到我们第九师。

我和我团副团长陈华堂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诬为“AB团”，并突然被拘留受审的。

有一天，我和团政委贺水光及陈副团长正在研究各连的情况，师部的通信员送信来了。当时我坐在门口，伸手去接信，可通信员不给，而给了贺水光同志。贺政委看了信后，低下头愁眉苦脸地不吭声。我问：“什么事？给我看一下。”贺政委没有抬头，只是把信递给我说：“你看吧！”我接过信，并念给陈副团长听（因他比我识字更少）。信中写道：“贺水光同志：据报李聚奎、陈华堂确是‘AB团’重要分子，请立即捆送来部。”署名是师政委戴奇。我当即把驳壳枪和皮包交给贺政委，他不接，只说：“你放着吧！”我要他把我们俩捆起来送师部去。他说：“不捆。”我要通信班长拿两根绳子来，通信班长不知道要捆谁，就拿来了。贺水光同志一手就把绳子抢去了，大声说：“不准捆！”我说：“那怎么办？你不捆，也要派人把我们送去呀！”他说：“不派人送。”我又说：“你不捆又不派人送，我们在路上（团部离师部还有十里路）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不管！”贺政委赌气地说。当时，我和陈华堂同志都流了泪。我说：“贺水光同志，你放心！我们在路上是不会出问题的。”贺水光同志也流了泪。我和陈走的时候，贺仍然呆坐在那里没有起身。

我和陈副团长到达师部后，直接到徐彦刚师长住的房子里去了，正好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在那里。他们向我和陈副团长说了很多话，中心意思是只要我们承认是“AB团”可保生命的安全。徐彦刚同志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交代问题，现在你们去特务连休息。”我说：“你限两个小时，就是两个月我也没什么交代的。”

当天下午，我和陈就在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同志住的房子里坐了一个下午，当时我们心里都非常难过。心想，如果是在战场上为了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流血牺牲是值得的，可是象今天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实在太冤枉了，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出不来，就放声大哭了一下午。肖望东同志一再地劝我，他安慰我说：“团长，不要过分难过，事情总可以搞清楚的。”

下午，贺水光政委派通信员给我们两个送来了煮好的鸡汤和白米饭，可是我们吃不下去，就让通信员拿回去，并要他告诉贺政委不要给我们送吃的了。如果能买到纸烟，请给我买几盒来。第二天通信员就把纸烟送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陈副团长被安排在肖望东同志住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住。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人睡一

头。到下半夜,我听到陈华堂同志的呼吸声音不对,急忙起来一看,见他把裤带缠在脖子上,两只手使劲勒。我急忙把他手拉开,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干,如果这样死了,你不是‘AB团’也成了‘AB团’了。”他说:“实在憋得不行,不如早死算了。”我说:“死也不能这样死,宁肯冤枉遭枪毙也不能自杀。”

我们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四天四夜,没有挨打,没有受刑。第二天的半夜,郭天民同志(当时是军部的副官长,他参加了九师的肃反委员会)把我找去谈了一次话。他在谈话中还是叫我承认是“AB团”。我把他的话一一驳回。最后,他说:“我找人来同你对质,你怎么办?”我说:“很好。”这时,他让我坐在房子的黑角落里,不准我说话。然后分头把二十七团团部的一个副官和四连的一个班长叫来,向他们说:“你们团长,副团长究竟是不是‘AB团’,要老实交代。”当时,他俩把以前在逼供之下讲的那些胡言乱语全部都否定了。前后搞了两三个小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郭天民同志只好把他们送走,然后对我说:“老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呀!”他这话把我惹火了,我说:

“你胡说,你叫我坐在那个黑角落里,也不准我说话,他们并没有看到我,我怎么能给他们做什么工作?你不是胡说是什么?”他见我的态度坚决、坦然,就和气地说:

“好吧,你去休息,明天再谈。”第三天晚上,师长徐彦刚同志也找我去谈了话,开始也是软硬兼施,他把手枪摆到

桌子上,对我说:“你如果不好好交代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待你。”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你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就是架上机关枪也吓不倒我。”我还对他说:“我们相识一年多了,在你的指挥下,无论平时工作还是打仗,我哪一件工作没有做好?哪一仗没有打好?我有什么问题你摆出来,讲一个例子也行。”徐师长讲不出来,对我说:“你去休息吧,明天我再给你讲。”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徐彦刚同志来到我们住的房子门口说:“我到军部开会去了,十二点钟回来放你们。”他这一讲,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对陈华堂同志说:“同志,完了,只有四个小时的生命了。”在这四个小时里,我俩谁也没吭声,每人都在激烈地思索着,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我参加革命后的成长进步;想到在我身边倒下的战友;想到了我们二十七团;我想这次即使冤杀了我,将来总会有人给我平反的。

好容易等到了十二点半,徐彦刚同志来了,他在门外喊,李聚奎、陈华堂出来。我当时想,如果是拉出去枪毙,就不会是师长亲自来,顿时心里一亮。我一出门,徐彦刚同志就把我的手拉住,用他的小手巾把我身上的灰打掉,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陈华堂同志到他住的房里去了。我进屋一看,原来桌子上摆了很丰盛的饭菜,徐师长要请客给我们压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同志,听说他是因打“AB团”不力而被关的,那一

天与我们同时放出来了。饭后，徐彦刚同志对我说：“二十五团团长是‘AB团’已经被杀了，你暂去二十五团当团长，叶汤平回二十五团仍当政委，陈华堂还回二十七团当副团长”（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师部调王玉洪同志到二十五团当团长，我仍回二十七团当团长）。从师部临走的时候，徐彦刚同志紧紧拉着我的手，非要我骑他的骡子走不可。就这样我骑着徐彦刚同志的骡子离开了师部，结束了对我所谓“AB团”问题的审查。

不久部队得知蒋介石准备发动向我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即第一次“围剿”）的消息，红三军即停止打“AB团”的活动，转入进行反“围剿”的紧张准备工作。

回想当时我在革命队伍内部“左”倾错误严重的情况之下，竟然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打“AB团”这一关，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当时我和陈副团长始终坚信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绝不图眼前能过关而胡乱“招供”。如果不是这样，我和陈副团长恐怕早就成为被追认的烈士了。

## 第六章 在五次反“围剿” 的日子里

### 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集中了七个师约十 万兵力，对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分八路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歼灭我一方面军于赣南地区。

此时红军的情况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一、三军团组成了一方面军，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主力红军约四万人，又有一块相当大的根据地，所以反“围剿”作战就改变了过去那种打游击的战法。毛主席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态势，提出了“诱敌深入我根据地，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适时进行战略退却，然后再依托根据地的优越条件，进行战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军从井冈山斗争至第一次反“围剿”，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始终采取的是游击战的方针，这是因为当时弱小的红军还是游击队性质，敌人“围剿”规模也不大，根

据地还不巩固,采用游击战的战法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是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情况变了,有必要也有可能以运动战去歼灭敌人。因此,每当我回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当时根据地的军民对“诱敌深入”战略还是有很多顾虑的,对红军的战略退却很不理解,不愿意把敌人放进来打,怕打烂坛坛罐罐。为此,毛主席和一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战前亲自到干部和群众中做动员和解释工作。记得反“围剿”开始前,在宁都的小布召开了一次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挂着毛主席亲自拟写的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横幅是: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亲自到会讲了话。毛主席在讲话中着重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强调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的必要性。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数虽然只有一万多人,但对整个根据地都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增强了我军广大干部、战士战胜敌人的信心。

十二月二十六日,敌先头谭道源部到达源头准备向小布进犯,红军指挥部部署我们在小布伏击谭道源师。但由于敌人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设伏不

成，只好忍耐撤回了。

十二月廿八日，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亲自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于廿九日窜到龙岗。以毛主席为首的红军指挥部抓住了敌十八师孤军冒进，立足未稳，与其友邻廿八师又有矛盾的有利时机，果断命令红军主力秘密向西开进，决心全歼敌十八师。

当时我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任团长。记得我们的部署是，红三军九师担任正面攻击；红十二军大部沿君埠向龙岗西南方向攻击前进；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向龙岗西北方向前进。

从小布到龙岗圩有五十里地，我们夜间秘密行军，于三十日凌晨赶到了距龙岗圩只有几里路的山上潜伏起来。此时龙岗的丛山峻岭都淹没在蒙蒙的雨雾之中。红军战士忍着寒冷，冒着风雨埋伏在树丛中，等待着进攻的命令。

天刚放亮，敌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由龙岗向五门岭进犯。就在敌尖兵连刚进入王竹岭附近时，我们一阵排枪扫过去，一顿饭工夫就把敌人全部报销了。可能据守在龙岗的张辉瓒自作聪明地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阻击的不过是游击队，就强令戴岳继续冲锋。红三军八、九师分别从左、右两翼发起猛烈攻击。九师二十五团从左侧山梁，我带二十七团从两山之间的山沟里（二十六团为预备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此次战斗异

常激烈，伤亡很大。由于受地形限制，我们团和二十五团混在一起了，二十五团团王王下洪同志负伤被抬了下去，二十五团有些混乱。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同志赶忙对我说：“李团长，我们两个团走到一起了，老王负伤了，部队有点乱，你就统一指挥吧！”“好！”我也没客气就答应了。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不久我们吃掉了戴岳旅全部和张辉瓒的一个支援团，然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岗敌指挥部。此时张辉瓒残部已在我军的团团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张辉瓒负隅顽抗，集中火力向我红九师方向猛烈冲击，妄图打开一个口子突围，就在这时我负了伤，子弹从我的右大腿打进，从屁股打出，穿了一个大洞，鲜血一个劲往下流，师长徐彦刚、师政委朱良才正好赶到，他们说，老李赶快下去吧。我说：“没关系，我感觉伤不太重，现在我不能离开，因为我还能走路，肯定没有伤着筋骨。”朱良才政委坚决要我下去。临行时我建议：让预备队二十六团上，这样就可结束战斗了。徐师长接受了我的建议，马上把二十六团团李介思（云南人）找来了，李接受命令后就带着二十六团冲上去了。

担架员把我抬下去了。当经过小别山红军指挥部时，看到毛主席正在向前方观察。毛主席看到有担架过来，就问：“担架上抬着谁呀？”“二十七团团长。”担架员回答。

“啊！老乡！”毛主席边说边走过来，他亲切地询问我的伤情，问道：“伤着筋骨没有？”我说：“没有。”他说：

“那就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他又询问战况怎样。我回答说：“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我下来时已经打到敌人指挥部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好！胜利在握！”

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胜利结束了。我们全歼了十八师两个旅及师部，连师长张辉瓒在内九千余人全部被歼或被俘。我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我们九师三个团长，王玉洪、李介思和我都负了伤，在一个屋子里治疗。我们团政委贺水光同志也挂了彩，二十七团除二连连长逃跑投敌之外，全团的干部都或伤或亡了。

敌十八师主力被歼对敌震动很大，真是“打倒一个吓跑一群”。那些深入根据地的“围剿”军，闻风丧胆，仓皇东逃北撤。红军转旗向东，追歼谭道源师。一月三日，红军在东韶歼灭五十师一部，俘敌三千余，残敌遗逃。五天内打两个胜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了。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英明正确的。从此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的威望更高了，广大指战员都把他比作能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失败，时隔三个月后又调集了二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

“围剿”。这次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

“围剿”开始时，我军主力集中在东固地区构筑工事，等待时机。由于大军集中一地，粮食极缺。有一天，朱总司令带团以上各级干部一百多人到我们二十七团来参观工事，到十一点钟左右，师长徐彦刚同志对我说，要招待参观人员吃中午饭。这可把我难住了，到那儿去找粮食啊！我问三连连长贺振东同志：“你们连中午做什么饭？”他说，只有一升米粉子掺了些小竹笋和田螺，煮了一大锅糊糊。我说先给参观人吃，你们等一下再想办法吧。参观后，我把朱总司令等一百多人领到了三连驻地，就把一大锅稀糊糊抬出来，我先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他吃了一口，连声说：“好吃，好吃！”可见当时红军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朱总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

四月中旬，敌人进到了富田、中洞一线，我军乘敌立足未稳，立即出击。第一仗，我红四军打富田，我们红三军打中洞之敌，进到中洞的敌人是公秉藩旅，被我全部消灭。公秉藩混在俘虏兵中，我们没有发现，他和其他俘虏兵一样，也领了我们发的三块钱路费，跑掉了。

第二仗，我军由富田、中洞出发，追击向白沙退却的敌人，歼敌四十三师大部和四十七师一部。记得我们赶到白

沙时是个夜晚，我带着一个传令班，乘夜间敌人混乱之际，大吼着缴枪不杀，敌人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就乖乖投降了，我们十来个人抓了一百多个俘虏兵。

一个月之内，我们红军由东向西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了福建的建宁、泰宁、黎川等县。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了。我们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枪支二万余支。红军在建、泰、黎等地做群众工作，把闽西和赣南根据地联成一片，扩大了苏维埃根据地。

### 第三次反“围剿”

敌人第二次“围剿”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底惨遭失败后，仍不甘心，很快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蒋介石集中了三十万大军，并且出动了嫡系部队，还亲任“围剿”军总司令。敌人这次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是深入我苏区中心，占领了黄陂、小布、龙岗、兴国、高兴圩、连塘、良村等广大地区。为了调动敌人，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我军公开向富田方向佯动，待敌人调转向富田企图堵击我军时，我军轻装由兴国县的高兴圩附近，在与敌人相距只有十五里路的空隙中，一夜插到连塘、良村。第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接着又打垮来援之敌一个师。我军乘胜前进，经龙岗附近，以一部监视龙岗之南，主力直逼黄陂打了第二仗，消灭了驻黄陂之敌毛炳文部第

八师。到此,敌人的第三次“围剿”遭到了我军的严重打击。敌之十九路军集中在兴国县的高兴圩,准备向富田、吉安撤退,先头旅(独立第九旅)由高兴圩经老营盘向富田撤退时,在老营盘被我们三军彻底消灭,一个未漏。在老营盘战斗的第二天,我们红三军正在行军途中,遭到敌机扫射,黄公略同志在指挥部队疏散隐蔽时中弹光荣牺牲。黄公略同志牺牲了,我们红军指战员无不悲痛万分,他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他的阵亡,对红军建设是个重大损失。

随后,我红三军在追击敌韩德勤师至方石岭,歼灭该敌两个旅。至此,敌人第三次反“围剿”全部被我打垮,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斗胜利结束。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以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休整、补充、训练、筹措给养、恢复和建立党团及政权组织,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为此,首先要打掉盘踞在苏区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土围子。红四军当时在石城地区。我们三军各师的任务是:七师围攻南村土围子;八师围攻马安石寨子;九师围攻上堡土围子。我们二十七团担任打上堡土围子,由围子的西北面挖坑道逼近围子脚下,然后用土硝装在棺材内,外面用铁丝捆紧,然后炸毁围墙。正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徐彦刚同志告诉了我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了。这确实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此红军又增加一万多人,成立了红五军

团，下属十三、十五两个军。壮大了红军力量。另一个消息是调我到八师任师长。我接到通知后就到八师去了。此时八师正在围攻马安石寨子，经过半个月的土工作业，已把寨子紧紧围住，断绝了敌人的粮源、水源。最后，经过宣传红军的政策，向敌喊话，敌人自动投降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当时的中央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要求在江西攻取南昌、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红三军围攻三面环水又严密设防的赣州城，苦战月余，攻城不下。三月毛主席赶赴赣州前线，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

四月，我军主力由赣南转向福建龙岩，消灭福建军阀张贞部的一个主力团，并占领龙岩县城。四月中旬，我军攻取漳州，俘敌二千余人，缴获枪支两千多。我军主力去福建时，我们八师留在赣南信丰县新田一带发展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肃清地主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我军主力由漳州回师赣南后，我八师归建。后又于六月向广东南雄的水口进军，在水口与广东军队遭遇，苦战一天，因敌众我寡打成对峙，我军伤亡较大，即回师赣南进行整顿。经整顿，撤销了三、四两个军的军部和三军八师、四军十二师。一军团直属四个师即七、九、十、十一师。八师撤销后，我调任七师师长。第四次反“围剿”的黄斯渡、浒湾战役后，我又调任九师师长。这样一来，我在红三军里原任九师二十七团团长，在粉碎敌人第三次

“围剿”到反五次“围剿”开始前这段时间里,在红三军的三个师都当过师长,直到腾田改编。

## 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一月底,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大举进攻,集中其主力,以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对我中央根据地进 行 第 四 次“围剿”,当时我在红一军团红三军任九师师长。

在敌人对我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毛泽东同志虽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但其战略战术思想,在红军中仍有深刻的影响。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以及聂荣臻等高级指挥员,看到我军进攻南丰城三日未克的情况后,果断地将红军主力秘密地转移至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待机歼敌。

二月二十六日,敌人主力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敌第一纵队代指挥官李明接到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后,立即率领本部从乐安出发,又命令五十九师从崇仁出发,杀气腾腾地往广昌、宁都方向直扑过来。当时军委命令五军团和二十二军组成右翼队,由一、三两军团和二十一军编为左翼队,左翼队由一军团首长统一指挥。军团首长分析了敌情,命令我们隐蔽待敌,准备以大兵团伏击的方式将敌五十二和五十九师歼灭于黄陂大龙圩地区。

黄陂地区，山连岭，岭连山，绵延几十里，望不见头也看不到尾。在古木参天的群山之中有一条十步一弯、三十多里长的狭谷地带，是从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红军主力就准备埋伏在这狭谷的登仙桥、大龙圩、胶湖、黄陂、霍源等两侧的山上，以突然而猛烈的攻势，歼灭敌五十二、五十九师。

我接到军团首长向伏击阵地出发的命令后，便率领九师连夜向大龙圩方向急进，那几天正逢连日阴雨，山野昏暗，道路泥泞，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只能披荆斩棘，走山间小路。二月二十七日拂晓前我们到达伏击阵地。当时的部署是：第十、十一师埋伏在面对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此两师由军团聂政委和林彪直接指挥。我们第九师隐蔽在大龙圩以南的山坡上，七师在胶湖附近。九、七两师由保卫局长罗瑞卿和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同志指挥。

二十七日十三时，战斗首先由七师与敌前卫旅在胶湖打响，一开始就俘虏敌人一个连长。据他供称：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个旅在大龙圩。于是徐、罗两位首长即向我面授任务：“你们九师直插大龙圩，动作要快，袭击敌人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我奉命后，带领九师立即向大龙圩奔袭，到距大龙圩约一里路处，我趁雾散开的刹那用望远镜向敌方瞭望，看到大龙圩村边的小河桥上有一个敌指挥官，穿着雨衣，正拿着望远镜向有枪声的胶湖方向张望，他的身后有一匹高头大马和牵马的马弁，再后有十余名

提兜、带包的军官，我分析这肯定是敌人的指挥机关，那个拿望远镜的人不是李明也是一个较高的指挥官。于是，我命令部队一线摆开，以急袭的方式向大龙坪包抄猛袭。通常情况下，机枪连只做火力掩护，不打冲锋。这一次为了增强火力达到突击的效果，我叫机枪连也一起上去了。仅仅四十分钟，我们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

战斗结束了，一队队丢盔卸甲的俘虏兵被押送到后方；一堆堆缴获的武器装备在装车往后方运送；我正站在大龙坪小街的一个高台上指挥部队打扫战场，“报告！我们抓来了敌人的一个师长！”报告人是二十五团机枪连的一个班长，我转过身去，看见他们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敌军军官，这人胖得出奇，他那鼓鼓的肚皮上不停地淌着血。我问机枪班长：“他伤在什么地方？”班长说，“胸部。”我对敌军军官说：“你就是李明吧？”他摇摇头说：“不是！我是书记官。”这时俘虏中有人说：“他就是李明。”我严正地说：“李明！共产党的政策你可能早就听说了吧！”他连连点头说“是！是！”我看到他胸脯一个劲淌血，脸色苍白，就叫侦察参谋彭治明同志亲自押送，由四个俘虏兵抬着送到后方医院去了。

打扫战场后，我们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我方仅伤亡四十六人，但战果很大，歼灭了敌十二师直属队及一个旅的全部，俘虏敌师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

清点完毕，我正准备去军团部报告战果，恰好聂政委

来了,我赶紧跑过去报告了战斗情况,聂政委听说我们已全部歼灭了这部分敌人并活捉了李明,非常高兴,个子高大的聂政委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高喊道:“好哇!”“红军万岁!红军万岁!”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敌前线总指挥官陈诚获悉他的第一纵队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在黄陂被歼的消息后,急忙调整部署,改变计划,将原来的三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的方针,并于三月上旬将集中于东陂、黄陂圩、霍源、固陂、腔湖

左翼红一、三军团、红二十一军团及独立第五师在聂政委和林彪的率领下，抵达东陂、草台岗西侧一带山区。敌后纵队之第九、十一师刚抵草台岗、东陂附近，即被我军分割包围。

按照命令，我们应在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前赶到预定出发地，可是由于根据地群众为防范敌人进攻，把玉华山一带的树木砍倒横在路上，很难通过，所以队伍行进速度缓慢，赶到时已是十时了，聂政委生气了，这时十师、十一师已向黄柏岭之敌展开攻击。聂政委和林彪便命我师隐蔽待机，作为预备队。

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山坡陡峭，易守难攻。十师、十一师一左一右向黄柏岭发起多次猛攻，但因敌人居高临下，凭险顽抗，十师、十一师屡次冲锋肉搏未克，双方伤亡都很大，一军团已有三个师长负伤。听说右翼军损失也较大，彭绍辉同志的胳膊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伤致残的。

下午三点钟左右，林彪把我叫到指挥所，对我说：“……从拂晓打到现在了，还没有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上去，从正面的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两个小时拿下来……”我考虑了整个作战计划，思忖片刻后对林彪说，从山垭口正面强攻不利，敌人有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山垭口封住，我们就攻不上去。林彪说，那怎么办？我说以一个团向山垭口佯攻牵制敌人，两个团从垭口左边的两条山梁上

进攻。另外，部队展开后不能打两个小时，要争取在一个小时内解决问题，否则形成对峙，对我方不利。林彪同意我的意见，并说在一个小时内解决战斗更好。

我受领任务后，马上组织部队进攻。我们师的具体部署是：由二十五团负责在翼侧掩护，并派少量部队对山垭口佯攻，我带二十六团，师参谋长耿飚带二十七团，分别从垭口左侧的两条山脊上攻击。我们师的战士已休息了半天，早就按捺不住，他们象猛虎扑食一般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山头冲去。

我和二十六团政委刘华香冲在前面。一开始我们火力很猛，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进攻速度较快，但因是仰攻，越往上越难打，速度就愈来愈慢。在进攻到离敌人盘踞的山头只有三四十米时，敌人喊叫起来：“不打了！不打了！我们投降！……”听敌人这一呼喊，我前沿许多战士放松了警惕抬头观察，狡猾的敌人便乘机扔下一捆捆的手榴弹，在红军战士中爆炸了，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我火冒三丈，心中很着急，因为我改变了林彪的作战部署，立下了军令状，如果在一小时之内拿不下来，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我脱了军衣，光着膀子，拿起驳壳枪，要带部队往上冲，刚走出两步，被刘华香同志拦住了，他拉着我的胳膊说：“师长，你不能上！部队还要靠你指挥，我上！”我俩正在争执，有两个战士前来插话说：“师长，我们不能这样攻了……”我一看，这两个战士都是参加过宁都暴动的老战

士，曾在冯玉祥部队当过骑兵，善用马刀。听他们这一说，我冷静了一点。我说：“你们说怎么打好？”他们说：“派两个人带手榴弹和马刀从山凹里爬上去，兜他们的屁股……”我说：“这个办法好，就你们两个去好吗？”“好！”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作好准备，捆上手榴弹，就出发了。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对刘华香同志说：“命令所有的火器在原地向敌人开火，没有命令不准冲锋。”过了没有十分钟，手榴弹在敌人屁股后面响了，敌阵地一下乱了套，我知道，两位战士上去了，随即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部队冲上去了，山头的敌人这回可真的投降了！与此同时耿飏同志带着二十七团也冲上来了。不到一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不久，军参谋长徐彦刚同志也来到前沿，命令我们整顿队伍，继续追击敌人！

黄柏岭战斗，我军虽然伤亡较大，但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敌师长肖乾和他们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们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打死敌人两千多人，俘虏敌人一千七百多，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我军在黄柏岭的大捷宣布了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彻底失败。

## 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其中以五十

万兵力,从四个方向进攻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次敌人的战术变了,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都主张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记得在十月初,朱总司令曾在三军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要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我们要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使敌人回头向南昌修堡垒……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一开始就搞所谓“寸土必争”、“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和“积小胜为大胜”那一套,使毛主席、朱总司令一贯主张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没能实现。第五次反“围剿”打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大小战斗打了上百个,但没有打过一次痛快的歼灭战,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把敌人击溃打跑为止。这种仗越打越被动,越打越憋气,苏区根据地也越打越小,三十个县,最后除兴国、于都两县外都被敌人占去了,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第五次“围剿”中,我红一师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苦仗。其中三岬嶂战斗,给我的印象最深。

三岬嶂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第二阶段在福建省建宁县的三岬嶂与敌人打的一场恶仗。我记得当时作战情况是这样的:敌人有三个师的兵力向三岬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岬嶂,对建宁方向我军的作战威胁很大,因此一军团首长命令我师必须迅速占领三岬嶂并且坚决守住。我接受任务后即命令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迅速占领



红一团的战绩。杨得志同志不愧是红军中有名的战将，他所领导的红一团是能攻能守的部队。我们师的许多艰巨任务大多都是交给红一团去完成。红一团屡屡立下战功。得志同志领兵打仗的指挥才能，在长征中，以致到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所领导的一团的营连干部，如孙继先、陈正湘、尹先炳同志，后来都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当然不只是一团，二团、三团也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团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我们一师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高兴圩、狮子岭，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的起伏地，这仗打得也很艰苦，仍是红一团担任艰巨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坚守一个月左右，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有一天林彪来到我们师部，他简单看了一下战况，然后小声地对我说：“你回去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五军团的第十三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他说完这番话后，又神秘地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我问：“有什么行动？”他说：“以后再说。”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大的军事行动”，就是战略转移——长征。

## 第七章 长 征

### 从 兴 国 出 发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即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我们红一师还在江西兴国县属的高兴圩同敌人进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斗。一天上午，军团长林彪来到我们师指挥所，告诉我们把部队逐渐收拢起来，把阵地移交给五军团的第十三师。但这时他只跟我们说部队有一个大的行动，并没有提到要离开苏区的问题。

十月十五日，我们刚收拢集结于兴国县的东南地区，军团司令部派机要参谋给我们送来林彪、聂荣臻写交我们师长、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信中指定一师（附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军团右翼队，于十月十六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同一天，上级给我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五百块大洋，我师长征就此起步。

那时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情，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过去部队转移，只

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照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便不得而知。后来我们才知道,对于红军主力这次转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不但我们当师长的被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

这样,我们部队离开兴国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而且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离开那么久,离开那么远。但是根据地的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到红军主力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在部队出发那天,他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聚拢来了。在队伍行进的道路两旁,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集在一起的人流……

这时,我师指战员的心情异常沉重,大家都为主力红

军离开根据地后人民群众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洒衣襟，同乡亲们依依惜别。为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带着几名干部暂时留在后面，并给乡亲们作一些当时所能作的解释工作，告诉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就这样，我们红一师离开了生活、战斗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告别了夹道送别的亲人，踏上了新的征途。

### 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整个方面军出发时，分四路向西推进。一军团为左前锋，三军团为右前锋，中央纵队居中，九军团、八军团分别配置在中央纵队的左、右两翼，五军团殿后。这次部队行动，既象一次大搬家，大批辎重，如兵工机器、印刷机，也随军转移；又象一台四个人抬着走的轿子。真是负担沉重，行动笨拙。这种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使所有部队几乎都成了掩护队，行军作战都受到极大影响。确实“象叫化子打狗”似的，只能边走边打。

十月二十一日，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袭占新田。这里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的一个重要阵地。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团。我们猛攻了一个下午，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当天晚上敌人就跑了。与此同时，红二师六团袭占金鸡，红三军团袭占固陂，也旗开得胜。

全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十一月三日，红一方面军在城口附近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大概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已经无密可保，这时，上级才正式通知我们说，红一方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要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山。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的速度减慢了，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而湖南、广东敌军则乘机从两侧向我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的三面紧逼，全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路来了。情况十分危险。这时，我一师正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接军团首长打来的电话，令我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要求我们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我当即令一、二团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自己带红三团撤出阵地，来到了全军的前头。

就在这里，我们遇见了随中央纵队行军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那时他们正在路旁休息，见我带着三团来了，没等我开口报告情况，周恩来同志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

我一听，知道首长们已了解我们是来担负开路任务的，就没有说什么。接着，周恩来同志摊开一张五万分之

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我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然后周恩来同志嘱咐说：

“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我一边领会首长的意图，一边考虑队伍如何前进，并随着周恩来同志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所作的一个个标记，计算着一路上需要撤下多少部队，然后又琢磨着最后如何才能收拢这些部队。当时我感到部队撤下太多，战线拉的太长。周恩来同志看出我的顾虑，就笑着给我解释说：

“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

周恩来同志布置完任务后，毛泽东同志接着对我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最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也是我从他受王明路线的排斥而离开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

岗位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多没有见了，此时见到了他，我心里特别高兴。尤其是这次又听到他所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过去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就连声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我带红三团受领了前头开路的任务后，由于聂荣臻同志及时指挥红二师四团占领了乐昌附近的制高点——九峰山，再加上三军团从右翼占领了良田，这就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了中央军委纵队，也使我们作为中央及军委纵队开路的部队安全地通过粤汉线，并为随后攻占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我带领三团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宜章县城后，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也赶到了，紧接着红二团也上来了。于是全师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可是当时这两个县城因守敌早有准备，设防严密，如要攻占县城须费时间。恰接军委来电，令我们除派少量部队监视两城之敌

外，部队不要停留。于是我们继续西进。

部队通过嘉禾、蓝山后，横在我们面前有两条由南向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相隔一百多华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了。湖南何键的部队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两边步步逼近。敌人企图合击我军于潇水之滨。因此，先敌占领这一带的大渡口——道县，并迟滞追赶之敌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把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我师。十一月二十二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飏、政委杨成武同志的率领下，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岸边的道县获得成功。我师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部队，在四十里的正面阻击敌人。当中央纵队从我师控制的地段渡过潇水后，军团首长命令我师继续向湘江前进。这时，我师的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我先利用沿途的长途电话线同五军团司令部联系，告诉他们我师要立即往前赶，请他们来接替警戒的部队尽快向这里靠拢。电话中传来了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的声音，他说：“同志呀！你们的队伍现在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有上来哩！”第二天，我们在行进中遇到了红三军团司令部，我向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报告了我们军团首长的命令和刘参谋长的指示。彭德怀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后，就说：“刘伯承同志的意见很对，潇水西岸不能给敌人留下空隙，只

有保住西岸，并给追来之敌以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才能使已经过河的中央纵队和部队更远地脱离敌人，放心前进。所以，你们师不但现在不能走，而且我们三军团的六师还要暂时归你指挥（当时六师师长曹德卿同志因病不能指挥）。至于一军团命令你们往前赶，由我向你们军团司令部联系说明。”我素来了解彭德怀同志的脾气，知道他决心一下，就不容更改，只好坚决执行。因此，除二团已随军团司令部向湘江前进外，我带一、三团继续留下防守潇水西岸。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师大部分部队和三军团的六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敌人一次又一次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们打沉了，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能望河兴叹，不得前进一步。我们在潇水西岸迟滞追敌两天以后，才继续向西进发。

总的来说，红一方面军从十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到十一月中旬相继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随后又打击了敌人的追击部队，渡过了潇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猛打猛冲，英勇善战，再加上敌人的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貌合神离，因此，我军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是，红军向湘江挺进，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我军的行动目标。于是蒋介石又调兵遣将，

在湘江两岸麇集了二十个师的兵力，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当时敌人的部署是：前面，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所部和湖南军阀何键所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全州一带，沿湘江布防；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所部，集中于兴安、灌阳一带布防；后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和湖南军阀李云杰的部队衔尾紧追。敌人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消灭我红军于湘江之滨。湘江一仗，是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师撤离潇水西岸，昼夜兼程赶到了全州附近的觉山（即脚山铺）地区。当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由于害怕红军南下深入广西，自动放弃了兴安、灌阳一带的防线，将兵力南移到富川、贺县、恭城一带，这就使中央纵队得以顺利地接近湘江东岸。但驻守全州的敌刘建绪部见我主力红军要渡湘江，就急红了眼，于是从全州倾巢出动，猛攻我觉山阵地。

觉山，北距全州三十来里，南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五十多里，是敌人进入我军渡口的咽喉要地。我师到达觉山时，红二师已在这里同敌人血战了一天。因此，虽然我师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但仍紧急动员，同红二师一起阻击从全州方面进攻的敌军。当天下午，阵地被敌夺去，第二天拂晓，我们组织反击，失去的阵地又被我军夺回。以后敌人三个师在六七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正面猛扑，我第三团在下坡田附近阻击敌人，先后击退敌人的

五六次冲锋。第三天，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了战术，除继续加强正面进攻的兵力、火力以压制我们外，还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后方和侧翼。此时我们的部队，虽然连续四个晚上未睡眠，一天多时间未吃饭，体力极度疲劳，但仍同敌人争夺前沿阵地，不少阵地是在战士全部阵亡后，才被敌人夺去的。

觉山阻击战，由于敌众我寡，敌逸我劳，终为敌所破，但我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给敌以重创，迟滞了敌人的行动，这对于掩护整个部队渡过湘江起到了作用。

在我们一军团于觉山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激战。他们也都打得很艰苦，损失很大。

湘江一仗，虽然全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最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扔进了湘江河里，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了将近一半。

## 遵义会议前后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之后，广大指战员眼看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减，无不痛心疾首。

那时我们的心情，正如刘伯承同志在他《回顾长征》一文中所描写的：“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一渡过湘江，国民党蒋介石就觉察到我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十多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在我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构筑碉堡，设置新的封锁线，全力堵击红军北上。

与此同时，地处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虽然曾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并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占领了澧州、桃源，威胁常德。但因城步、武冈已被敌军占领，中央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被堵了，要实现原来的计划已经成为不可能。

面对这种不利情况，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一方面继续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地区向湘西北发展；一方面强令中央红军北上，硬要往敌人的“口袋”

里钻，我军处境十分险恶。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决主张中央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仍未能说服博古及李德等人。

十二月中旬，大概是在通道会议的一周之后，我一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当时黎平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个团驻守，但他们在我先头部队未到达之前就弃城而逃，溃兵退到十万坪，驻十万坪之敌也跟着向后逃跑，一直退到五里桥。贵州敌军这种望风披靡、狼狈逃窜的情形，同湖南、广西军阀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情况，引起了到达黎平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又进一步了解到，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这四个派系名为统一、实则各据一方，时常内讧。王家烈虽名为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主持贵州军政，但实际上能够由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两个师而已。还了解到，贵州的统治者为了开辟财源，中饱私囊，除立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公开宣布开禁鸦片烟，种罌粟、吸鸦片烟到处可见。富人靠

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贫富悬殊，矛盾极为尖锐。特别是军队也抽鸦片烟，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加一杆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它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基础。

不过，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干部得知这次会议精神是在我们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一天，我们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里通过，听说我们红一师师部在这里，前梯队也停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那天，我们司令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间，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那时毛主席也用这个

词)没有?他们谈话后,接着就是吃饭。那时招待领导同志吃饭,只要有点肉,就算是好饭了。他们见炊事班一下子端上来了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了,见上来了肉,竟喊了起来:“嗨,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笑语不断,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在什么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他们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向我们提起,所以我们也不便于发问。

中央领导同志吃完饭正出门时,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同志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说:

“里面有饭,快去吃吧!”

毛主席对李德说的这一句话,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把它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我们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但一下也纠正不过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大家对李德确实很反感,特别讨厌他那一套论调: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三十多个县,十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应该打正规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呀!还有什么短促突击呀!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呀!记得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的時候,有一次他在一军团的师、团长会议上,给我们讲“短

促突击”的战术课，从头一天晚饭后，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更加讨厌的是他完全凭地图指挥部队打仗行军，至于地图准确不准确？部队吃上饭吃不上饭，有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这些他都全不考虑。所以，广大指战员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失利归咎于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一军团在向剑河前进途中，接到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当即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向我们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当我们听到“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时，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当我们听到“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我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随后，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两路挺进，一路上连战皆捷，进军迅速。十二月底，全军部队逼近乌江南岸。当时中央军委授命一军团先渡乌江。我红一师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进抵回龙场渡口。时值新年，但部队指战员没有举行联欢，

而是组织讨论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战斗任务。

这时贵州军阀的军队在沿江各渡江口构筑江防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在尾随我军进入贵州后，也已到达黄平、三穗、镇远一带。因此迅速强渡乌江，就成为红军的头等紧迫任务。

我师在回龙场组织强渡时，由一团任前卫。一月二日，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的带领下，一方面用火药压制对岸敌人，一方面组织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三日上午强渡成功了，全师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二师也在江界方向经过同敌人的激烈战斗之后，于三日渡过乌江，随后又占领了遵义城。

一月十五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就在这里胜利召开了。

我们党揭露和批评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及长征初期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被确立了，他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就是始于这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战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直接反映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我一方面军攻下遵义之后，蒋介石纠集了湘、川、桂、黔各军阀部队以及嫡系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急进，妄图围歼我方面军于乌江西北的狭窄地区。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为了打破敌人企图从四面八方围攻我一方面军这个严重局面，一方面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指挥红军由遵义地区向川南前进，北渡长江。一方面要求在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之前，密切协同作战”，西渡嘉陵江南下，牵制川敌，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于长江一线；同时要求在湘鄂川黔边境的红二、六军团积极向东出击，牵制湘鄂之敌，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

当时，中央确定一方面军向四川进军，北渡长江，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宜宾到泸州一线。

一月十九日，一方面军分兵三路指挥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我红一军团从桐梓出发，于一月二十三日进占东皇殿（今习水），驱使黔敌侯之担部向南北逃窜。随后我红一师为全军开路，经猿猴（元厚）场向旺隆场方向疾进，一月二十六日在离赤水县约三十里的黄陂洞，与由赤水县向土城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遭遇，敌先我占领右侧高地，并凭借左边的工事对我师施行火力封锁。我师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此时，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已抵达上城。但由

温水而来的四川军阀部队也紧追不舍,其先头部队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的第六团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我后卫的五军团形成对峙。一场恶战在土城地区展开了。

为了消灭川敌郭勋祺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二十七日,他们一方面电令我红一师在黄陂洞阻止敌人南下,一方面令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迂回包围郭旅。当时,我师虽受敌三面包围,但为了土城战斗的胜利,仍英勇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红二团的领导同志见情况危急,曾建议撤出战斗。我说,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土城的战斗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遂又坚持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和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到他们那里去。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这次见到我们(耿飏同志因指挥部部队过

河未到)时,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我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是军事领导上的问题不解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十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所以又再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从宜宾到泸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

“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指我）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

“你看行不行？”

“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主席又问：

“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

“还有三千多人。”我回答说。

“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了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当时我和黄甦、谭政同志都为能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示而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这是毛泽

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而在当时也就是这样做的。

当我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八九日到达滇东北扎西时，蒋介石急调滇军三个旅到镇雄地区堵击，又令川敌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来，中央军周浑元向扎西地区扑来。这时，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审时度势，鉴于各路敌军奔集而至，而黔北敌军薄弱，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再重入贵州。于是，红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二十日二渡赤水河。甩开了川敌，使蒋介石妄图合围红军的企图落空。

我师经古蔺以南在太平渡二渡赤水后，先头部队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同志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向东前进，二十四日晚到达桐梓，趁黑夜展开攻城，不到两个小时，守敌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两个连便向娄山关溃逃，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再占桐梓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红军突然回师黔北，直指遵义，这是蒋介石所未料到的。他为阻拦红军挺进黔北，除急令中央军向遵义靠拢外，贵州军阀王家烈还亲自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部队刘鹤鸣的第六团守娄山关，企图凭天险顽抗，以待援军。但在红三军团的强大攻势下和一军团的配合下，经半天的时间反复冲杀，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娄山关，遂为我红军占领。

夺得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据了。一、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二十七日,彭德怀同志指挥三军团占领遵义。我师进抵遵义时,没有进城,而是从城东门外打到南门外,配合二军团作战,先打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随后又同三军团一起猛追逃敌,直到乌江边。由于敌人砍断了江上的浮桥,才免于全部覆灭。整个遵义战役至三月一日上午结束。

一周之内,红一方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

我军取得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胜利后,即移师遵义城西南约三四十里的鸭溪地区休整约一星期,这是从江西出来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并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息,部队情绪很高,指战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

我军在鸭溪地区休整后,敌人又重整旗鼓,北渡乌江向我袭来。于是我军迅速主动放弃遵义,于三月十六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仍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不料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掉头向东,于三月二十一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然后又掉头南下,从而把北线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我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初起,能够改变军事上不利局面,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纵横驰骋于川、滇、

黔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歼灭敌人,使蒋介石一个又一个“围剿”红军的部署失灵,使红军安全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继续顺利地长征。这一切,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遵义会议确实确实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一方面命令红九军团暂留在乌江北岸黔北地区,伪装我军主力,吸引和牵制敌人;一方面率领其余红军直插乌江边,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自三月二十七日起,分别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活动。他们在战斗行动中,到处多打旗帜,多点炊烟,故意造成声势,吸引了在贵州的大部分敌军,掩护了红军主力南移。以后这部分红军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带领下,转战数千里,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部队的的光荣任务,而且吸收了两千新战士,扩大了部队。

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次重渡乌江,由红三团任先遣队。三月二十九日夜,红三团在团长黄永胜的带领下,冒着狂风暴雨,从手扒岩乘竹筏渡到乌江南岸。部队上岸后,迅

速击溃了敌人的江防部队，并活捉了敌人的一名营长。随后即由军团的工兵连在大塘河、梯子岩、江口等处架设了浮桥，四月一日前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了乌江。

红军南渡乌江后，又以一个团的部队伪装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而大部队则分数路南下，直逼贵阳。

红一方面军这一扑朔迷离的行动，搅得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晕头转向。他忽儿判断红军“徘徊于川滇黔边境，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忽儿又判断“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忽儿说红军“仍企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忽儿又说红军“前遭堵截，后受追击，已是强弩之末，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就是没有料到红军会直逼贵阳。

因此，当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近郊时，全城震动，蒋介石也被吓得丧魂落魄。他一面连连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听用，准备逃跑。

但是，当我军于四月九日通过贵阳郊区时，情况仍是很紧张的。

那时，奉命东调贵阳的滇军已抵贵阳和龙里两地。贵阳、龙里东西相隔百里，有公路接连。头一天行军，一军团靠龙里西侧前进，三军团靠贵阳东侧前进，我师居中偏

西。在行进中，我师和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到同一条路上来了，由于大家都想迅速往前赶，因此出现了抢路和插队的现象。我发现后，令我师部队靠边停步，然后整了整队，把部队带上山坡，沿山梁前进，给三军团让出了大路。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山上露营。第二天一早，我师下山通过公路时，三军团直属队已先我到达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这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正在吃早饭，一见我到来就讲我们一师昨天插队的事。他说：“现在中央军委和大部队都还没有过来，敌人在贵阳有四个师，在龙里有三个师，今天可能从东西两面向我夹击，如果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呀！”我笑着向他说明情况。他似乎没有听进去，但也不再提插队的事了，而向我说：

“你们一师归我指挥！”

我说：“好，你给任务吧！”

他说：“你们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哪一边的敌人出来，都要死打，以掩护中央军委和后面的部队，他们都过去了，你们听命令再撤，到时我派人通知你们。”

彭德怀同志这种当机立断、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对革命赤胆忠心、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当天上午，我师一面在山上监视龙里的敌人，一面派人瞭望对面三军团的行动。不久，中央军委纵队从我们的山脚底下通过了，一些随军长征的女同志也顽强地一瘸一

拐地向前赶。到下午三时，眼看部队已经全部通过了。敌人由于惊魂未定，又搞不清我军虚实，也未敢轻举妄动。但可能由于行动紧急，或者是由于派来给我们送信的人出了意外，在三军团的部队撤出阵地时，我们没有接到他们的通知。随后我们也撤下山来，按计划继续向目的地前进。

红军在贵阳、龙里之间乘敌军惊乱之际，越过湘黔公路，立即转头向西疾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从四月十日至十三日，连克定番、广顺、紫云等县城，随后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二十三日，红军进入云南境内。

这时，蒋介石虽急令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等部尾追我军入云南，但由于蒋军各级官兵普遍存在厌倦情绪，士气低落，行动缓慢，等他们进入云南境内时，已落后于红军数日行程了。

红军进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日行百里，飞速向西，直逼昆明。这时由于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贵州，一时不及回援，云南军阀龙云坐守昆明空城，十分恐慌，急令卢汉收罗一些团防部队守昆明城。但红军却虚晃一枪，从昆明城西转向西北，向川滇边境的金沙江挺进。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穿行在深山狭谷之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五月二日，军委指定一军团在龙街渡渡江；干部团和军委纵队在皎平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渡江。我师奉命从元谋出发，以一团为前卫急行军

抢占龙街渡口。可是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龙街渡口时，江上的渡船都已被敌人拉到河对岸烧掉了。要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我估计一时难以把桥架起来，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后面的部队都拥到渡口来，一旦有情况，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预先命令部队向后架了十五里地的电话线，并派一名参谋等在那里，以便和前来的军团司令部随时取得联络。随后，我们向老百姓那里借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我们用绳栓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曝晒之下。蒸发着一股股热气，使人心闷头昏，汗流浹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

第二天，我召开了“诸葛亮”会，再次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时，杨得志同志同意我说的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若能成功，就可以架起浮桥来。

大家觉得可以试试看。杨得志同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的一头拴在骡子的身上，然后把骡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但无奈江水湍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当我正准备向军团司令部报告情况，恰接林彪从十五里的地方打来电话，我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时，他就说：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不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

“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这时站在旁边的师政治委员黄甦同志就拉我的衣角，示意我不要顶撞，但我还是把话讲出去了。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

“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我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这时，我认定在龙街渡架桥渡江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我想上级考虑情况一定会从实际出发的。部队刚回到村里，军团司令部就来电话通知说：“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皎平渡，从那里渡江。”

龙街渡距离皎平渡约一百二十里地。沿江边没有路，只好走羊肠小道和河边的乱石滩。部队忽儿涉水，忽儿爬山涧，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皎平渡前进。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

“队伍来了没有？”

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

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我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个崖洞里瞭望渡江部队。听说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瞭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开始进行四渡赤水之战，到五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万余里。其间，为了隐蔽我军的企图和调动敌人，虽然部队多跑了一些路，但却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的计划。这一胜利，对红一方面军完成整个长征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迅速北上。一路上途经会理、德昌、西昌、冕宁诸县，然后进入了彝民区。所谓彝民区，其实是汉人、彝民杂居的地方，不过汉人多住在城镇或平原地区，彝民则多住在高原山区。由于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交通阻隔，文化落后，彝民的生活尤为困难。当时，国民党实行的是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彝民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因此我部队通过彝民区时，碰到了许多麻烦。

当时，我师一团任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为红军北上开路。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

凉山彝族自治区。刘伯承、杨得志同志和我走在队伍前面。第一天虽然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了通过的协议，但由于对部落工作没做好，部队也缺乏充分准备，在我们到达时，许多彝民拿着刀枪梭镖，挡住我们的去路，喊着：“汉官不给钱不让过。”我们没能通过又返回出发地。后来总政治部派来了一名懂得彝民风俗、语言的干部，各级也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并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路向彝民喊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面散发一些财物，这样才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五月二十四日，我们一天一夜冒雨行军一百四十多里，来到距安顺场仅十多里路的马鞍山顶。这时大渡河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大渡河纵贯横断山脉，河水从崇山峻岭奔泻而下，白浪翻滚，涛声如雷，水深莫测，无数险滩造成巨大漩涡。在安顺场这一段河宽二百余米，流速每秒四米。由于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非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能过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到这里，北渡未成，以至身陷重围而全军覆灭。红军到此时，蒋介石曾疯狂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约十万人尾随追击，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调部队扼守大渡河。那时驻守在安顺场渡口对岸的就是刘文辉所属的一个营。这些情况，在我们向安顺场挺进的途中就已经从群众那里了

解到了。

当时，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刘伯承、杨得志同志和我进到离安顺场几里地的山口，用望远镜向两岸观察，见左前方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就是安顺场。右前方的河这边有两条船，在对岸几十公尺高的峭壁上有三间小房子，分立在三处，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围墙外有四个碉堡和一些散兵壕俯视着河面和上山的石阶，但未发现有敌人活动。经研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夺取河边那两只船，因此，立即派通信员把一营营长孙继先和二连连长、排长、班长都叫来，先让他们用望远镜看好小船停靠的位置，然后令他们带着部队轻装分几路直奔河边，目的就是夺船。刹时间，战士们如猛虎下岗，连跑带蹦地窜到了河边，中间只响了几声枪声，就把船夺到手了。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红军到来之前，安顺场对岸守敌已经估计到我们可能来到，所以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烧光。这一天，对岸守敌的营长认为我军距离安顺场还远，因而仍带着十几个兵乘两只船到安顺场，有的说他是来喝酒的，有的说他是来搬家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先遣队象天兵似的当天就来到了安顺场，他在慌乱中翻墙逃走了。

夺得敌人两条船，我们如获至宝，这可是关系到全军北上的成败啊！因此，如何使用好这两条船，就事关重大了。如果冒险起渡万一遭到损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

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决定,今晚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起渡。当即我们分头找船夫,安顺场的群众因为受到刘文辉的种种剥削压迫,对刘文辉非常仇恨,而且听说要烧房子,就更加气愤,我们一动员,不到一小时,就有二十多名船夫自告奋勇,愿意帮助红军摆渡。

部队的情绪更高。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刚把任务交给二连,战士听到要组织渡河奋勇队的消息,一下就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先恐后报告参加。杨得志同志回忆那个动人的情景时说,营长问我怎么办,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最后决定由营长下命令宣布名单,这样才把奋勇队组织起来。其中有连长一名、排长一名、正副排长四名、战士十一名。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第二天一早,奋勇队在连长熊上林同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与此同时,杨得志同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向对岸射击!”对岸敌人虽然从工事里向我军的渡船进行火力封锁,但由于我方火力打得猛,射得准,密集度高,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十七名勇士飞身下船,占领了滩头阵地,并利用崖上石阶的死角,一步一步地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从碉堡和散步壕钻出来反冲锋,我们这边又立即组织

火力猛射，敌人伤亡很大，龟缩了回去。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向后溃退，十七勇士占领敌阵地掩护我后续部队一船一船的渡河。先是一营长孙继先同志带着全营部队过了河，接着是二营、三营；一团、二团、三团，都陆续到达对岸。我是在渡过一个团以后过河的。这次渡河，全师都是轻装。骡马和行李担子以及勤杂人员随军团直属队从泸定桥过去的。

我军强渡大渡河成功了！这一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当时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对岸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但富林是敌人防守的重点地段，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另一条是经冕宁，通过彝民区到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但守敌力量薄弱，且出敌意外。据此军委除命令第二师五团佯攻大树堡，借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外，决定红军主力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的正确指挥。他们两人是当时军委指定的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司令和政委。一路上，他们在疏导彝民的对立情绪，部署安顺场的抢渡，以及组织部队、动员船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决策作用。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一团的全体指战员。一团接受先遣队的任务后，逢敌开路，遇河搭桥，决心为全军打开

一条胜利的道路。在组织强渡奋勇队时，虽然大家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战斗，但却你争我抢，都要争坐第一船。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同志，开始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但他哭喊着硬要参加第一船渡河，这就是红军不可战胜的秘密。

这一胜利还要归功于安顺场船工的支援，没有这批熟悉水性、通谳河情的船工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摆渡，要治服这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把几千人的部队一船一船地运到对岸，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师一团轻装过河并迅速扫清了对岸的守敌后，五月二十七日，我带二、三团也过了河，这时，中央军委鉴于我几万大军如果只靠两条小船来渡，必然旷日持久，且后面追兵将到，不宜久留。遂命令我师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二师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两支部队分别沿大渡河左右两岸北上，同向泸定桥急进。一路上，我师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敌人凭据隘口，节节抵抗。我们背水仰攻，不顾一切往前冲。第一天，在瓦坝附近打垮敌人的一个团。第二天在德妥消灭民团约百余人。第三天，我们在铁丝沟附近遇上守敌一个旅，部队由山腰绕至敌人侧后，一举攻占了铁丝沟隘口，把敌人那个旅击溃了。从而，既为我们的前进扫清了道路，又保证了在河对岸行进的二师部队不受隔河敌人的射击。五月二十九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冒着枪

林弹雨，夺取了泸定桥。

随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带着大部队从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红一方面军大部队渡过大渡河以后，中央军委除命令红九军团接替我一军团坚守泸定桥外，主力红军继续北上。五月三十一日，我师先头部队进抵二郎山下。

二郎山在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西连大雪山，北接夹金山，海拔三千二百多公尺。有一首《歌唱二郎山》的歌词唱道：

二郎山，高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但那时正值初夏，远远望去，除山巅被云雾笼罩着看不清外，山腰以下却是一片青翠碧绿，倒也生机勃勃，令人喜爱。

二郎山有一个隘口，叫飞越岭，是我们北上必经之道。头一天，我们就了解到这里有川敌刘文辉部一个团把守。我们到达后，即乘夜色组织部队正面仰攻，但由于地形狭窄，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兵力展不开，所以是夜仰攻受阻，被挡在山前。第二天一早，我们令一个连从敌人阵地左翼攀援而上，然后向下滑，袭击敌军；同时令担负仰

攻的部队从正面猛冲。这时，从化林坪赶来的一师部队，又袭击了敌人的右翼，一时间，喊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撼整个山谷。敌人支撑不住了，扭头就跑。我们占领了整个阵地，大部队通过了二郎山。

翻过二郎山后，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条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铁索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结果林彪第一次也没有过去。不晓得他过泸定铁索桥时是怎么过的。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队伍陆续地过去了。

我师到达芦山时，敌人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芦山城在这一带是一个好地方，城里大约有两万多人，四周有城墙，街上商店里有由成都运来的货物，晚上还有电灯。城里的老百姓虽然一下搞不清红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但他们见红军不拿群众的东西，不拉民夫，买卖公平，说话

和气,因此对我们不仅不惧怕,还主动给我们送柴火、蔬菜。我们师在这里得到了自过大渡河以来最好的一次休息。

## 会合红四方面军

我师占领芦山后,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经宝兴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会合。一师随二师跟进。

夹金山海拔四千二百多公尺,山上终年积雪,人称“神仙山”,意思是说只有神仙才能过得去。红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时,正是炎热的夏天,部队指战员都是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冰天雪地,更料想不到六月天气山上还有雪。可是当我们进入宝兴境内时,只见前面山峰高耸入云,团团云雾在它的四周盘旋,满山白雪皑皑,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这一奇异的景色使大家惊叹不已。这时,不断传来先头部队红二师从当地群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据当地居民讲,山上大雪纷飞,气候变幻无常,要想过山,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滑倒。此外,居民还说在山上不准大声讲话,不准哈笑,不准坐下,如果那样,山神就会把你打死。在山上不要大声讲话、哈笑和坐下,在那种气候条件下,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因为大声讲话、哈笑,消耗人的气力;坐下,不活

动,会把人冻僵。但居民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山神的惩罚,则是由于对他们不能作科学解释的缘故。

当时,我们对过夹金山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早在从芦山出发时,各级指挥员就向部队作了过雪山的动员,并不断把在雪山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向部队作了交代。同时组织了强帮弱,大助小,争取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此外,每个人都准备了足够的干粮,一路上部队的情绪很高。“翻越夹金山,气死活神仙!”“制服大雪山,会合四方面军!”的口号声彼伏此起。

六月十三日九时,我师部队浩浩荡荡向夹金山进发。刚到山上接近积雪的地段时,便觉寒冷透骨。像赤身进入冰窖一般。开始路还好走,也不太陡,一进入积雪中心地带,只见左右雪崖陡立,道路晶亮溜滑,稍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崖、掉进雪堆里。越往上爬,越觉奇寒袭身,浑身哆嗦,牙齿打颤,不少战士虽然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也无济于事。到了山顶,气候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呼啸,雪花飞扬,天地混沌一片;时而阳光喷薄,四外炽白,刺得人眼难睁。同时,越到高处,空气也越稀薄,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腿软,喘不过气,大家只能闷着头往前走。这时,有的同志累极了,想坐下来休息。各级干部连忙前后招呼:“同志们,赶紧走!快到懋功会合四方面军去,这里不能停呀!”同志们听到呼喊,坚持着向前走了;一些已经坐下的同志,也马上站了起来,在别人的搀扶下前进

了。

约摸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终于爬到了山顶。该下坡了，下坡比上坡好走得多了。这时大家的劲头更大了，步子迈得特别快。当天傍晚我师翻过了夹金山。

翻过夹金山以后，部队进入了藏民游牧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有建得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要食品；民性甚强，为人讲义气，重信用，民族团结心很强。四川一些商人，经常出入这一带做生意，他们用一些日用品换取藏民的牛羊、皮毛，运往四川成都出卖，但交换很不合理。据说四川商人用一盒火柴（当时叫洋火）就可以向藏民换到一只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等价交换。可是当时藏民都很乐意，认为这是给他们带来了“光明”。有的商人换到牛、羊以后，一时带不走，就寄在卖主家里代养，藏民不但无代价地代为饲养，而且连从寄养的牛、羊中产下的仔子，都如数交给买主。

我们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起来了。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成了严重的问题。

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个人带的一点干粮也吃完了。怎么办呢？有的提出来说，地里的豌豆苗可

以采摘来吃。师政治委员黄懿同志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可是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也不例外，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后来，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出了个主意，他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可以在摘采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就这样做了。

我师越过懋功（没有进入懋功城）抵两河口时。就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会合了。两师相会，象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的情景，真是无法形容。

那时八十八师已在两河口驻扎多时了。我们部队到达后，我和师里的其他领导同志即会见了八十八师的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熊厚发同志那时才二十一岁，身材不高，圆盘脸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举止文雅，初看去，很象一个大姑娘。郑维山同志那时也不过二十四、五岁，也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一见面，熊师长操着满口的湖北口音说：“欢迎！欢迎！我们早就盼望着会合红一方面军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两军会合了，今后红军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因此双方都很高兴，很激动，一直谈了几个小时才离开。八十八师部队还在我们来到两河口时，从给养上给了我们一些支援，使我们很为感动。

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来到两河口，

欢迎政治局委员、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那天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与中央领导同志会晤。会见时，部队还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由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主持，朱德同志和张国焘讲话。接着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两河口会议以后，我师在军团首长的率领下，继续向北前进，中间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等不亚于夹金山的大雪山，但由于大家有了经验，准备充足，就没有象过夹金山那样紧张了。随后，我师部队到了毛儿盖，并在那里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 第八章 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 任三十一军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我们红一师进驻毛儿盖。一天，我去参加驻毛儿盖一、四方面军的干部联欢会，见到了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两天后，军委打来电话催我到职，适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要到军委去开会，我也随他一同前往。在总部，我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时周恩来同志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来同我谈了话。周恩来同志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份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军的团结。”当天下午，我就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了，陈昌浩政委当即把我介绍给三十一军的领导同志。

这时，两个方面军已编成左、右两路军，八月下旬开始北上，两路红军战胜了饥饿和沼泽，穿过茫茫水草地，右

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已到噶曲河畔。按预定方案，左路军应向东与右路军靠拢，两路军并进甘南。此时正值秋汛，噶曲河水陡涨，本来就反对北上的张国焘便以噶曲河水涨为由，强令红四方面军部队掉头南下返回阿坝。

九月中旬，左路军的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和右路军之第四军、第三十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不久，南下部队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我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第九军的二十五师为中纵队，由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任司令员，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任政治委员。十月间，部队到达大金川东北的卓克基地区。一天，王树声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纵队司令部准备和你们三十一军司令部合并，军长余天云调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由我兼三十一军军长，王维舟同志任军参谋长，你当副参谋长。”并通知我去参加当天晚上总直属队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会议地点是在一个大喇嘛庙里，到会人员除方面军总部的负责人外，还有挑夫、马夫、炊事员等勤杂人员。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整个会场乱哄哄的。我进入会场后，就和李井泉同志（我俩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同坐在一个角落里。会议一开始，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讲话，他一开口就说：“自从毛周张博率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一个多月来……”我一听一方面

军单独北上了，心头不由一阵紧缩，就和李井泉同志悄悄地议论：“党中央北上了，红一方面军北上了，那就说明红四方面军这次南下是有问题的。”不久会场上出现了一阵骚乱，各种叫喊声混成一片。原来是有人要朱总司令站出来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只见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军北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你们要我发个声明反对毛泽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不但全中国知道朱毛红军，就是全世界也知道朱毛红军……”朱德同志的话音刚落，有一些人就围攻他。刘伯承同志见他们围攻朱总司令，就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火力”就又转到刘伯承同志身上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红军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过后，就听说张国焘自称“主席”，另立“中央”。

那次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当晚我没有回三十一军军部，而是和李井泉同志在一个喇嘛庙里，睡在地板上，我们两个人合盖着一条毯子，一夜没有合眼，都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前后，南下部队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杨森、刘文辉六个旅，俘获人枪各三千多，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其他一些地方。接着，又南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守敌发起

进攻。当时我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天全、芦山地区多为汉藏族杂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极为困难。

就在张国焘偏安川康边的时候,蒋介石调集薛岳所部和川军压了过来。我军苦战近月,伤亡甚大,部队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特别是百丈一战,我军损失更大。

十一月中旬,我军攻下百丈镇后,继续推进受阻,敌人则以优势兵力向我反扑。一天晚上,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令我三十一军直属队带到百丈后面十几里的一个村庄待命,又令王维舟参谋长在百丈镇负责前送弹药和后送伤员。第二天战斗打响后不久,伤员剧增,王维舟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请你来帮帮忙吧,伤兵太多,我一个人搞不赢啦!”放下电话,我带着通信员骑上骡子就赶到百丈镇。王维舟同志的指挥所设在一家铺子里,我一进去他就对我说:“后面山上发现了土匪。”我心想:土匪算个什么,就说:“打掉他!”

正在这时,“嗡——”一阵引擎声越来越响,几架飞机呼啸而来。“情况不对,土匪哪里来的飞机!”原来王参谋长说的“土匪”实际上是他对敌人的一种习惯称法。

“敌人上来了!”我的通信员在街上大声喊着,我出门一看,只见一股敌军插到了百丈镇街口。这时我们身边没有部队,我急忙跑到隔三四座房子的四军十师政治部,那里也都是机关人员,于是我同王维舟同志仓促地撤了出来。

敌人占领了百丈镇，并对我们穷追不舍。

我们出镇约一里多路，我找到了三十一军教导队，把敌人顶了一下，才阻止了敌人的追击。敌人占领了百丈镇，我们来不及转移的枪支弹药丢在那里。为了夺回百丈镇。我们即请后面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同志赶快派队伍来，趁进占百丈镇的敌人尚未站稳脚跟，将其消灭。不一会儿，四军的一个团上来了。王维舟同志向我介绍了带队的指挥员说：“这是四军十师的副师长陈锡联同志。”我把敌情向他作了介绍，并建议以一个营从正面反击敌人，两个营从敌人的左侧进行侧击。善于猛打猛冲的陈锡联同志一捋袖子：“冲过去，打！”一团人呼啦啦地向敌人压过去，象赶羊似地把敌人赶跑了。我带教导队的一个班也跟着冲进街巷。

回到原来驻的地方，只见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枪支弹药已全部丢光，就连王树声同志的两个背兜也被翻得底朝天，文件撒了一地。我叫战士们赶紧清检文件，居然一份不少。在查点文件时，我发现了一份尚未发出的张国焘准备北上过草地的计划。

百丈一仗，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我军也伤亡近万人，最终还是丢掉了百丈。敌人则集中大批兵力将我军压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与此同时，不断传来党中央率领的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并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广大指战员看到了党中央北上的胜利，逐渐认识到中

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张国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部队重新北上,第三次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经懋功、丹巴,过党岭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七月,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在二、四方面军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张国焘撤消了伪中央,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穿过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到达甘南的岷州。

部队到达岷州后,陈昌浩政委要我(王维舟同志早已调走,我任军参谋长)带九十三师以急行军抢占位于西安至兰州间道上的通渭县。西安之敌胡宗南率部赶到甘南,企图拦阻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我九十三师抢占通渭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击西进之敌,二是与一方面军接应部队取得联系。

我带领九十三师昼夜奔袭,走了两三天赶到了通渭,消灭了敌军鲁大昌部的一个营,占领了通渭,打通了会师之路。

一天,有个便衣通信员骑着毛驴送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由庆阳方面派到界石铺的一个先遣支队在九月一日写给四方

面军的联络信，落款写着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没有署具体人名（全国解放后，我听杨勇同志说，这封联络信是他写的）。

我接读来信，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当即给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写了回信。回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驻界石铺的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负责同志：

你们九月一号来信收到，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到来信，不胜欢迎！

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的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

目前甘南敌情，王均在水礼县西和一带。最近我军一部占领了威县续向徽县推进。鲁大昌被我军围困于岷城一月有余，毛炳文在陇西城及其附近。我军也有一部监视中。其余如你们所知。

致 以

胜利的敬礼！

廿二日夜于通渭

这封由我起草并署着我和九十三师师长、政委名字的信，是在全国解放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把它复印后送给我看的。至于从杨勇同志写信到我回信相隔时间达二十一天之久，其原因大概是送信人在路上耽搁了。

接到红一方面军先遣部队的来信之后，又接徐（向前）陈（昌浩）来电，要我们派一个团到界石铺与一方面

军取得联系。我们当即决定由师政委叶成焕同志带二七四团前去。下午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会，大家听说马上就要同一方面军会师了，一个个喜形于色，非常高兴。谁知在二七四团准备出发的当天晚上，突然接到四方面军总部的电令，要九十三师星夜赶回岷州。我们看了电报，不知道刚刚从岷州来，为什么又要我们回去？

我们按照命令，又是几天急行军，赶回岷州。路上遇到下大雨，黄泥路又粘又滑，战士们淋得一身水，滚了一身泥，病号急剧增多，部队情绪也很低落。我们给总部发电报请示：是什么原因要部队返回岷州？我们应当如何向部队进行解释？但一直得不到回答。我们回到岷州和三十一军军部会合，两天后，又接到命令，要九十三师再次抢占通渭，我们又日夜兼程向通渭县进发。过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张国焘想把部队拉走，绕道青海，西渡黄河去新疆，后因过不去黄河，才不得已又返回岷州，并又令九十三师再度抢占通渭。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我从离开一方面军后，经常想念首长和战友们，长时间眼巴巴地盼望着会师。可是，我却没有看到会师的热烈场面。

我在第二次到通渭后，由于连续冒雨行军，过度疲劳，一下子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昏迷不醒。医生看后说病得厉害，不迅速诊治会有危险。可是军卫生部药品奇缺，

部队还要执行任务,无法保证治疗。肖克军长立即派司令部管理科长陈增连同志,带一个排连夜用担架抬我去四方面军卫生部找苏井观部长治病。我躺在担架上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醒过来问身边的同志:“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已经过黄河两天了。”原来我们一行在黄河边上赶上了正在渡河的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就跟着过了黄河。

## 千里跋涉找党中央

当时相继西渡黄河的部队有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及三十军、九军、五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共二万一千余人。这就是西路军。

三个军西渡黄河以后,同河东红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很快被敌军隔断。十一月上旬,西路军开始向甘肃河西走廊前进,节节取得胜利。但因孤军深入,不久攻势渐钝。

我随四方面军总直属队渡河后,起初一直跟着四方面军卫生部一边行军,一边治病。到达永昌后,我的病已基本痊愈。但这时敌情越来越严重,马步芳、马步青等调集了七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包围我西路军。敌人强悍凶顽,行动迅速,擅长奔袭。红九军在古浪一仗损失过半,由六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就在这时,陈昌浩同志(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到九军任参谋长。

我到职不久，原军长孙玉清同志调走由王树声同志兼九军军长。随后整个西路军转战于永昌、山丹、高台等地，最后在倪家营子被敌包围，苦战四十天。我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奋战，但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弹尽粮绝，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全军悲壮失败，余下的二千多人分东西两路在祁连山区艰苦转战。其中一路由李先念同志率领，西出星星峡，在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同志的接应下进入新疆。我们向东走的一路约三、四百人被敌打散，部分同志化装潜行，从此我开始了一段艰苦跋涉的历程。

初春，江南正是草长莺飞时节，而地处西北高原的祁连山却冰冻雪封，人迹罕至，飞鸟无踪。我们这支几百人的队伍艰难地向东行进。我和徐太先同志走在队尾，负责收容掉队人员。天黑、路险、风寒、人疲，走着走着，前面停了下来，我上去询问，原来是和主队失掉联系，一些同志发起牢骚，引得大家情绪低落。我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赶快走吧，到前面就会赶上的。队伍又继续前进，但掉队的越来越多。

走到天亮时，我们还没有追上主队，敌人开始搜山了，我们只好疏散到树林里隐蔽。极度的饥渴、疲劳，使人象散了架子一样，倒在地上就一头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我查看了一下，周围只有我和朱良才、方强、徐太先及十几个战士。

我们十几个人在这巍巍的祁连山里转来转去，与敌人

周旋了四天。没有饭吃，只好把战马杀了，连骨带肉架在火上烤一下带着血吃；没有水喝，就抓一把积雪，啃一口冰凌……但是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即使不被敌人抓去，也会饿死、冻死，因此，我们决定下山，到平坝子里去探探。

拂晓，我们摸到山脚下一个叫水源的村子附近，发现村子里驻有敌人。我们看到天色渐明，没有地方隐蔽，只得又回到山上，爬到半山坡，在一块枯草坪上喘息了一下。我向大家提议：山下的敌人白天可能搜山，大家还得往高处爬，疏散隐蔽在石缝草丛间，不能让敌人都捉去，天黑后再到这里集合。

同志们三三两两地散去了，我带着警卫员一直爬到山尖尖，那里兀立着一块硕大的石岩，岩中凹部生出几株小树，我俩翻进凹部紧贴小树站着。

日头升高了，依稀可以听到下面敌人搜山的马嘶声、人吼声和零星的枪声，一直闹腾到日头偏西。挨到黄昏，我和警卫员下到半山坡的那块小草坪集合，却不见其他同志。我俩四处寻找，始终不见踪影，看来凶多吉少。（以后我听说朱良才、方强、徐太先等同志就在那天被敌人搜捕去了，受尽了折磨。抗战爆发后，经我党多方交涉，才由青海送回。）

这时，残阳夕照。我一面等待天黑，一面陷入沉思：我从投身红军之日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既打过痛

快淋漓的歼灭战，也打过仓促失措的遭遇战；打过胜仗，也打过不利的仗，但我军从来还没碰到过被敌人吃掉一个整连、一个整营的事情，如今我却亲眼目睹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九军兵殇古浪，损失过半；五军失守高台，壮烈殉难；倪家营子大血战，全军仅剩千把人；石窝分兵，部队失散……西路军全军覆灭的惨烈景象，象整座祁连山压在我的心头，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望着渐渐落入山后的残阳，我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战员也是不会被捕尽杀绝的。到河东去，找党中央去！找红军去！我站起身，带着警卫员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我和警卫员从祁连山下来，沿着山边行走。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走进一个村子边，在一座独立小屋前停下。凭我的经验推断，那些孤零零被甩在村边的小屋一般都是穷苦人家。我们轻轻叩开门，一位身穿破羊皮筒的老乡把我们让进屋，给我们盛来两碗稀饭吃。老乡告诉我们：“马家盘查得正紧，见到红军就抓。你们这样走可不行。”

我试探地同他商量：“我们穿军装走路不方便，能不能换身衣服？”

老乡看看自己身上飞花绽絮的破羊皮，有些为难地说：“我家穷，这衣服太脏了。”

我连忙解释说：“没关系，越破越好。”

于是老乡给我拿出一身满是窟窿的皮筒子和一件光板山羊皮大衣，我把棉军装和一件羔皮大衣留给他。老乡又给了我一顶西北农民所特有的毡帽子。这一装扮，再拿上一根棍子，倒真有几分象个叫化子。

拂晓时，我们两个“叫化子”走到一座庙前，小庙残破不堪，看样子早已断了香火，我们准备白天隐蔽在这里。推开庙门，却见里面躺着两个形枯骨瘦的人在抽大烟，要退出去显然不可能了，我掏出旱烟斗凑上去借着他们的火抽起来。

这两人冲我们打量了一番，问道：“二位是红军吧？”

我们承认是红军。他们抽罢大烟，非要拉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去。我们跟着其中一个进了家。

饭后，我们正要谢别主人，那人却一步拦在门前说：“二位跟我走一趟吧。”

“到哪儿去？”我问道。

“上马家去”说着，他找出一张纸问我们：“你们识字吗？”

我跟警卫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说：“不识字。”

那人把纸递到我们眼前，提高了声调说：“好好看看，我是马家的副官，请事假回来的，跟我走一趟吧！”

我向纸上扫了几眼，看出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副官，那上面倒写着因违犯马家队伍的军纪被开除的。我看出这

家伙是在敲竹杠，就对他说：“这样吧，我身上只有两块钱，给你一块，你放我们走。”这钱是我参加红军后积存下来的伙食尾子。

那家伙思忖起来。我示意警卫员先走，因为他的脚被冻坏了，行走迟缓。我做好了同那个家伙拼的准备：一旦他再拦我，我就不客气地给他一棍子。这位马家“副官”大概看我们确实没有油水可榨，便将两块钱一把抓去，放我走了。

我们迅速脱离了这块地方。警卫员的脚烂得实在走不动了。晚上，我扶着他走进一户穷苦人家，这家老乡同情红军的遭遇，冒着风险收留了他。

我告别了警卫员，一个人继续逃荒要饭向东走。以后，我始终惦记着他，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却一直杳无音讯。

自从西路军惨遭失败后，一向骄横的马家军更加嚣张了。他们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到处搜捕我军人员，不少同志被敌人捕去，惨遭杀害。

我清理了身上的东西，做好牺牲的准备。这时，我身上只剩下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一枚二级红星奖章和一个指北针。枪，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不能让它再落入敌手，我把空枪拆散，把零件一个个丢到山沟里；那枚红星奖章是红军光荣的象征，决不能让敌人沾污它，我把它藏在一个树洞里；那个指北针是第四次反“围剿”时从敌师长李

明手里缴获的，我要找红军、找党离不开它。我用指北针判明了方位，把它塞进支袄的破洞里，开始上路了。

我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这里时而是岩石裸露的山地，时而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卧龙般的古长城蜿蜒起伏向东伸延。我每夜凭借指北针摸黑走上二三十里路，白天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一天，我在永昌以西三十里的水磨沟附近隐蔽。黄昏即将到来，我估计搜索了一天的敌人该收兵回营了，为了早些赶路就从隐蔽地出来，贴近长城边走。古长城象一道屏障为我挡住了左侧，我一面警惕地观察，一面匆匆行走。前面要拐弯了，我想，如果有敌人拐过来当面撞上就来不及闪开，我立刻向路旁的沟里奔去。就在我刚刚下到沟底时，转弯处果真来了五个骑兵，我弯下腰装作在拔草，敌兵看了看，没有过来盘问就走了。

从此，我小心地避开大路，专拣小道走。在永昌至武威间的一个地方，我又一次险入虎口。那天，我路过一个村子，一条大路从村北擦过，我从村南的小道走。眼看要出村了，只剩下最后一座房子可以隐蔽，我谨慎地先探头张望，只见两个骑兵顺着大路跑过来。回去或躲闪，都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怎么办？恰好这时村南的地里有头毛驴，我急中生智，装作赶毛驴，一边吆喝一边跑开了。

武威以东，敌人的搜索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远一些，有时在白天也可以走。一天，我正走近一个羊群，偶

然回头一望，西边尘烟滚滚，由远而近。我问牧羊人：

“后面是不是来了骑兵？”

他看看西边，又看看我说：“是马家队伍来了，你快走吧！”

我对他说：“不要紧，请你把羊向南赶一下。”

我们一起赶着羊群走开了。等敌人马队来到我们刚才站立的地方时，我们已经走出二三百米远了。敌人二十多个骑兵停也没停疾驰而过。我第三次脱险了。

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多月里，我过着昼伏夜行、餐风露宿的野地生活。每天一早一晚，我乘着无人悄悄跑到村边，敲开一座小房讨些吃的。那些穷苦百姓实在好，他们正处在春荒时节，自己明明吃不饱，却总是给我一碗稀饭和炒面。靠着他们的接济，我才能够支撑下来。

终于有一天，我走到了黄河边。

那天晚上，我在路上意外地遇到红三十军的三个战士，我们结伴而行。天放亮时，我们来到黄河边的一个小村旁。

滚滚的黄河劈开峡谷，奔涌向前，没有渡船和熟练的船夫根本别想过河。正巧一位老乡扛着犁、牵着牛来到河边，解开一条小船，准备到河东耕地。我们上前请他把我们带过河。

老乡面露难色，说：“我把你们带过去，马家知道了会把我全家老小杀光的。”

我们不好强求，可是眼望着近在咫尺的黄河却不得过，心里火烧火燎。

老乡又告诉我们：“从这里下去五里路有条渡船，你们可以从那过，那里已经过去好多你们的人了。”

我们按照他的指点匆匆向下游走去，那里果真有条渡船在河对岸。船夫隔河向我们喊道：“等一会儿，我就来。”

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会儿，渡船划过来了，船夫向我们招手，“快来吧。”

我们上了船，他把仓盖打开，叫我们躺进去。他告诉我们，对岸就是兰州通往宁夏的大路，经常有马家队伍来往。我向他打听：去打拉池怎么走？他一再叮嘱说：“你们上岸后不要走大路，一直上山，翻到山那边就是通往打拉池的路了。”

我们躺在狭小昏暗的船仓里，身子随着小船颠簸起伏，耳边是河水的呼啸，我仿佛看到了在高山峡谷间，勇敢的船夫驾着一叶小舟飞越激流的情景。我们平安地渡过了黄河。

下船时，同行的三个战士把背的盐巴送给了船夫一部分，船夫一再致谢。本来是他豁出身家性命帮助我们，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可他却向我们道谢——这就是伟大而淳朴的黄河船夫，这就是伟大而淳朴的人民。

过了黄河，红三十军的三个战士匆匆走了，我因脚痛

落在后头，只好一个人赶路。翻过山，天色将晚，我来到村子边，正走到一个院子前，从院门里出现一个人。此人约二十六七岁，留着平头，身穿半旧不新的蓝色中山装。看他这身装束不象个普通庄稼汉，倒象是在外做事的人。那青年汉子问我：“你从哪里来的？”

我说：“从靖远来。”

“听你的口音象江西人，怎么到靖远来的？”他继续问道。

我虽不是江西人，但南方的口音毕竟无法掩饰，只好打个谎说：“我是八师的，去年打红军路过靖远，因病掉了队，就在老乡家里干活挣口饭吃。”

他追问我：“你们第八师师长叫什么名字？”

“八师师长叫毛炳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样的问题难不倒我，作为交战的对手，敌军指挥官的情况是必须掌握的，更何况这个毛炳文早在江西时，就是我们手下的败将。

他听了我的回答，沉吟片刻，然后狡黠地说：“不是的，你们师长叫毛泽东吧！”

我不由心里一惊：糟了！这个人八成是民团里的。在河西几次与敌人遭遇都脱险了，今天刚过黄河却偏偏给人家送上门来，这可真倒霉！

我正在思忖对策，那青年汉子却解释说：“我原是二十六路军的，去过江西，同红军打过仗，现在销假回家奉

养母亲。”

我听到“二十六路军”心里一动，我们的红五军团就是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的部队，看来他对红军有所了解。

他接着告诉我：“红军现在到了陕北，你们到河西的只是一部分。我知道你有难处，你准备到哪里去？”

我不便明说，便托辞道：“回家去。”

没想到他却对我说：“不要回家，当红军好。红军就在庆阳，你到了庆阳就找到了红军嘛。”他边说边拉着我进了院子，“今天就在我家住一宿，明天再走。”

他又问我：“你在红军里做什么？”

我说是个伙夫。他打量着我，推断道：“看样子是个当官的吧，可能官还不小呢，起码是个连长、营长的。”

我看他说话一会儿热热乎乎，一会儿又刨根问底，令人难以捉摸，不能不小心提防。我索性不再吭声了，他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把我带进一间小客房，房里很干净，炕床上几条素花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看得出这是户小康人家。

那青年对屋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娘，来了个客人，给他做些饭吃。”

老太太望着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样子，叹道：“你辛苦了，出门在外的人难哟！”她吩咐儿子给我打来热水洗浴，又亲手给我做了面条，还炒了菜。

从讨饭以来，我第一次用上热水洗了脸、烫了脚，第一次吃上热饭热菜。饭后，老太太一再催我睡觉：“你劳累了，好好歇着吧。”

她母子二人出了屋。我坐在炕上仍不敢入睡，担心万一来了民团怎么办？我轻轻推开门向院中观察：这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地上白光光的，院子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土围子，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在一处墙根下靠着个大树墩子，我估计着只要登上树墩就可以翻过围墙，墙外就是大山。我略略踏实了，便和衣靠在炕上歇息，心里念叨着：不能睡，千万不能睡。谁知脑袋一挨炕头，就真的睡着了。

等我再睁开眼时，天已大亮，日头出来很高了。我不由一叫：“哎呀，糟糕！”急忙跳下炕，一出门正撞上那青年。

他问：“你干什么去？”

我说：“打扰你们了，谢谢，我该走了。”

“不能走。”他着急地拦住我。

说话间，老太太也过来了，一再留我吃早饭。我想一夜平安无事，看来他们是好人，就留下吃了早饭。吃罢饭，我收拾起东西准备走。老太太按住干粮袋问我：“这里面是什么？”她打开袋子，从里面倒出一小堆发了霉的食物：一个饭团，几块干馍，两捧豆子，一撮炒面，生的、熟的、软的、硬的……什么都有。老人叹了口气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红军万岁！”

标语尽管已经是斑驳的陈迹了，但它仍象一团火烧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仿佛又看到了红军，又看到了那红红火火的场面，顿时振奋起来。

我走过一家理发店，想把头发剪一剪，一来因为头发太长了，与当地入很不相称；二来就要找到红军了，总不能这副样子见战友。我走到店门口，与理发师傅搭讪起来。

他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告诉他：“我是过路的，请问到庆阳怎么走？”

理发师傅摇摇头：“我也没去过。听说很远，由这儿往东，要经过海原、固原。”

我看他厚道、热心，就请他帮我剪剪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他：“我没有钱，可不可以帮个忙？”

理发师傅爽快地说：“可以，不给钱也行。”但想了想又劝我，“你要去庆阳，路上要经过一些回民区，你不理发留着胡子倒象个回民，这样会方便些。”

很明显，他心里明白我是红军，尽管他没有点破。我们两个心照不宣。他又叮嘱我：“如果有人问你是大教还是小教，你就说是小教，记住啊。”

我虽然没有理发，却对他由衷地感激。告别了理发师

傅，我加快脚步继续追寻红军的踪迹。

我从打拉池向东，经六盘山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区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一天晚上，我借宿在一个骡马店里，同四个赶毛驴生意的人睡在一条炕上。临睡前四个生意人兴奋地议论不休：“奇了！驻在王家洼子的军队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

“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我心头一亮，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队伍。他们告诉我：“是红军，是红军二十八军一团。”

我压住心头的狂喜，又有意问了一句：“红军对过路的人不为难吧？”

“不为难，好得很呐，你放心吧。”

我向他们打听，“此地离王家洼子有多远？”

“整整一百里。我们昨天才从王家洼子动身来的。”

近两个月来，我终于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确切消息，真高兴啊！这一百里路，我恨不得一步跨过去。躺在炕上，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身边的四个生意人早已鼾声大作。

鸡叫头遍了，天还黑洞洞的，我起身匆匆赶路，一气走到夜里，赶到王家洼子，找到了红军。

近两个月的日日夜夜，我露宿荒野，行乞千里，多少次险处逢生，多少个好心人真诚相助。我凭着一只干粮

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凭着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在镇原，我先后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西路军指战员，大家虽然被敌人打散了，但都抱着同一个信念——找党去，找红军去，化装潜行，吃尽千辛万苦，又重新聚集到革命的红旗旗下。

顺便交代一笔，那个陪伴我逃荒要饭的指北针，以后又一直跟随我进了北京城。全国解放后，军事博物馆的同志把它要去陈列出来，作为红军英勇斗争的见证。

### 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

我在王家洼子找到了红二十八军第一团，这个团的团长原是红一军团二师特务连连长，团政治委员原是二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员，我在一师当师长时他们都认识我。他们留我在团部住了两天，洗了澡，换了军衣，随后派人送我到二十八军军部。在军部我见到了已调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穷同志。午饭后，我就跟他前往设在镇原城内的援西军司令部。一路上我们畅谈不止，他感慨地对我说：“你回来得很好，中央盼望着西路军的同志能够早回来！”

自从西路军渡过黄河，党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着西路军的处境。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中央获悉西路军屡受挫

折，情况危急，立即采取了紧急救援措施，由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和红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队伍迅速向黄河边开进，同时由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交涉，要其严令马家军停止进攻。但当援西军刚到达镇原一带，就传来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噩耗。中央一面派陈云、滕代远去新疆接应李先念等所率部队，一面指示援西军在镇原一带收容失散的同志。

我随宋任穷同志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后，刘伯承同志、张浩同志马上同我谈了话，详细询问了西路军的情况。随后他们告诉我：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路线，最近几天任弼时、左权同志就要从延安来这里传达《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我们准备召开援西军连以上干部大会，会上你也讲一讲西路军的失败经过和教训。

我向刘伯承和张浩同志要求去延安学习，他们当场表示同意，要我休息几天再走。

我到镇原后第四天，徐向前同志从平凉方向回来了。他先到达四军军部，下午来镇原时，援西军负责同志到城外迎接他，我也去了。在城外大路上，一行人马远远走来，我们迎上前去。徐向前同志翻身下马，和刘伯承同志紧紧握手，两行热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刘伯承同志也激动不已，说道：“不要难过，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

我在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工作先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徐向前总指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同志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很早就为党搞武装，四方面军打起仗来都靠他直接指挥。徐总对这支红军队伍的创建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在总指挥部内，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却把持着军政决策大权，听不进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在西路军时，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参谋长李特以及原张国焘的政治秘书黄超等人武断地决定部队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同志指挥得再好，部队作战再英勇，也无法扭转整个局面。

在政治路线上，徐总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他拥护党中央和中央路线，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是不满意的。有时张国焘开会，徐总闷闷地坐在一旁，或者干脆回去睡觉，保持精力指挥打仗。张国焘南下退却、分裂红军时，有人见中央坚持北上，就主张把一方面军打掉，徐总劝阻说：“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哟！”话虽只有一句，可真带劲呀！如果他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我在与徐总的接触中，一直以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后来在一二九师时，我却发现他很爱说话。我不解地问他：“以前在四方面军时我看你不大多说话，现在怎么这样喜欢说话？”

徐总笑着说：“傻瓜，这还不明白，以前是跟什么人

在一起,现在是跟党中央在一起,那时候有什么话好讲呢!”

经他这么一点,我才恍然大悟!噢,对的。不是徐总不爱说话,是他在张国焘路线统治时期,看着憋气,干着违心,说了无用,欲笑无声啊。

徐总回到镇原后不久,即去延安向党中央直接汇报西路军的情况。我原准备去延安学习,但刘伯承和张浩同志又决定让我仍回三十一军任参谋长。这时部队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任弼时、左权二同志一到镇原就向援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在会上,我汇报了我所经历的西路军的失败,并谈了我的看法;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多——自然条件恶劣,敌我兵力悬殊,我军孤立无援等等。但军政委员会中的一些人看不到变化了的形势,不听从中央劝告,企图独自打天下,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的失败正象中央指出的,是由于没能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而造成的恶果。在我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为西路军的惨烈遭遇洒下了痛心的泪水。

我发言后,王新亭同志接着宣读中央汇总西路军情况的一个材料。他读了不到半小时,就哽咽得实在念不下去了,台下也是一片唏嘘之声。三十一军政委郭述申同志接

过材料继续读下去……

会后的一天，援西军政委张浩同志要我把在西路军工作期间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我在镇原县属的平泉镇三十一军军部，在那次大会发言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题为《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的报告，写好后请肖克、郭述申同志看过，交给援西军首长，经刘伯承、张浩同志审阅后上送党中央。这个报告一直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在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我们遵照党中央指示，坚持把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指战员区别开来，对尚未觉悟的同志则摒弃过去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动辄撤职、关押、枪毙的作法，而是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召开报告会，原原本本地介绍一、四方面军关系紧张的由来，总结南下失利和西渡失败的教训，使同志们看到了张国焘路线及其影响给红军、给党、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大家联系部队中以往存在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和怀疑中央路线的倾向，清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广大指战员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全党全军团结一致，这就为我军开赴抗日前线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打下了良好基础。

## 第九章 在抗日前线

### 挺进敌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头烽烟骤起，宛平城头战火熊熊。平津在危急中！华北在危急中！

为挽救华北危局，我党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掠！”随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宣布就职通电中表示：“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八路军下辖——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其中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编成，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几个直属队。九月三日，我所在的三八六旅宣布改编后的干部名单，陈赓为旅长，陈再道为副旅长，王新亭为政训处主任，我为参谋长。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红军艰苦奋斗了六年，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难，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们恨不得马上飞到前线，与日军决一死战。不久部队发来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大家一看到那“青天白日”的帽花，都从心底厌恶它：“抗日干么非戴这东西不可！”“革命来革命去，竟革来了一个青天白日的帽花！”虽然在发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之前，八路军总部已对此作了说明，并要求我们对部队作解释。但说实话，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几分别扭。九年前，我参加平江暴动，从国民党军队里冲杀出来，此后一直与之作战。我万万没想到今天又得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花，这在感情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不过后来我也逐渐想通了：帽花虽然换了，名称虽然改了，但我们的本质没有变，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

九月六日，一二九师全体将士列队在石桥镇，冒着秋雨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上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同志代表党中央及军委颁发了红军十年纪念章，接着，全师在刘伯承师长带领下庄严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老兄弟，奸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这声音从全体将士的心中迸发出来，冲破雨幕，象滚

滚的惊雷震荡着阴沉沉的天空。

誓师后，我们加紧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秣马厉兵，待命出征。

十月初，一二九师留下部分兵力驻防陕甘宁边区，师部率三八六旅、师骑兵团和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继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之后，由韩城县芝川镇乘船渡过滔滔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师主力在侯马登上火车，急驰太原。因车辆紧张，我率师骑兵团赶赴前线。沿途群众看到八路军兼程北上，受到极大鼓舞，夹道迎送。

八路军一进入山西前线，就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十月十八日，一二〇师设伏雁门关，击毁敌军车二百余辆；十月十九日，一二九师先头部队七六九团三营夜袭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四架。

日寇在从北面进攻太原受阻的情况下，以两个师团兵力沿正太路西进，企图迂回太原侧背。娘子关一线国民党守军吃紧，曾万钟之第三军被困娘子关。为起到“壮气军”的作用，一二九师师部率三八六旅进抵平定、昔阳地区寻机歼敌。在马山村战斗时，我带一个连在正面箝制敌人，陈赓旅长率部从侧后出击。

那天下午，刘伯承师长和宋任穷副主任来到阵地上，关切地问：“情况怎么样？”

我说：“敌人正在开始向我进攻，我在这里的任务是

坚守正面阵地，抗击、迟滞敌人前进，以掩护我主力侧击敌人。”

这时刘伯承同志拿起望远镜，观察向我步步逼近的敌军。我见情况紧迫，就请宋任穷同志动员师长先走。宋任穷同志一边劝说，一边拉着师长的胳膊就走。刘师长指着山坡上枯干的茅草荆棘，不慌不忙地笑着说：“同志，你慢些扯，让我看看路嘛！”

刘伯承和宋任穷同志刚下山，敌军就包抄过来。我军节节向南山抗退，并同敌人保持接触，牵着敌人在山里转。这时，刘伯承和陈赓同志指挥主力乘机从侧后出击，从而打乱了日军对娘子关的攻击，解救出曾万钟之第三军。随后，我旅又协同一一五师在黄崖底、广阳连续设伏，给敌人以重创。但由于国民党军在日寇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不仅主动丢弃娘子关，还从忻口、太原全线撤退。太原遂陷于敌手。

太原的失陷，宣告了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我一二九师部队移向太行山区，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创建游击根据地。全区掀起了群众性的参军热潮。一九三八年初，我奉师部命令到武乡接收各地扩来的新兵，亲眼看到太行山区人民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八路军中的情景。那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面实在令人感

动。这时,除我三八六旅得到很大补充外,还先后组建了补充团、独立团、骑兵团。党中央赋予一二九师开创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初步完成。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九师展开邯(郸)长(治)公路破袭战,三月十六日于神头岭伏击歼敌一千五百余人,三月三十一日又于响堂铺击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四月间,日军调集十个联队,共约三万余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妄图围歼我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驻于武乡、辽县(今左权县)、榆社地区的部队。针对敌之企图,我师除留一部分兵力配合游击队在内线展开游击战外,主力则跳出敌合围圈,转至外线,待机歼敌。四月十六日,我师主力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转回内线,在武乡县长乐村出击敌的主要一路,消灭主力一〇八师团二千余人,极大地震撼了敌人,迫使其他各路纷纷回窜,从而粉碎了敌之“九路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在武乡县长乐村战斗中,我旅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同志不幸牺牲。噩耗传来,我和全旅同志为之恸哭。成焕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作战冲锋在前,指挥果敢机智,深得同志们的爱戴。特别使我永志难忘的是长征后期,我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任参谋长时,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排挤从红一方面军调入的干部。当时的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以后犯错误被撤职后,跳进大金川自杀了)想要假借擦手枪走火把我

干掉，成焕同志（当时任九十三师政治委员）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图，就向余天云严正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才使我得以幸存。他在这次长乐村战斗中，带领一个连队最后撤离战场，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虽经尽力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为了中华民族不受日军铁蹄践踏，有多少象成焕同志这样的八路军将士在抗战之初就把一腔热血洒在太行山上！

## 发展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开创晋冀豫边区根据地的同时，也把目光注视到东面的冀南大平原上。这里，国民党军队早已卷席南撤，大小官员不知去向，日伪控制了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在乡间，散兵游勇、会门土匪等各色武装蜂拥而起，他们据村为王，相互火并，局面十分混乱。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同日伪作斗争，一二九师先后派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组织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广大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编游杂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初步形成了以南宫县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五月，我随同徐向前副师长率七六九团等部，去冀南进一步开拓工作。我到南宫后即去冀中接收在武强地区活动的段海州部。

段海州是冀中安平县人，地主家庭，北平国民大学毕业

业生，曾在山西阎锡山部当过教官。七·七事变后，他回到老家，在安平、武强、交河一带，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收编一些旧军官、土匪，和一些从北京出来的抗日青年学生，拉起一支队伍。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吃住在他家里，同日本人打了几次小仗，很快发展成四五百人，号称“青年抗日义勇军”，段自称司令。那时在武强南面有国民党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赵云祥，老想收编他、吃掉他，赵还一度扣留过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在这种情况下，段海洲想找个靠山。一九三八年春，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周围数县的保安队和伪军，在冀南产生了很大影响。段看到只有向八路军靠近、接受改编才是出路，再加上他内部的进步学生陈元龙（哈尔滨工程学院学生、段的政治部主任）、李松霄（清华大学学生、段的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积极工作，段就派陈元龙前往南宫，通过张策、段君毅等同志与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和东进纵队负责人陈再道、宋任穷进行了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陈元龙在南宫住了几个月，商妥了段部改编的具体方法，陈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来到南宫后，徐向前同志把段请到南宫，并把我介绍给段海洲，对段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派的政治委员，他同你一路去武强，把队伍整理一下，然后就开到南宫来。”

我这个一直搞军事工作的人，第一次改做政治委员工

作，而且是到一个杂色的部队中去，更感到肩上担子不轻。但我深知改造好段海洲这支队伍，把几千人改编为我党所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一部分，对于增强抗战力量的重大意义。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只身一人随段海洲到达武强县驻地，段召集干部开会，请我讲话。我在会上向他们讲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团结起来打日本”，“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等道理，并宣布了开往南宫受编的有关安排。当时段海洲部的大多数人热烈拥护改编，为能够加入八路军的光荣行列感到分外荣耀。我们重新整理了队伍，给每个人赶制了一套新军服，使军容焕然一新。队伍从武强出发，路过冀县大寨村时又把驻在那里的一部分人带上，四天后到达南宫。我向徐向前同志报告了段部的情况，提出必须将有些干部调整一下，否则对改造段部不利。徐向前同志同意我的建议，就以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的名义，调出几个人去太行山师教导队学习。段部的参谋长朱家凯在学习中表现很好，不久就加入了党，解放后曾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情报系主任。不久，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来冀南视察工作，住在威县附近，我去他那里汇报改编段部情况，并请他与段海洲见面。邓小平同志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邓政委置办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段海洲，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热情的谈话，肯定了他率部加入八路军的明智之举，勉励他不断进步，继续前进。

六七月间，段部正式与一二九师原三八六旅的七七一团合编。为了争取段海洲，部队起名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下设三个团，即原三八六旅徐深吉同志率领的七七一团为第一团，原段海洲部为第二团，从安阳收编的游杂武装为第三团。段海洲任司令，我任政治委员，徐深吉同志任副司令，七七一团政治委员吴富善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青纵”成立后，邓、徐、宋等领导同志都来部队作过报告，讲抗日游击战，讲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等等。那时，我刚得到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读过之后就送给段海洲学习。段海洲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看了一遍又一遍，深为毛主席对抗战三阶段的精辟分析所折服，赞不绝口。在行军间隙，我还常常给他讲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讲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讲夜袭阳明堡战斗，讲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敌人的故事。他每次都听得很入神。

不久，青年纵队转至豫北的滑县、道口、汲县、濮阳一带活动。这时，段海洲害了眼病，回到南宮师部就医。我带着部队在豫北与冀南转战。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却传来了段海洲请假回家探亲一去不返的消息。以后得知段海洲是被几个当初一起搞队伍的旧友包围了。这些人思想反动，对部队改编不满，煽动段一起跑到国民党第十军石友三那里去了。段海洲临走时，大概觉得对不起八路军的厚待，不愿不辞而别，就给邓小平、徐向前同志写了一封告假信，派人将信连同他回家时带去的五匹乘马、四支手枪

一并送回师部。

段海洲在石友三部当了个团长。一九三九年冬，石友三积极反共，遭到我冀南、冀中部队的联合讨伐，段又随石友三跑到了濮阳。以后听说他到了武汉，当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副军长。

段海洲走了，但这支队伍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队伍中的大批进步青年也逐渐成长起来。陈元龙同志后来担任了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子斌同志担任了十团团团长，他们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段部的一批青年学生，解放后不少担任了大学领导干部，成为新中国教育战线的骨干。对于段海洲，我们总念其有过一段抗日的历史，并没有忘记这个曾经与我们同走过一段路的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人川，我们听说段海洲在解放后的重庆开了个理发馆，还听说李达同志派人找过他，此后便再没有听到他的音讯。直到一九八四年五月，我为写这部回忆录搜集资料，偶然在《河北文史资料选辑》中看到了段海洲的《回忆我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的文章。他在文中记述了青年义勇军接受改编的经过，回顾了我们同率青年纵队的战斗生活，重温了邓小平、徐向前同志对他的教诲和期望，痛感“作为一个人，在党领导下从事工作，生命才有意义。”他在文末痛悔地写道：“我历史上的大错，永远是我的前车之鉴，覆辙再也不能重蹈。”“今后在我的有生之年，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疑问的。”从他的回

忆文章中,我得知他在全国解放前夕,终于认清了国民党崩溃覆灭的命运,在湖北监利县率部起义,回到人民一边。这说明当年八路军中一段生活在他一生的转折关头毕竟起到了重要作用。看到此,我欣然提笔给现在四川省万县市政协的段海洲同志写了封信。时隔四十六年,我们又取得了联系……。

在冀南,我们还对付了反动道会门发动的几次叛乱事件。

一次是在南宫以东发生的“六离会”叛乱。当地大地主、大汉奸李耀庭操纵“六离会”,在张马、小屯附近袭击了我津浦支队,杀害支队政委王育民等二十四人,还抢走电台一部。事件发生后,正在豫北活动的我青年纵队迅速返回南宫,开到张马、甘狼冢一带,与七六九团一起击溃了“六离会”纠集的一万余人的进攻,迅速平息了这次叛乱。

几个月后,枣强又发生了“白吉会”叛乱。国民党孙良诚的游杂武装胡和道部,唆使“白吉会”几万人联合赵云祥部,制造事端,向共产党、八路军发难,将我枣强县政府、县“战委会”(即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刚刚收编的独立团围困在城内,他们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反动要求。宋任穷同志派我率骑兵团同张策、荆介同志前去解决。我们率骑兵团冲过赵云祥部和“白吉会”的防线进了城。同胡和道进行了谈判,首先向他申明我党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撤走围城武装，并严厉指出不要煽动和利用受蒙蔽的老百姓搞摩擦。对我们的这些话，胡和道一伙根本听不进，城外，“白吉会”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就是不肯撤去。谈判无法进行下去，我们于是决定打击一下他们的气焰。我在小本本上写了几句话：谈判几次，你们都没有诚意，而且越来越嚣张，现在我们已经是忍无可忍了！特此通知你们。我撕下纸条，派人给胡和道的上司孙良诚送去。接着，我们便开了火。枪一响，“白吉会”的乌合之众立即仓皇散去，孙良诚、胡和道也都偷偷溜走了。

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冀南地区的道会门很快土崩瓦解，局势平稳下来，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对付日军的进攻。

这年十一月，日军从邢台出发，开始对我冀南区进行第一次全面“扫荡”。敌人占领了隆平、故城、恩县三座县城，向南宫推进，我率青年纵队在南宫以西阻击敌人。与此同时，山东日军也越过黄河向鲁西北进攻。我党为开辟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局面，决定派我到鲁西北组建新的队伍。

## 重 振 鲁 西 北

鲁西北这个地区，在抗战爆发不久，就有一支由爱国

将领范筑先率领的队伍在那里活动。当日军沿津浦路侵入山东,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时,范将军却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那时范将军已年近花甲,蓄着长须,但他的爱国热忱却不亚于热血青年。他在我党的帮助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战的措施,招收大批青年学生,其中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组成的宣传队,广泛进行民众动员,建立各种民众团体,组建了从百多人到千数人不等的三十二个游击支队。那时我党在鲁西北领导机关就以范的政治部的名义开展工作。范对政治部十分尊重。中共鲁西北区党委书记张霖芝同志兼任该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范对一些重大问题总是先同张霖芝同志商量后才办。为了学习八路军的抗战经验,范筑先两次到我冀南南宫县会见了徐向前、宋任穷等领导人,参观了一二九师部队。有一次徐向前同志想留他多住几天,范筑先不无幽默地说:“再不能多住了,再住我这‘通共’的嫌疑就更大了。”

范筑先的抗日进步举动,得到共产党人的赞许,毛泽东同志曾托去山东工作的同志给他带去亲笔信,慰勉他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爱国义举。然而在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眼里,范筑先则是他们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范的参谋长王金祥被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所收买,当日军进攻聊城时,王金祥诡称率主力在城外侧击,只留下少量随范筑先守城。待敌人进攻时,王却把队伍拉到濮

阳去了。范将军虽经拼死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没有后援，聊城被日军攻陷，范将军战死在城墙上；同时牺牲的还有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张郁光等共产党员。

范筑先这面鲁西北人民坚持抗战的旗帜一倒，他的队伍大多溃散，我党的力量也受到了削弱，日伪顽的势力随之猖獗起来。为了重振这块抗日阵地，陈赓旅长率部进入鲁西北平原，同时，我奉命到鲁西北组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我带着两个警卫员，由青年纵队警卫连的一个排护送到了冠县，然后拿着冀南区党委书记李善玉的介绍信，找到鲁西北党组织负责人张霖芝。我与地方党取得了联系后，立即从地方党组织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首先建立了先遣纵队的司、政、供、卫机关，又报经师部批准，从冀南调来一个二百多人的营，归先遣纵队建制，我任先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致远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将范筑先生前所辖、由我党直接掌握的第十支队等余部收拢起来，原准备编入先遣纵队，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来电指示说，为加强统战工作，第十支队应改称筑先纵队，以纪念这位抗战老人。筑先纵队成立后，对内仍归先遣纵队统一指挥。同时受先遣纵队指挥的还有青年纵队第三团和津浦支队等。先遣纵队各部活动在黄河以北、津浦以西的广阔地区，恢复和开展抗口武装斗争，破袭铁路，打击日伪顽反动势力，抗战的旗帜又在鲁西北大平原上高高飘扬。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日军开始了对鲁西北地区的大“扫荡”。二月十八日，莘县敌人约二三百人向北“扫荡”，我以筑先纵队的两个营和先遣纵队的一个营，在莘县城北的魏二庄伏击，将敌击退，在追击中缴获了敌人的辐重大车八辆，步枪十余支，山炮筒子一个，打了一个小胜仗。

然而这次敌人对鲁西北的“扫荡”来势凶猛，以我们当时在鲁西北的兵力，不可能正面抗击敌人，必须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向敌后迂回，遂决定留筑先纵队在朝城、冠县地区活动，先遣纵队转向高唐以南的琉璃寺准备会合津浦支队和青纵三团，进到津浦铁路沿线向敌人进行破袭战。这时鲁西北区党委机关随先遣纵队一起行动。我在堂邑以北地区出发前，已电告津浦支队和青纵三团各来一位领导干部于三月五日拂晓前到达琉璃寺，共商行动计划。三月五日凌晨，各部到达琉璃寺一带集结，津浦支队队长孙继先和青纵三团参谋长刘昌义如约来到琉璃寺。我们正在交谈情况时，由高唐来的敌人突然撞到了村子北门口。鲁西北一带的村子大多都有围墙，墙外是壕沟。我哨兵当即关闭了寨门，把敌人挡在村外。

这是一场突然而来的遭遇战。那时日军在末松师团长指挥下，出动步骑炮坦，到处寻找我军主力作战，不意在这里碰上了，一时枪声大作。我当即要孙、刘二同志迅速回到各自的部队，津浦支队从琉璃寺以北向东侧击敌人，青纵三团来琉璃寺从正面抗击。但孙、刘回到各自驻

地时，两处均已发现敌人。此时天已发白，来犯之敌乘坐汽车，还有一部分是骑兵，分别由高唐、德州、聊城，即东、南、北三个方面向我包围袭击。由于敌机动性强，我们运动不便，就依托村寨，就地固守。一场大规模的平原村落战开始了。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冲击，我们则以反冲击打退了敌人。如此多次反复，直至中午，敌人仍被拒在村外。日军竟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我军在炮火和毒气的袭击下仍顽强坚守阵地。至黄昏后，我军组织部队突围。这时张霖芝等区党委机关同志随青纵三团和津浦支队已从许楼村南迅速转移出去了，纵队所属各部经过一番激战也摆脱了敌人。第二天下午，各部队先后到达黄河边。当时黄河因花园口决堤后改道，开封以下一段无水。根据当时敌情，为避开敌人“扫荡”锋芒，遂决定转移到黄河南边的大峰山一带。敌人寻找我主力决战的目的未达到，不得不收缩回巢。

在大峰山，我们接到师部电令，要津浦支队回鲁西北，先纵和青纵三团去太行山接受任务。我们按师部指示，令津浦支队返回鲁西北，青纵三团及先纵机关和一个营，经梁山、豫北的滑县于三月底到达太行山。不久奉命转至邢台以西宋庄地区，阻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部和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部南下，并维护太行区通往冀南区的交通。一九三九年秋根据师部指示，青纵三团留下继续执行任务，我带先纵机关和一个营经冀南重返鲁西北。

一九四〇年六月,奉师部电令,我们将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共计六千余人。完成整编后,我又接到师部的命令,到山西太岳区决死一纵队工作。

## 第十章 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

### 我所知道的“薄委员”

一九四一年春，我奉命调到山西太岳区的决死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路经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我作了详细的指示。邓政委特别叮嘱我：“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邓政委这番直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我连连点头，我那点老底子都被他抖搂出来了。确实，我这个“老粗”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现在要到薄一波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中去工作真应该好好注意。

我在到太岳区工作之前，虽然和薄一波同志没有见过

面,但对他的情况并不陌生。早在一九三八年初,我在三八六旅任参谋长的时候,曾奉命到与沁州毗邻的武乡县城接收宋任穷工作团从长治地区扩来的新兵,行前,邓小平同志交给我一项特别任务,他告诉我:“那里的薄一波委员是位进步人士。我同他商定,一旦有急事就打电话到武乡,由你李参谋长转告我。”邓政委带着几分神秘地说:“他打来的电话你只管代传,不要随便问他什么话。”

我到武乡不久,果真接到沁州行政公署打来的电话。我刚拿起听筒,里面就传来薄委员毫不客气的声音:“你是李参谋长吗?邓政委答应给我调的干部怎么还没来?你去给我问问。”那时在统一战线里跟我们打交道的阎锡山地方官员,表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繁文缛节甚多,可这位薄委员却象跟自家人讲话那样直率,我暗暗感到他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但因邓政委有言在先,我不便多问,只是把他的话转到邓政委那里。

我在武乡呆了几个月,对这位薄委员的名声,就常有所闻。那时薄一波的名字,在太岳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早在一九三六年秋,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晋绥地区时,山西土皇帝、后来担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为维护其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老巢,打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旗号,他派人邀请刚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获释的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



他和随后到达的中共太岳特委书记安子文同志共同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由于薄一波同志的公开身份是第三行政公署主任，决死第一纵队政委，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而习惯地称他为“薄委员”。薄一波的公署不但负责地方行政事务，而且实行粮食专管，连逃到晋西的阎锡山吃粮也要靠他来供给，他利用这个权力，给八路军解决了很大的问题，那时在八路军中曾流传着一段薄委员巧借军粮的故事：

我军初到晋东南，由于国民党政府所拨军饷远远不够需用，便本着“合理负担”的原则向当地富户筹粮，但地方官吏处处刁难，一些富户明明仓满囤尖也不肯出借。这时，薄一波同志便以公署名义通知各县：“要借粮给八路军，等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发了军饷，再让他们归还。”为了使地方官吏相信借给八路军的粮款是能够收回的，薄一波同志还若有其事地向下交代：“借给八路军的粮食，可别忘了让八路军打借条，将来凭条收款。”就这样，八路军从当地“借”到了大批粮食。可是后来因为国民党背信弃义，停止给八路军发饷；同时从富户身上筹集粮食用于抗日，也是取之合理、用之得当的，当然谈不到什么归还的问题。但当时正值蒋介石下命令要派“战地军风纪视察团”去根据地视察，并扬言专门查看八路军“借粮”问题。那些借出粮食的富户因收不回粮款而更加吵吵嚷嚷，薄委员为要了结那笔粮帐，便在公署召集的县长会议上煞

有介事地催促各县向八路军收款。县长们因收不回来无法交代，又纷纷找薄委员，薄一波趁势说：“你们真笨，连这点事都办不成，你们把条子收上来交给我，我去找八路军要。”他把条子收来后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随后，薄委员撤换了一批县长，选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各县县长。这样，八路军那笔粮帐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三九年，由薄一波同志创建的决死队已由当初的一个总队发展为拥有四个纵队、四个旅和一个师等众多番号的一支庞大新军，拥有四十六个正规团。阎锡山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在山西敌后蓬勃发展，不由得惊呼：“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积极参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并配合日寇夹攻晋东南的决死队，史称“十二月事变”。在晋东南，旧军从南北夹攻决死一、三纵队。三纵队由于内部的旧军官发动叛乱，遭受了较大损失；在一纵队，薄一波同志对这股反动逆流早做了防备，以送学校学习等方式打发了阎锡山安插的各级旧军官，牢牢掌握住了部队，在八路军的协助下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来到决死第一纵队

一九四一年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来到决死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时,这支队伍已在薄一波同志率领下编入一二九师序列,纵队部设在太岳区腹心的沁源县城南十五里的阎寨。在司令部的一间窑洞里,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薄一波同志,他身着普通的八路军军装,黝黑的脸膛,透着精明爽快的性格,互相介绍之后,我提出先到部队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帮我安家安顿下来,派人带我上路了。决死第一纵队的二十五、三十八、四十二、五十七、五十九五个团,分别驻在屯留、沁州、唐城和沁源县属的上下新居等地区。我用两个来月走了一圈,每个团住上十天半月,听取工作汇报,找营团干部谈话,对部队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支队伍的许多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决死第一纵队尽管曾长期戴着阎锡山军队的“帽子”,但其政治素质很好。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各级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而且都是共产党员。团以上军事指挥员有不少是从八路军调入的老红军,如第一任参谋长毕占云、现任参谋长李成芳、二十五团团长刘丰、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副团长肖显旺、五十七团团长黎锡福等。决死队中党的力量一直比较强,从纵队到每个连队都建有党的支部,党员是半公开的,党的活动由政工干部出面安排,党中央和北

方局的指示均以纵队负责人薄“委员”的名义向部队传达。这种独特的方式，曾有效地保证了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但大家也感到，现在决死队已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仍采取这种不公开的方式，已不必要了。

回到司令部，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向薄一波同志一一做了汇报，并向他建议：“从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以后，形势变了，我们决死队和阎锡山没有什么关系了，队伍里谁都晓得决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谁都晓得‘薄委员’是共产党员，大家都盼望能把党的旗帜公开打出来，让决死队名正言顺。”

“好啊！”薄一波同志马上操起电话，把政治部的周仲英主任、刘有光副主任找来。他兴奋地讲了我刚才谈的意见，并说：“聚奎同志的意见提得好！”周、刘都表示赞同，我们当即研究起如何进行这项重大的工作。薄一波同志向我征询道：“你看怎样做好？”我建议说，按照八路军的惯例，我们应开个党代表大会，请你先把决死队中党的由来和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个报告，接下来选举党的负责人，最后请你再把今后的工作方针跟大家讲一讲……

在薄一波同志的主持下，经过政治部的周密筹备，决死第一纵队隆重召开了首次党代表大会，各个支部按照党员数量的比例推选出代表。那么多的同志聚集一堂，这在决死队还是第一次。到会同志们个个喜气洋洋，象参加一次盛典。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致推举德高望

重的薄一波同志为党的总负责人。薄一波同志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全面总结了党为创建、发展这支队伍所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并且向全纵队庄严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我们对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军政整训，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整肃军风纪，进行制式教练；开展以射击和夜战为主的练兵活动，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以后，我在担任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时，薄一波同志仍任政治委员，他主管大政方针及党的工作和部队建设，我负责作战和训练。工作中，我们互相支持，共同协商；闲下来，我们谈学习，拉家常，摆龙门阵。他那广博的学识、谦逊的品质和出色的领导艺术都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在他的影响下，我注意向知识分子学习，讲究工作方法，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简单急躁的习性，连我自己都觉得象是换了个人一样。在此后的岁月中，我们共同率领决死第一纵队与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 殊死的斗争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日军集中在华的大部兵力进攻我解放区。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这年秋天，日军在“扫荡”平西根据地之后，对我太岳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

我太岳区与太行区隔路相望,巍峨的太岳山脉以霍山为主峰纵贯南北,同蒲、白晋两条铁路一西一东象半开的扇面自北向南逐渐展开,临(汾)屯(留)公路横贯腰部,路南是决死第三纵队和二一二旅活动的区域,路北十几个县的三角地则是决死第一纵队活动的地区,亦是太岳根据地的中心区,纵队部和太岳区党政机关都设在沁源。敌人“扫荡”的目标正指向这里。十月六日,三万多日伪军从四面向沁源直扑而来,企图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将区首脑机关和决死纵队一举摧毁。十月八日,沁县敌人进占了伏牛山,南面的敌人也压了过来,敌机隆隆地在头顶盘旋,我们遂决定由大林区出发,西越霍山,跳到同蒲路东的敌占区去。队伍隐蔽地向西走了十几里山路,发现前面的山沟里燃着一堆堆篝火,一路敌军已在那里扎营,我们又返回大林区山中。

这时,我们所率的二十五团、三十八团、五十九团和三八六旅的十六团连同安子文等太岳区党政机关干部都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在这东西四里、南北八里的狭窄地域,一旦敌人收拢合围圈,后果将不堪设想,唯一的办法是,坚决将队伍划小,发挥小群多路的长处,才有可能突出重围,我和薄一波同志交换了意见,就一方面把机关中不便行动的老弱妇孺疏散在山里隐蔽,留下部分人枪负责保护;一方面向部队下达了命令:“以营为单位向四面八方突围,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断了就爬山,突出重

围就是胜利。”很快，四个团的十二个营象十二把钢刀同时劈向敌人的合围圈。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同志、薄一波、周仲英和我等人随同五十九团的一个营向西北面的绵上突围。我们穿过一块平坝子正要上山，迎头又遭遇到敌人，双方接起火来。我们无险可依，迅速退了回来，此时，其它各营部队都已按计划突了出去，只有我们这一路仍陷重围，四面的敌人象一群嗅到了猎物踪迹的野兽猛扑上来。我们的处境愈加危急了。我考虑到安子文、薄一波两位同志是太岳区的创建人和重要负责干部，一旦发生意外将会给全区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再跟队伍走了，必须就地隐蔽。我向带队的五十九团团长胡兆祺交代了任务：“你率这个营重新向绵上突围，我们留下来。”胡团长和营的干部不放心我们的安全，着急地喊道：“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要留我们一起留，就是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证首长们的安全！”我向他们解释说：“放心吧，你们把敌人牵走了，这里也会安全些，你们肩上的担子并不轻啊！”

胡团长重整了一下队伍，再度向绵上冲过去，我和薄一波、周仲英、安子文则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留了下来。枪声渐渐远去，敌人的主要注意力被引走了，但是四面山上仍有敌兵在活动，我们开始寻找合适的隐蔽地。一位参谋报告说：“东西那个山村叫崔庄，我就是崔庄人，庄后有一条老山沟，里面尽是密密实实的树林子，不过据

侦察庄里已住进了敌人。”我一听立刻下了决心：“好！就在敌人身边隐蔽。”我们一行跟着那位参谋悄悄钻进了老山沟。

这时天已大亮，沟里尽管有密密的树林，但谁也保不住敌人不会来搜索。薄一波同志慎重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万一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过了。第一是跑，大家分散边打边跑，能跑出几个算几个。第二是死，事情到了这种关头，这话不能不说了。不过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和安书记的安全。”

薄一波和安子文交换了一下目光，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们早做好了牺牲的打算，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我们摘下身上的文件包，把文件、地图和一切能够表明身分的物品统统埋藏起来，然后清点了手枪中的子弹，盘算着如何送进敌人的胸膛，也安排好留给自己的那一颗……

中午时分，周仲英主任悄悄爬到山梁子上瞭望，只见周围山头仍布满了敌人，大炮就架在对面的山头上，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安然潜伏着这块根据地的 重要干部。天黑后，我们试图转向伏牛山。但由于敌人封锁十分严密，我们过不去，再次折回来，继续在大林区山里与敌人兜圈子。

“扫荡”太岳区的日军扑不到我们的机关和部队，只得悻悻地撤退。李成芳参谋长果断地抓住战机，率领突出外线的二十五团在安泽县将军沟伏击了一路敌军，取得了毙敌二百多名的战果。十月十八日，我军收复了沁源城，各路队伍又重新聚拢到一起。这时，我们清点了一下人数，才发现我的爱人王惠颖同志失踪了。当我们见到跟着我爱人的警卫员时，他哭了起来，薄一波同志问他：“王惠颖同志怎样了？”他不但不说话反而哭得更厉害了。薄一波同志把他叫到一边询问，他才抽泣着说：“我们在一起隐蔽，敌人爬上来了，我们跑散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找不到……”我爱人那时是政治部直工科的支部书记，在各路队伍突围前，就把她和刘有光同志的爱人等十几个同志安置在山里隐蔽。现在其他同志都回来了，她仍不见踪影。薄一波关心地安慰了我几句，吩咐警卫员再去那一带寻找。后来才知道，他们十几个人一直在山里躲躲藏藏，一天刚刚找到卫生部一所，山头上的机关枪就响起来了。他们又分散到山沟隐蔽，规定天黑后拍掌为号集合。但这时警卫员因出去侦察情况被敌人发现，大家又各自向远处隐蔽。这样，警卫员返回时，就没有找到王惠颖同志。最后王惠颖同志孤身一人在山里转了一夜，才在一位老道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卫生部一所，回到了纵队司令部。一见面，薄一波同志就笑着说：“你还活着啊，你一丢，聚奎同志整整一天吃不下饭！”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 齐心合力反“扫荡”

一九四二年，薄一波同志接替安子文同志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并兼太岳军区政委，陈赓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们决死第一纵队也改称决一旅和第一军分区，我任旅长兼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顾大川任政治委员。李成芳同志任参谋长，周仲英同志任第二政委，刘有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在薄一波和陈赓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时，日军对我太岳根据地的“扫荡”愈加频繁，什么“捕捉奇袭”、“反转电击”，花样不时翻新，名目越来越多。我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沁源城亦在十月下旬被敌人重兵占领，城关外竖起了“山岳剿共试验区”的牌牌。敌人昼夜不停地在各乡安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企图将我根据地变成他们的“治安区”。我们以部分主力转至外线，以部分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坚持中心区的斗争。三十八团和沁源县委联合组成了“沁源围困指挥部”，动员了城关内外千家万户的群众空室清野，填死水井，埋好粮食，搬光用具，赶着家禽牲畜上了山，将沁源之敌置于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中。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特殊战斗中，陈赓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多次亲临围困前线作部署，我决一旅部队和地方民兵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游击集团，广

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夜袭据点，伏击敌军，破坏交通，使敌人补给时常中断，几乎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有时甚至不得不啃马骨头，嚼生麦粒子……敌军士兵曾在城西一块石头上写下了哀鸣的诗句：“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烟。”

沁源军民的斗争，得到了上级的鼓励和表彰。一九四三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载了十几篇来自沁源围困前线的通讯，并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高度评价这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一九四二、四三两年，连续大旱，屡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太岳军民面临着饥荒的威胁。我们节衣缩食，每天吃麦麸子包成的野菜团，这东西生的时候象个坨坨，蒸熟了却散成一滩，大家把节省出的粮食支援群众度荒；此外，还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终于战胜了天灾人祸。

一九四三年十月，日军在其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太岳区再次发动了大“扫荡”，并从各部队调集少尉以上官佐一百八十多人组成“观战团”。敌人采取“铁滚式”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新战法，将大量兵力投入太岳区北面，象篦头发一样平推过来，企图压迫我退出赖以生存的山地，然后在南部的平原区一网打尽。这一手十分狠毒，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敌人自

北推进一步,我们就不得不向南撤退一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找出敌人的空隙插回北面,都没能实现,几乎是每一座山包、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排满了蝗虫般的敌人。

我三十八团主力留在霍山、绵上县交界处,二十五团主力留在霍山中部与敌周旋,旅部率三十八团第一连继续向南转移。霍县到洪洞间是一马平川,我们出敌不意从这里越过汾河滩,在敌占区兜了个大圈子,又绕回霍山,敌人一直推到临屯公路边,却连我们的影子也没扑到,又急忙返回霍山一带。

一天晚上,旅部带三十八团一个连沿一条干河沟在霍山里行进。沟底尽是被山洪冲下的石头,象磨盘一般大,沟两旁是陡峭的山崖,一条大路顺着河沟盘曲向前。这时岳北地区敌人向南已进到临屯路沿线。我旅部率三十八团第一连由霍县以东地区出发,经霍山向安泽地区转移,准备回沁源。不料已向南去的敌人约一个大队由安泽突然返回到柏子、北平以南,安泽以北地区对我设置埋伏。我在行军中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山上有敌人埋伏。我们急令队伍停止前进,我和顾大川政委、周仲英主任商量对策;看来我们走进敌人的伏击圈了,想回头也来不及了,敌人肯定早把沟口堵死,只有坚决打过去才是生路。我们迅速分了工,周仲英主任组织机关人员,我率连队开路。我们告诉大家:枪一响谁都不准停,只管往前

冲。我向连长、指导员交代了任务，一个排在后头掩护，两个排在前面开路，碰到敌人就冲过去，不要顾虑我们，只要能撕开一道口子就好办了。

队伍疾步如飞，山沟里只有唰唰的脚步声和达达的马蹄声。但是谁都明白，随时会爆发一场血战。

担任前卫的两个排拐过一道山湾，我拄着棍子随队伍向前冲去。突然，从山湾一侧的石头后面窜出三十几个鬼子兵，其中一个鬼子兵的刺刀闪着寒光嗖地捅到我胸前，紧急中我扬起棍子权当兵器，顺势把刺刀拨到一边。顿时敌人枪声大作。山上一个排子枪打来，我身边的骡子中弹倒下，手里的棍子也被打折了。我们跳过干河沟，紧紧贴着右侧山根利用高山陡崖向前迅跑，敌人的火力受到死角的限制，山上的敌人一时又下不来，急得嗷嗷乱叫，眼瞅着我们象破网之鱼冲出伏击圈。以后，敌人把我们遗留在战场上的行李烧毁，并杀害了我们当时没有来得及背出的个别重伤员。在这次战斗中我共伤亡廿余人，被打散的人员第二天陆续归队了。

这次“扫荡”，太岳军区除军区司令部外，其他各分区司令部都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但是没有一支队伍动摇、溃散，我根据地军民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我们在霍山中伏的时候，李成芳和刘有光两同志带领五十七团出击外线，乘虚攻下了襄垣县的一个据点，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和布匹、纸烟等物资。与此同时，太岳二分区部队在洪洞

韩路村战斗中，一举歼灭了敌军为推广新战法而组织的“观战团”，击毙官佐百余名。敌人的大“扫荡”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太岳区的抗日军民终于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恢复并发展了解放区。

## 第十一章 出席党的七大

### 参加甄别工作

一九四三年，敌后抗战的形势逐渐好转，我们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过去了。

这时，党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代表分期分批抵延安。太岳区的薄一波、安子文、陈赓、周仲英、王毅之、王锐、刘开塞、卫恒、高扬文等同志就是在这一年先后去延安的。他们走后不久，北方局又批准我去延安学习，并同时指定我为太岳区出席党的七大正式代表。那时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同志代理。

正当我要起程时，得知敌人即将对太岳区又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司令部的同志让我在敌人“扫荡”前离开太岳区，我觉得敌人正准备“扫荡”，不能离开职守，待反“扫荡”作战完了后再走不迟。因此我坚持打完仗以后才动身。时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旬。

与我同行的，有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同志，他是到延安去学习的。我们一行九人（随行的还有家属及工作人员）由太岳一分区沁源县出发，途经晋西北时，又遇敌人

对该区进行“扫荡”，我们曾几次碰上敌人，但都躲过去了。十二月底，我们到达陕北的绥德县。当时“抗大”总校就设在这里。我们在“抗大”休息了几天。过了元旦，副校长何长工同志给我们联系了一台往延安运东西的大汽车，那时通往延安的公路很不好走，不到二百公里的路，整整走了两天才到达。

我到延安以后，先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当时中央党校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兼副校长，张秀山同志任教育长，张明远同志任总务处长。一部和校部同住一个院子里。这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了总结阶段。我们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的学员，除了学习党的整风文件之外，还有少数同志参加了整风审干的甄别平反工作。

原来，在我来延安学习之前，党中央为了打击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少数敌人以纯洁组织，决定结合整风审查干部。这次审干，挖出了少数暗藏的敌人，考察了干部，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当时直接主持这一工作的康生，推行一套“左”的政策，使审干工作一度偏离了正确方向。他在一九四三年夏秋搞了约两个多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任意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单纯追求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伤害了大批好同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现这一错误以后，立即着手纠正，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

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又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时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也坚决提出:要甄别。党校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部分学员对在“抢救运动”中受到审查的同志进行甄别工作。我参加了此项工作,负责落实三个同志的问题,其中有一名是长期在白区做文化工作的同志。

对于那一套“左”的肃反做法,我在中央苏区时就经历过。因此我对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在审干中必须坚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感到非常宝贵,非常亲切,并在甄别工作中坚持去做,很快就搞清了我负责调查的三个同志的问题,给他们进行了甄别平反。

## 代表资格审查

一九四五年四月各地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组成了代表团。我参加晋冀鲁豫代表团。在代表资格审查时,有一天上午,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来到我们代表团驻地,亲自找我谈话,说太行区发来一封电报,反映有人怀疑我在鲁西北琉璃寺战斗中,曾穿便衣表现动摇的问题,问我倒底是怎么回事。

听了胡耀邦同志的询问，我一方面很气愤，觉得怀疑我的人，是对我的侮辱，但同时又为胡耀邦同志那种直率的态度和亲自询问调查的作风所感动。我对胡耀邦同志说，穿便衣的事是有过一次，表现动摇则是无中生有，并向他讲了我那次穿便衣去找原党委和青纵三团、津浦支队的详细经过：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任鲁西北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久，日军秋山旅团对鲁西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我们的作战方案是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我带三个营的兵力在莘县以北魏二庄，伏击由莘县来犯之敌，在战斗中缴获敌人大车九辆，步枪十余支，山炮筒一个。后转至高唐以南的琉璃寺地区，准备同孙继先带领的津浦支队及青纵第三团会合。然后到津浦路沿线进行破袭战。拂晓时我刚进琉璃寺村就和由高唐南来的敌汽车四十余辆、骑兵三百多遭遇。汽车上的敌人直攻琉璃寺，三百多骑兵由琉璃寺以东向南攻击我青纵三团。德州敌人向西攻击我津浦支队。到下午四时左右攻击我青纵三团的三百多骑兵由原路向北撤退。估计敌人可能是要集中力量包围攻击琉璃寺。在平原地区敌人的汽车骑兵机动性强，久战于我不利，于是，我与当时鲁西北区党委书记张霖芝同志商定（他当时带区党委机关三十多人随部队行动），乘敌尚未形成包围之前，由他带机关人员先行转移到青纵三团驻地去，我再率部于黄昏时突围，然后和

津浦支队同时到青纵三团驻地集结，为迷惑敌人我则先向西南后向东南转移，张霖芝同志率区党委机关于下午五时许行至青纵三团驻地附近时，受到由荏坪方向开来的约二十辆满载敌人的汽车的冲击。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平同志牺牲。张率机关人员冲过敌人汽车与青纵三团会合。我们于黄昏由琉璃寺突围后，因青纵三团驻地西北两面被荏坪南来的敌人隔断，我先遣纵队机关和一个营与区党委青纵三团、津浦支队失去联系，遂由敌人西面绕过转向东南，第二天早晨到达赵官庄。根据当时情况，我和参谋长刘志远、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同志研究，认为眼下需要暂时避开敌人“扫荡”的锋芒，转到黄河以南的大峰山休整，待三、五天后看情况再返回鲁西北地区。但这样的部署必须征得区党委的同意才能进行。

这时津浦支队的一名便衣侦察员来到赵官庄，说区党委和青纵三团、津浦支队在赵官庄以北三十里处。我当即和刘、王二位同志商定，由我到区党委去找张霖芝等同志汇报我们对情况的估计和行动计划，如果他们同意这个计划，我就随区党委和青纵三团、津浦支队行动。刘、王等同志趁黄昏渡过黄河，与区党委等会合；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个计划，我在黄昏前返回来。这样我就和津浦支队的便衣侦察员一同骑自行车去找区党委。当时为了路上行动方便，我是穿的便衣。所谓“穿便衣”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

胡耀邦同志细心地听了我对上面情况的介绍后，又询问了我找到区党委以后的情况。我继续对胡耀邦同志说：

我与区党委的张霖芝等同志商谈后，他们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我就没有返回先遣纵队司令部去，而随区党委等一同行动了。当天晚上，区党委、先遣纵队、津浦支队、青纵三团都顺利地过了黄河，到了大峰山。那时从济南到开封一段是黄河的故道，没有水，我们是徒步过去的。第二天早晨几支队伍都到大峰山集合了。

最后，胡耀邦同志告诉我：“你把整个经过情况写一写，写好以后你亲自送给彭真同志，他负责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并叮嘱我要着重把穿便衣的问题说清楚。

当天，我就把经过情况写好送给了彭真同志。在动笔写报告时，我回想了那次穿便衣的过程，觉得找张霖芝同志等商量行动计划，还是积极负责的，但穿便衣就考虑不周。因此，我在报告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次穿便衣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彭真同志看完后，笑着对我说：“这不能说是历史上的污点，只能说是一时考虑不周，好象一个人走路，一天走六十里地，一路很顺利，只是在中间被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接着他说：“毛主席说过，检讨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一检讨，不论什么事都把自己臭骂一顿，好象对自己骂得越凶就越好，那种检讨是不实在的。”

谈话结束时，彭真同志说：“你把事情说清楚了，这就

行了,不影响你出席党的七大。”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一伙为了要把我打成总后“最大的牛鬼蛇神”,竟出动了大批人马,到处搜集我那次穿便衣的“材料”。他们找了当时在先遣纵队当政治部主任的王幼平同志,王幼平同志在证明材料中把当时的经过说得很清楚,并声明从成立先遣纵队起,就和我在一起工作,行军打仗都在一起。“从来没有发现李聚奎同志有叛变投敌的迹象。”类似这样的证明材料有好几份,但他们就是不用,硬要我承认是“叛变投敌未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在中央军委批准的平反结论上写着:“关于所谓一九三九年在鲁西北投敌叛变未遂问题,是邱会作一伙强加给李聚奎同志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平反。”

## 迎 来 抗 战 胜 利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自开幕至闭幕适为五十天。在这五十天中,除了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的报告外,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云、彭真等同志还在会上作了发言。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同志、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朴一禹

同志被邀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七大开会过程中除听报告、发言,投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等以及二十多次全体大会外,大量的时间是小组讨论。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先由各小组提出名单,然后主席团以此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名单,交各代表团讨论后举行无记名投票,作为预选,最后主席团以预选的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的候选人名单交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这次大会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七大闭幕后,我仍回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这时从国际战场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九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这时,我军在东北、华北、华东以及华南各前线的部队向日伪军开展了全面大反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延安城都沸腾起来了,大街小巷,到处涌满了欢乐的人群,山上山下,锣鼓喧天、歌声一片。连我们这些年已四十上下的党校一部学员,也和年轻的同志一样,走出窑洞,涌向街头,庆祝抗战的胜利。我们白天参加群众游行,夜晚燃起焰火,有的学员甚至把自己炕上的席子也拿出来点了火。是呀!整整八年的抗战,中华民族蒙受的灾难是多么深重,全国军民付出的牺牲是多么巨大,如今,侵略者被彻底打败了,我们胜利了,在这胜

利的时刻，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那时蒋介石在依靠美国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进行谈判。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赴重庆。毛泽东等同志起程那一天，我们在延安的地委和军分区以上干部都到机场送行。当时大家都为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担心，但同时也被毛泽东同志那种履险如夷的伟大气魄所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 第十二章 解放战争前夕

### 奔 赴 前 方

日本一宣布投降，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下山“摘桃子”来了。还在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就连续发布了三道命令，要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我人民军队受降。十五日，他又令日军维持占领区的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对日本政府和战区内的日军下令，要日军只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

在此历史的转变关头，我党中央一方面令各解放区的军民向敌占区进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组织在延安学习的各级干部，迅速到前方去，到部队去，同那里的军民一道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些天，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人人准备迅速返回前线。彼此一见面，都是开口就问：“你到哪里去？何时动身？”

我是从一二九师来的，本想仍回一二九师去。不料有一天在王家坪见到林彪，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他去山东工作，要我也到山东去。第二天，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到山东工作。当我去找林彪联系出发的具体日期时，他告诉我：分配到山东工作的还有三百多名干部，现在都还没有动身。他要我负责带队，具体组织工作找中央组织部联系。我考虑到三百多人长途行军去山东，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一个人带队有困难，于是就去请示彭真同志，那时他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向他说明情况后，彭真同志说：“三百多干部由一个人带队确实有些困难，可以组成一个大队，设队长，政委各一人，下面分成三个中队，在干部中指定中队长、中队政委。这样就便于管理指挥了。”中央组织部按照彭真同志的指示指定当时中央党校的总务处长张明远同志当队长，我当政委。

九月初，我们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来到同蒲路时，发现日军在同蒲路沿线修筑的碉堡已被阎锡山的军队接收。为防阎军的袭击，我们在夜间悄悄越过同蒲路。十月初，到达晋西北三分区所在地。在那里休息了两天。正当我们准备继续东进时，三分区转交我们一份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文的大意是：林彪改去东北，即日飞往沈阳。因此你们一行也由去山东改去东北。我和张明远同志看了电报，虽然一时弄不清中央改变原来决定的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革命形势在飞速发展。我们向全体人员

进行了动员,并换发了棉衣,随即改道向北,经阳高于十月中旬到张家口。

张家口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在那里我们休息了几天,然后坐火车到怀来,下车后步行经四海镇到古北口。

那时,从四海镇到古北口一带,曾是日本侵略者长期占领的地方,日军在这里实行了极其野蛮的“集家并村”政策,把成千上万的人民赶入“人圈”。直至日军投降前夕,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当地的人民才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奴役掠夺所造成的破坏一时难于恢复,所以在我们经过这个地区时,看到的仍是荒芜的土地,破烂的村庄,贫困饥饿的人民,和衣不遮体的大姑娘。真是满目凄凉,惨不忍睹。这一切,激励着我们加快前进的步伐,去解放全中国。

此后,我们抵达京承铁路的下台子火车站。只见黑乎乎的列车躺在铁轨上,车头的烟筒不冒烟,车站上也见不到铁路工人,整个车站死一般的寂静。一打听是因为没煤,火车停驶了,工人回家了。我们找来了两名老工人,请他们把散在附近的工人找回来,设法把火车开动起来,送我们到承德去。工人们一知道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对我们很热情。他们用木柴代替煤作燃料,终于把火车开到了承德,时间约在十一月初。

当时承德是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的所

在地。程子华同志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克同志任军区司令员，黄火青同志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李运昌、詹才芳、陈奇涵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赵毅敏同志任分局宣传部长，吴德同志任分局组织部长，那时的冀察热辽地区包括热河省、辽西走廊、冀东和察东北的广大地区，处于华北和东北之间，是华北的一翼，也是东北屏障。日本投降后，这一地带是我们出入东北的咽喉要地，我们向东北输送部队和干部，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冀察热辽地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我们到达承德以后，就向程子华等领导同志说明我们一行是奉中央的命令到东北去的，请他们给予帮助。这时程子华同志告诉我们说，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占领锦州，眼下要经锦州到东北已不可能。他要求我们留在热河工作。并经分局请示党中央获得批准。这样，我们一行三百多人即在热河分配工作。我被任命为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张明远同志到行署工作。

## 古北口争夺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中央同国民党经过谈判，签定了“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对和平毫无诚意，他们参加和平谈判，只是缓兵之计。就在国共双方签署停战令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那天，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古北口的进攻。

古北口位于北平和承德之间，是两地之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日军宣布投降时，蒋介石就向其部队发出密令，称“承德、张垣乃重点国防的锁钥，务必收复”。一月初，我们得知国民党准备以第十六军的一个师，第二九军的两个师和伪治安军一个师，共四个师的兵力由李镜如统一指挥，从密云出发进犯古北口。这时，我军守备古北口的只有一个连，晋、察、冀军区令赵尔陆纵队由永宁地区出发，经五天五夜急行军，赶到古北口。途中，赵尔陆同志患病不能去前方指挥，军区领导令我代替赵尔陆同志去指挥这场战斗。一月九日我由承德出发于当天夜晚十二时达古北口时，整个纵队还没有到齐，纵队副司令员韩伟、杨梅生同志先行赶到了。这时，国民党的四个师已进到离古北口约二十里的地区。估计敌人知道我古北口守备兵力薄弱，明天（十日）必然会从正面沿铁路线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向古北口进攻，而且进攻的时间不会太迟。因此，我们决定将主要兵力摆在正面，待敌人向我进攻时，以突然猛烈的炮火打他个猝不及防。

赵尔陆纵队于一月九日夜十二点左右赶到古北口。赵尔陆纵队共两个旅五个团。一旅的一、二、三团是红军的老底子，战斗力很强，很能打仗，该旅旅长李湘同志是我在红军一军团一师当师长时二团二连指导员，他作战勇敢。二旅的四、五两团战斗力较差，第四团打过几次小仗，第五团全是新兵，没有参加过战斗。但是整个部队斗

志旺盛。经过几天几夜急行军,部队虽然很疲劳,但是顾不上休息,于当夜即隐蔽进入了阵地。

根据敌我双方情况,估计敌人在正面进攻受挫时,很可能以一部分兵力从石匣附近向东过河,绕到我左翼向古北口进攻。为此我令第四团在石匣对岸隐蔽埋伏,准备将过河来的敌人打回去。令第五团在古北口待机。

果然不出所料。十日上午八时许,敌人沿铁路线向古北口进攻,遭到我猛烈打击。敌即展开兵力向我连续冲锋,均被我击退。至下午一时左右,敌人停止进攻。

这时发现敌人从石匣方向搬运架桥材料,企图架桥过河向我左翼迂回攻击。我即令四团隐蔽,切勿暴露目标,严密监视敌人,待敌尖兵部队过河后尚未站稳脚跟时,即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全力出击,将敌先头部队消灭之。

下午四时许敌人开始过河,被我四团一阵猛打,已过河的敌人大部被我消灭,其余缩回石匣去了。

敌人在十日这一天,虽遭到我严重打击,但抢夺古北口的企图并未放弃。古北口西南约三十里的香水峪北面是一座高山,据了解,历来的战争,谁先占领这座高山,谁就打胜仗。十日黄昏前发现有军队从密云方向向香水峪开进。根据以上情况判断,敌人明天可能向香水峪北面的大山进攻,企图抢占军事制高点。如被敌人占去,古北口就难保。因此我便令一旅连夜从所在阵地向右移到香水峪附近敌人进攻的右侧,准备在适当时机侧击敌人。我冀东

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指挥四个连队担任从香水峪正面阻击敌人。另令二旅第四团移到古北口以南正面原一营阵地上，临视正面敌人。令二旅第五团进到石匣河对岸，虚张声势，进行佯攻迷惑敌人。

敌人从十一日上午九时许开始向香水峪攻击前进。于十一时左右占领了香水峪及大山脚下沿线我之阵地。曾雍雅同志指挥的四个连撤到大山的半腰中间继续抵抗进攻之敌。

这时敌人已发现我一旅在他进攻的侧面，同时郭天民纵队已由四海向密云急进。敌人受我腹背夹击的威胁，即于下午四时向石匣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消灭了一部分敌军。

经两天激战，敌人死伤约二千人，我缴获各种枪支一百二十余支。我赵尔陆纵队发扬了艰苦奋斗，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战胜了两倍于我的优势敌人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军事要地古北口的任务。

我在古北口战斗基本结束后，就于一月十三日回到承德，向晋、察热辽分局和军区汇报坚守古北口的作战经过情况，第二天，乘飞机离开承德到北平接受新的任务。

## 第十三章 在北平军调部

### 初到北平

我离开承德，奉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的命令，到当时设在北平的军调部参加我方召开的各解放区参谋长会议。此行坐的是军调部美军提供的飞机。先期到达军调部的耿飏同志从北平专程到张家口和承德接罗瑞卿同志和我。

在飞机上，耿飏同志向我介绍了建立军调部的情况。他说，军调部是根据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而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设三个委员，由国共双方及美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其中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美国代表是饶伯逊，国民党政府代表是郑介民，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同志。三委员之下设三名参谋长，我方参谋长是罗瑞卿同志。此外还设若干个业务处，负责调处军事冲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送日俘日侨等日常工作。耿飏同志还说，目前我方在军调部最要紧的工作，一是抽调干部，迅速建立军调部我方组织机构，二是掌握各战区国共双方冲突的具体情况，以便同

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听了这些介绍，我不但对此行的任务有所了解，而且感到面临的斗争将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

飞机进入了北平上空，开始徐徐降低飞行高度，这时全城的景物尽收眼底，金碧辉煌的故宫，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耀眼的光芒，鳞次栉比的四合院，布满整个城区，更显得故都的古老。这是北平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后，我们即乘车进入市区，沿街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宪兵在街头四处游逛；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来回奔跑；堆满沙袋的掩体和架着机枪的地堡到处可见。街上行人很少，整个北平充满着紧张、恐怖和混乱的气氛。它同我从飞机鸟瞰下的北平是那么的不协调。这一切不能不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我们来到军调部我方代表团住所——翠明庄饭店时，已是黄昏了。整个房子空荡荡的，一打听，才知道军调部于昨天才开始进入协和医院正式办公。而我们是首批从战区抵达这里的人员。当天晚上，我向叶总参谋长报告热河方面的情况，他听完我的汇报说：“热河方面的情况以后再研究，各解放区的参谋长会议因人员没有到齐，一时也不开了。你先留在军调部工作吧。”我一听就有点慌，当即向叶剑英同志提出：“我缺乏做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不懂得外交斗争那一套，还是让我回前方打仗去吧！”这时叶剑英同志说：“在军调部工作也是在打仗，不过这是一种特

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的战斗,至于缺乏经验,搞一段时间就有了。”

接着,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了就不好改变;二是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三是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敌人钻空子;四是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

最后,叶剑英同志让我明天就开始工作——参加黄村调查。当时国民党代表说我军违背停战协定进攻了北平大兴县的黄村,要求派执行小组进行实地调查。我方为了表示履行停战协议的诚意和用事实揭穿国民党贼喊捉贼的阴谋诡计,就同意派遣小组到现场去调查。这样,我不但被留了下来,而且从第二天起就参加了军调部的实际工作。

## 黄 村 调 查

第二天上午八时在协和医院(当时协和医院停办,军调部临时借用该院的房子作办公室)军调部办公室,罗瑞卿同志把我介绍给一名佩带着少将军衔的国民党代表和一名佩带上校军衔的美国代表。当时我穿着我军旧棉衣,罗瑞卿同志在向对方介绍时称我为“李将军”。随后我们

三人各带一名翻译乘车出发，路过大兴县城时，在伪县政府停留了一会。这时，伪县长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向我们（主要是向我）讲了“共军”进攻黄村的情况，说我军在黄村打了仗，拆了房子，抢走了老百姓的东西。他说完后，我反问他：“你根据什么说我军进攻了黄村？”他说：

“有现场摆在那里。”这事，我在出发前就已经向我们掌握情报的同志进行了了解，知道在这一带虽然有我冀中游击队活动，但不可能到黄村去打仗。所谓“共军”进攻黄村，可能是敌人编造的假情况。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同他们进行争论，还是到“现场”看看再讲。随后，我和国民党、美国代表来到了黄村。一进村，就见到有一群老人、妇女和小孩聚集在路旁，一见我们到来就跪下磕头。这时国民党代表抢先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李将军，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向李将军讲。”我一看这一群所谓的“老百姓”，不伦不类，就没有理睬他们。接着伪县政府的人员领着我们到了村边，从地里拣了几个子弹壳，说这是八路军在这里打仗时撒下的子弹壳；还领我们看了一个平顶房子上面被扒掉的花墙，说这是被八路军拆掉的；最后又领着我们到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他们指着布满灰尘的炕席上和撒着一些旧书和花生皮的地下说，这是被八路军抢了东西的房子。看了这三处“现场”之后，我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他们说没有了。这时国民党代表就提出要回去，美国代表也提出要回北平去写调查结

果的报告。我看过这些特意布置的现场，心里更加有底了。看到他们都急于离开这里，想回北京去写出强加于人的报告，觉得必须当面揭露他们的阴谋。所以，我向他们提出：“现在不能走，要在现地判明真假才走。”并指出：“所谓八路军在这里打了仗的三件证据完全是假的。”他们听我这么一讲，一下都愣住了。原来他们以为我一路上很少说话，可能是默认事实了。想不到我会突然把问题提了出来。这时，那位美军上校耸了耸肩，不得不让我讲下去。我随之一一进行驳斥。

我说：“首先是村边的子弹壳，根本就不是最近的。”我拿出当时从地里拣起的子弹壳，递给美军上校，“你是一名老军人（当时他约有四十多岁），总知道刚打过的子弹壳是一个什么样子吧，而现在这些子弹壳，已经生了锈，少说也是半年前用过的。所以，说这是我军这几天打黄村撒下的，纯属是无稽之谈。”

“第二，所谓八路军拆了房子，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房子上面的花墙被扒掉了几块砖。根本谈不上是拆了什么房子。”我接着说：“如果说八路军在这里打过仗，那么留着这些花墙倒是可以作掩护，不需要把它扒掉。所以，这不是军队为了打仗拆掉的，那是那些毫无军事常识的人有意做的假象。”

“第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间房子里撒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被八路军抢过东西留下的现场，更是毫无根

据的。”（我们当时讲话就在这间房子里）我向他们指出：

“你们看炕席上的灰尘，均匀地布满全炕，说明是长时间自然落下的，而不是抢了东西留下的；地上的书籍和花生皮，则是有意布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间旧房子，而它对面的西房，里面家具整齐，房子很干净，还有一位年青妇女正在做饭。那个房子里的家具没有丝毫动乱的迹象。因此，这个八路军抢了东西的现场也是有意布置的假象。”

最后我向他们说：“根据上述情况完全可以断定，八路军根本就没有在这里打过仗，所谓在这里打仗、拆房子、抢东西以及那些村民的请愿，完全是有意制造的假象。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把问题明确后再回北京，否则，今天晚上不能走。”我这一番话，驳得国民党代表无话可说，美国代表见国民党代表不吭声，也泄了气。只好连声说：

“是的，是的”。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回到北京后，美国代表说：“我们写一个统一的调查报告吧！”我说：“写一个统一报告也可以，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做虚假的表面文章。”这时，国民党代表又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美国代表无可奈何地说：“既然你们双方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就各自写报告吧！”后来，我把实地调查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交给美国代表，而美国代表也把他自己写的报告给我看，他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基本上一致。

当天晚上，我就向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汇报了黄村调

查经过,肯定了那个现场是假的。汇报完之后,我即要求回承德去。叶、罗二位同志都不同意我走,并说:“你头一炮就打响了,现在执行部正缺人,你不要走,留在这里当执行处处长。”我说:“那不行,我实在干不了这个事。”这时罗瑞卿同志说:“你这次黄村调查不是干得很好吗!”我说:“黄村的事太明显了,随便去个人都能看出是国民党搞的鬼。”罗瑞卿同志说:“你不管怎么说,肯定走不了的,这样吧,你当执行处副处长,待宋时轮同志来后宋当处长。”我看没有商量的余地,也就没有再坚持要回热河。

## 正 确 的 方 针

我留下不久,从各解放区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陆续到齐,我方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健全起来。当时,我方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外,还有顾问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秘书长李克农。下设六个业务处,宋时轮任执行处长,耿飚任交通处长,陈士渠任整军处长,黄华任新闻处长,冯铨任秘书长,伍云甫任行政处长。

在宋时轮处长未到职前的一段时间内,执行处的工作由我负责。那时,在军调部的各项任务中,调处军事冲突是首要任务。因此执行处的工作是军调部的中心工作。它是整个执行部的组织计划部门,主要负责:制订军事调处的计划,派出执行小组,调查情况,总结经验。因此,

我那时每天都要参加三方执行处长会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打交道。

我第一次以执行处负责人的身分出席三方处长会议时，国民党代表在会上提出：山东在停战协议公布后，双方仍发生冲突多起，要求派出有三方代表参加的执行小组，到山东进行实地调查，以便解决当地的军事冲突问题。我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缺乏经验，就表示可以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到山东去。其实，那时是否派遣执行小组的问题，是国共双方代表斗争的重大问题。因为凡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利的时候，他们就强烈要求派出执行小组，企图挽救其不利处境。这次，他们要求派遣执行小组到山东去，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正当我表示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到山东去之后，随同我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计划执行科长雷英夫同志机警地离开了会议室，立即向叶剑英同志报告了我在会上所表的态度，请示如何处置，叶剑英同志当即指示，没有签字就不要紧，可以立刻否定现在就派执行小组的话。雷英夫同志迅速回到会议桌上，向对方提出：“参加山东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现在无人可派。”国民党代表说：“刚才李将军（指我）已经同意。”雷英夫同志立即反驳说：“李将军是说同意派，但并没有说现在就派。”我一听雷英夫同志的口气，就意识到他是请示了领导同志才这样讲的。随之我也改口说：“凡是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我们都要派出执行小组进行调

查处理,以履行停战协议,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向山东派执行小组的问题,因我方现在人员不够,没有人可派,待调来的人到了以后再确定什么时候去。”拖了几天以后,我方才派陈叔亮同志任驻济南第七小组组长,去处理山东的问题。

这次在三方执行处长会议上出现的问题,说明如何进行军事调处工作,如何处理双方军事冲突的问题,我们一时还没有完全明确的方针。

二月初,饶漱石顾问和罗瑞卿参谋长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军调部的工作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方针。据罗瑞卿同志从延安回来后向我们传达说,他们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中,当讲到国民党在军调部的国民党代表根本不讲道理时,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道理?你想要讲的话就是道理,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讲道理。当讲到在军调部工作的同志担心做不好工作,怕影响全局时,毛泽东同志鼓励说,你们尽可以放手工作,会不会影响全局,不在军调部。当请示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毛泽东同志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国民党提出的假情报,要坚决驳斥,顶回去。

在罗瑞卿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后,我方各级代表在同国民党和美国人谈判时我们就主动了,步调就更加一致了。也有了处置的办法了。以后叶剑英同志又对派遣执行小组的问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一是我军力

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攻;二是敌军集结的重点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敌军的调动;三是敌人可能用的港口,应争取派执行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四是敌人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执行小组,以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

当然,国民党方面也有他们的“原则”,这就是内战政策,用武力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加上有美国代表的帮忙,因此他们经常施展阴谋诡计,这样,表面上是“三方合作”,实际上是“两军对峙”,争论非常激烈。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我们利用“一致通过”的原则,即三方代表都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三方一致通过才能生效。我们利用这一规定,对我们有很多好处,它可以使我们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约束;遇到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合伙整我们的时候,可以使用否决权,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

经过半年左右的会谈斗争,军调部先后向全国派出了三十二个执行小组,另加三个特别小组(第二十三小组记不清了)。其中我方代表是:

集宁第一小组先是孙志远少将后是王再兴少校

赤峰第二小组先是段苏权少将后是向仲华上校

太原第三小组先是许光达少将后是陈赓少将

徐州第四小组先是王世英少将后是韦国清少将

张家口第五小组先是易耀彩少将后是赵尔陆少将

沁县第六小组刘建勳上校  
济南第七小组先是陈叔亮上校后是邝任农少将  
广州第八小组方方少将  
汉口第九小组薛子正上校  
新乡第十小组黄镇少将  
承德第十一小组先是陈伯钧少将后是段苏权少将  
石家庄第十二小组陶希晋少将  
大同第十三小组李波上校  
临沂第十四小组张子强上校  
德州第十五小组符浩上校  
泰安第十六小组华诚中校  
淮阴第十七小组韩念龙上校  
泊头第十八小组傅继泽上校  
安阳第十九小组雷任民上校  
南口第二十小组蔺子安上校  
高密第二十一小组武可久上校  
枣庄第二十二小组陆渭斌上校  
徐州第二十四小组王少镛少将  
安次第二十五小组张温钰上校  
朝阳第二十六小组李逸民上校  
沈阳第二十七小组饶漱石中将  
四平街第二十八小组耿飏少将  
本溪第二十九小组许光达少将

三十小组张经武少将

永年第三十一小组王育民上校

光山第三十二小组任士舜中校

以上各执行小组不是平行的,有的是中心小组,如承德第十一小组和沈阳第二十七小组都是中心小组;有的小组下面还设若干分组。

## 复杂的斗争

本来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的停战协议,全国一切军事冲突应即无条件停止。但从二月初起,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不断发动军事进攻。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攻占盘山、台安、辽中三城。三月下旬又攻占辽阳、抚顺、铁岭。随后,又乘苏军撤离东北之机,占领了沈阳、营口、长春、吉林等城市,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其间经我方再三要求,国民党虽然不得不同意派出执行小组到东北,但在我方代表到达沈阳时,国民党又百般刁难,无法开展工作。

当时,先后到达沈阳并准备任我方代表的有饶漱石(任东北中心执行小组组长)、耿飏、许光达、张经武、王首道和我。我到沈阳时,以上同志已先期到达。那时我随身带着一部电台,装在一个木箱里。出发前,听说先去的同志在沈阳机场曾被国民党军队扣留了好几个小时,后

经交涉才允许进入市区。因此,我担心所带的电台遇到麻烦。当我乘坐的飞机(美军运输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时,见机场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们不让我离开机场。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军警是来迎接从锦州回沈阳的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熊式辉的。这时,我趁他们不备把木箱搬到来接我的汽车上。国民党军警送走熊式辉后,见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很简单,就让我走了。就这样,我把电台顺利地带到了沈阳。

在沈阳时,我方执行小组代表和全体工作人员约三十人都住在友谊饭店。这个饭店是日本侨民开的。人员很复杂,除从经理到招待员大部分是日本人外,还有妓女、酒徒、赌棍以及国民党军官、日本特务出入其中,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执行小组大部分派不出去,因此我们整天住在饭店里。为了加强防范,李立三同志(由东北局派到中心执行小组任政治顾问)指定我任党支部书记,做全体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规定我每天要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当时,有的同志思想很麻痹,认为日本的招待员不懂中国话,说话很随便,有的还随便和日本女人接触。李立三同志就经常提醒全体人员注意保守机密,检查自己的行为,防止敌人钻空子。但有的同志还是很不注意,有一名由华东军区调来的译电员,就因为违犯纪律,多次单独同日本女人来往,被送回华东军区处理。

五月底,我从沈阳回到北平汇报工作。我一回到北

平，罗瑞卿同志就派我到热河去处理执行小组的问题。

当时活动在赤峰地区的我热辽纵队于三月中旬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争夺凌源的战斗。为此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派执行小组去进行调处；同时，国民党还要我们的游击队从建平县撤出来。建平是我们游击队的根据地，而且是个战略要点，我们是不能撤的。但当时任赤峰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的一个姓陈的同志，却在双方的协定上签了字。

我们历来的原则是：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为了改变原来的协议，我方把陈同志调走，并成立朝阳执行小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负责处理赤峰的问题。同时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脱离接触。为此，美国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我这次回承德，原来是准备单独乘飞机去的。可是出发时，同机前往的还有一名国民党少将和一名美军上校。一上飞机，他们就声称此行是为了解决赤峰地区问题的，问我是不是负有同样的使命。我回答说，我家属和孩子都在承德，是回承德看家属和孩子的。

我们三人在承德下飞机后，他们两人住在承德交际处，我住在冀察热辽军区。第二天一早，美国代表就打电话找我，让我去同他们见面。我没有去。第三天又继续打来电话。我考虑我是执行处的负责人，完全推辞不见不好，因此就答应见一次面，但我提出只是和美国代表单独

谈话，他答应了。

我到了交际处，一见面美国代表就说，热河执行小组你我双方代表都很不得力，现在你来了，我们应该共同到赤峰去一趟，解决那里的问题。我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这次回承德，我的上级并没有赋予我解决热河问题的任务，所以，我不能同你们到赤峰去。他提出，如果我不能去，就应该请承德中心执行小组的段将军（段苏权同志）去。我说，段将军是承德执行小组的，其任务是管承德地区，不便离开承德。他提出，那么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好吧。我说，互相交换意见是可以的，但不能在这里谈（当时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个会议室，而在会议室里谈话，就会成为正式会议，按规定是要作记录的），我们是个人谈话，还是到你的卧室里去谈。他见我坚持不在会议室谈，也就同意了，并笑着对我说，你们共产党向来办事机谨，真是名不虚传。

在美国代表的卧室里，他首先提出我在赤峰地区活动的黄永胜纵队如何违背停战协议进攻了凌源；我建平游击队又是如何破坏通讯和交通等。他问我知不知道。我说，我不清楚这些事，既然你提出了，我可以调查。这时我把话题一转说，但有一件事我是很清楚的，就是你们的代表野蛮地对待我方代表段将军。我接着向他提出，你们美国代表是来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但是你们偏袒国民党，甚至违背外交惯例拍桌子骂了我方代表，须知段

将军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你骂他,就是骂中国共产党,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总之,这次谈话,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各说各的理,最后不欢而散。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他们见面。

六月中旬,国民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并无理提出要我军撤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此时,停战谈判濒临破裂,我方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人员也逐渐收缩,陆续返回解放区。六月下旬叶剑英同志给冀察热辽军区来电要我回军调部去接替罗瑞卿同志任参谋长兼执行处长。但程子华同志要留我在军区工作,不想让我去北平。他向叶总参谋长写了信要求批准把我留在承德,继续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最后叶剑英同志同意了军区的意见,改调薛子正同志任军调部我方代参谋长。

## 第十四章 从东北到中南

### 撤 出 承 德

我继续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当时，我党为了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曾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项建议。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方针已定，对我党及其它各方面的和平要求一概置之不理，并从六月十五日起，多次蛮横地提出要我军退出陇海路以南、胶济路全线、承德地区、冀东沿海和东北大部地区，以及我军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全部地区，声称只有我党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才能考虑停止内战。国民党政府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我党坚决拒绝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首先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从此，国民党政府就把空前规模的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政府为确保其战略通道北宁线的安全，集中了三个军的兵力，进入热河，而我军当时在热河的部队只有杨苏纵队和一些地方部队。敌人在军事

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占有很大优势。

七月中旬，国民党准备进攻热河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朝阳地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我方代表李逸民同志向军区报告说，他在叶柏寿火车站看见堆着许多美国罐头箱，经他询问铁路工人，了解到这是驻在锦州的国民党新编二十二师运来的供给品，说明该师可能从锦州调来进攻承德。与此同时，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我方翻译张天民同志，也从美国代表的翻译那里打听到，南京方面已经给国民党十三军的军长石觉下了命令，要他们在两周内准备好，夺取承德。

当时，军区的程子华、肖克、黄火青等领导同志和我们都感到局势严重。但也有的同志不大相信，说：“不会吧，和平谈判还没有宣告最后破裂，如果明目张胆地进攻，不就是内战吗？”但军区领导根据当时情况，认为敌人进攻承德只是时间问题。有备无患，我们应该早作准备。随即对敌情进行了研究分析，估计敌人可能从锦州方向分三路进攻承德，一路（主力）从叶柏寿，沿凌源、平泉西进，向承德正面进攻，一路从赤峰以南向隆化围场进攻，一路从平泉以南经冀东向西推进。据此，我们对部队作了相应的部署。

但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没有来。这时为了加强张家口  
的防卫力量，杨苏纵队奉令调回张家口，肖克同志也离开了冀察热辽军区，由程子华政委兼军区司令员。承德地

区的部队除热辽纵队在热辽地区阻击向赤峰进攻之敌外，军区直接掌握的只有周仁杰一个旅，兵力极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固守承德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国民党十三军于八月下旬进攻承德时，我军在阻击给敌以杀伤后，于八月二十八日主动撤离承德。

我军撤出承德后，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转到农村和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乃林战斗，歼敌一部，后又继续攻打宁城、建昌，全歼守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随后我军为避敌锋芒撤到赤峰、林西地区，继续与敌周旋。

## 去东北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们撤到林西后，我和黄欧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易秀湘（省委贸易部长），根据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去东北工作，于十二月底到达白城子，见到了吉辽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邓华同志是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时红一师第二团的政治委员，我们从长征途中分别之后，算起来已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战友久别重逢，彼此都格外高兴。那时已临近一九四七年元旦，邓华同志热情地招待我们，并要我们留在白城子，在谈笑中他说他要建议让我在这里当司令员，他当副司令员。我为邓华同

志的真诚所感动，觉得应该赶快离开这里，便对黄、易二同志说，这里的主人过分热情，我们不能久停。这样，我们没有等过元旦，就乘火车去齐齐哈尔了。

当我们抵齐齐哈尔时，适逢中共西满分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成立西满军区。我们一到，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就让我们参加会议，随后经分局请示东北局批准，把我留在新成立的西满军区任参谋长。当时西满军区下辖五个分区和两个师。黄克诚同志任司令员，李富春同志任政治委员，倪志亮同志任副司令员，张平化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陈沂同志任副主任。

西满军区成立时，东北我军正进行着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这是一次对东北局势有着重大影响的战役。当时东北敌军妄图利用松花江这一天然屏障，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歼灭”我军的计划。其目的是先取得他们已占领的松花江以南地区的巩固，尔后集中力量，转兵北上，进攻北满我军，最后占领全东北。这时我军在南满根据地虽然只有临江、抚松、漫江、长白四个县，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我军坚持南满，不但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且可以使敌人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如果失掉南满，敌人便可集中全部兵力向北满进攻，那么整个东北局势就会发生于我不利的局面。因此，民主联军司令部利用松花江封冻的有利时机，和南满敌军分散守备的弱点，从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春，连续三次

集中优势兵力,跨越松花江出击敌人。我军这种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战法,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顾此失彼。从而把敌人的“南攻北守”,变为我军的南北夹攻,不仅巩固了我军在南满的阵地,而且在运动战中歼敌五个师。

继“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之后,我军于五月向敌发起夏季攻势。这次进攻历时四十九天,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城镇四十余座。东北敌军从此开始被压缩到中长路及北宁路的少数据点上。

为了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东北我军又于九月中旬,以九个野战纵队的兵力向敌军发动秋季攻势。大规模的部队投入战斗,要求有强有力的后勤机关及时地、充足地提供物资保障。为此,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于一九四七年发动秋季攻势之前扩大为后勤司令部。原西满军区机关和新成立的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合并。原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原民主联军后勤部部长钟赤兵同志为副司令员,杨至成为副政治委员,我为后勤司令部参谋长。我由军事指挥员改做后勤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个时期,我民主联军经常转战于中长路以东和以西广大地区,为使后勤工作能够跟上战争需要,一九四七年底,又分别组成东线和西线两个后勤司令部,东线后勤司令部由周纯全同志任司令员,西线后勤司令部由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样,部队在中长路以东打仗时,后勤保障工作由东线后

勤司令部负责,在中长路以西打仗时,后勤保障工作由西线后勤司令部负责。

当时我们西线后勤司令部驻在吉林省双辽县的郑家屯。郑家屯是双辽地区水运、陆运的交通枢纽,方圆几百里的货物都经这里集散。据县志史料记载,一九〇八年,张作霖为清廷收编后任前路中路巡防营统领时,曾被奉天总督徐世昌派驻郑家屯。可见郑家屯并非一般市镇。我们将西线后勤司令部设在这里,对于及时地向前方作战部队运送给养和作战物资,确实起到了很好作用。

## 在东北野战军后勤部

一九四八年秋,我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同年八月底九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撤消,分别组成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同志兼任部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由钟赤兵同志任部长,周纯全同志和我任副部长,下设参谋、审计两个处和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并统管五个分部。

此时的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军十分有利。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虽然还有四十四个师,共五十万人,但已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岛”上,所占土地仅有整个东北的百分之一,且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充满失败情绪。

其主帅虽一易再易（由杜聿明换为陈诚、由陈诚又换为卫立煌）也没有“挽救危局”。而我东北野战军则发展很快，到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已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及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优势。那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抓住东北这一有利时机，把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战役放在东北战场，并指示东北野战军暂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以切断东北敌军与华北敌军的联系，把蒋军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早在锦州战役之前，就在哈尔滨召开的一次全区后勤工作会议上提出：建立统一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物资的最低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我军能够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规定后勤各项工作任务，表明我军的后勤工作已经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锦州战役前夕，我率西线后勤司令部（此时已改为第一分部）先由郑家屯移驻阜新，为前线部队筹集作战物资。开始，作战物资大部分是由铁路直接运送到阜新集中的，后来敌军占领了彰武，从阜新到齐齐哈尔的铁路线中断

了，这样由齐齐哈尔方向运来的物资，只能运到彰武以北地区，然后再用汽车转运到阜新。后来敌人又进到离阜新仅十五里地的东南山上，我们一方面把机关人员撤到离阜新三十里的旧庙地区，只留下供给部在阜新，一方面派一个班（当时在阜新的战斗部队只有一个排）到前面担任警戒，监视敌人。我每天晚上到阜新去一趟，检查作战物资的运集情况和侦察敌人的动向。

大概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林彪带领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路经阜新去义县，他们乘坐的火车在阜新车站停车休息时，我到车上向刘亚楼参谋长汇报作战物资准备情况，他告诉我说，这次打锦州，是林彪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才下决心打的。你们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搞好，要保证前方作战物资的及时供应，这对能否打下锦州是个关键。

经过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后，我军于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动总攻。十五日，即攻占锦州，仅用三十一个小时就全歼锦州十万守敌，活捉敌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

锦州战役是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首次进行的大兵团攻坚战。这一战役的胜利，从后勤保障工作来说，也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东北有着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那时东北不仅工业生产为全国之冠，而且有着不少闻名的产粮区，粮草十分充足。当时毛泽东同志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文中曾指出：“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

论，东北占第一位。”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客观条件。其次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是弱的，然而不到三年，我军却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和我们在东北动用正规部队进行剿匪，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抓紧政权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东北广大城乡，到处都可以看到青年踊跃参军，群众积极支前，党政军民齐动员的热烈场面。由于各方面支前参战的力量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动员，所以，我军的后勤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拿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吧，我们在阜新时，由后方运来的大批物资停放在车站上，我们派不出部队去看守，但车站上的工人就自动为我们看守了，如果不是群众得到了充分的发动，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第三，我们使用了比较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兵团作战，要把原来分散作战的部队，集中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需要后方大量的物质供给，而这些作战物资的运输和储备，只靠人扛肩挑，马驮车推，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很好地组织和使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锦州战役中弹药、粮秣的运输，就尽量利用了东北纵横各地的铁路，并不断扩大了运输部队，增加了汽车团。第四，各级后勤机关应尽可能地接近前线。打锦州时，我们后勤部就由哈尔滨移到离前线只有一百公里的阜新，既便于及时了解前方的需

要，也便于迅速补充部队各种物资的消耗。总之，锦州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我军已由过去作战物质主要“取之于敌”，变为主要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了。

## 大 军 入 关

我军在攻克锦州十七天之后，东北就全部解放了。此时全国其他战场，也捷报频传。随着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我歼灭，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所部六十万人已成惊弓之鸟，或守或逃举棋不定。中央军委为了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解放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命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提前入关，会同华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在东从山海关，西到喜峰口的长城线上，浩浩荡荡，迅速隐蔽入关，在华北野战军的协同之下，首先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在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平、津、张一线各点之敌包围以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击次序和“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得漏网”的作战原则，对被我们包围之敌发

起攻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我军在扫清了天津外围据点,完成了攻城准备后,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拖延我军攻击时间,派人与我谈判。我军劝其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但陈长捷提出“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无理要求。在此情况下,我军于一月十四日对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经过二十五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八十六军、六十二军两个师、九十四军一个师及其他新编师团共十三万人,活捉了陈长捷,于一月十五日解放了天津。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野战军后勤部包括五个分部由阜新移驻山海关、秦皇岛一带。攻打天津的一切作战物资都是由东北运到这里集结,然后转送前线的。总攻前夕,我从秦皇岛到天津附近的杨村(当时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驻在这里,肖华同志任炮兵司令员),了解各种作战物资的供应情况,肖华同志满意和自信地说,我们要什么炮弹就给了什么炮弹,要多少就给了多少,有求必应,按时送到,现在炮弹堆积如山,敌人的工事再坚固,也经不起我们几百门大炮齐轰吧!天津解放后,后勤部移驻天津市,钟赤兵同志调任特种兵政治委员,我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由东北野战军改称)后勤部第二部长,周纯全同志为第一部长。这时四野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在北京养病,他把我叫去,告诉我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四野主力即将南

下,而四野机关和各军的勤杂人员,包括家属小孩,都留在天津,人数很多,必须把他们安置好,使前方人员没有后顾之忧。他要我留在天津负责此项工作。这样大军南下时,我便留在天津负责后方人员的安置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去汉口。我到汉口不几天,即八月上旬,长沙和平解放,我带四野后勤部的四分部,到长沙筹措打衡阳和进广西作战物资的准备工作,参加了湖南省委的支前委员会。正当我们为进军广西的物资筹备夜以继日地进行紧张工作时,我的牙齿发炎化脓,腮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不得已只好请假回到汉口治疗。回到汉口的第三天,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的喜讯,候时间,整个机关沸腾起来了,大家涌向街头,同全市人民共同庆祝,共享欢乐。我因牙病未愈,只是站在楼上凭栏眺望,看着街上一队队红旗飘飘的游行队伍,听着从江面传来一阵阵汽笛声,激动、幸福的眼泪不由地夺眶而出。我们几十年为之奋斗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的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 第十五章 迎难而上

### 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三兵团为主组织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任务，并决定将我由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负责组织后勤机构，筹措战备物资。

八月初，在我即将离开汉口前往沈阳赴任的时候，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路过北京时到总参谋部去一趟。我到达北京后，立即来到中南海聂荣臻同志的办公室。聂荣臻同志对我说，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准备派部队入朝参战。部队出国作战，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都要在国内完成。目前，东北军区没有后勤机关，为了后勤工作的前后衔接，我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建议让你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部队如果入朝参战，东北军区和参战部队的后勤工作都由你统管起来。毛主席已经批复同意。我感到这个任务很艰巨，必须争取时间尽快做好一切

准备工作，就没有在北京久停，很快赶到了沈阳。

我到沈阳后，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聂代总长关于组织东北军区后勤部（以下简称“东后”）等工作任务的指示，尔后，立即着手组织军区后勤部。八月七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正式成立，副部长是张明远和苏焕清，副政治委员是张济民。

八月下旬，我去北京向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汇报请示工作。在具体研究物资筹措和人员编制等问题之后，我建议，将已经筹措的物资先期运过江在朝方隐蔽起来，以保证部队过江后及时供应。杨部长认为这是个大问题，需要向周总理请示。我们一起找到周总理向他汇报。周总理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想法很好！不过我们这次是出国作战，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重大。部队什么时候过江？仗什么时候打？现在还说不准。为了保密起见，物资先不要过江，但要抓紧时间积极尽快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接着，周总理对东后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逐个做了明确的指示。他特别叮嘱我们，要利用战前的时间组织干部学习政治和业务，抓好培训后勤业务骨干的工作。

九月，东后第一分部建成，驻在辑安。东后机关也逐步健全。张平凯同志任东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关靖寰同志任参谋长。当时，东后的许多干部都是由东北局、东北军区从地方党政机关和军区所属部队机关调来

的，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同志也被派到东后担任政治委员。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迅速摸清了东北地区的物资情况，并派出张明远副部长带领赴朝先遣组对朝鲜战场进行了实地调查，还把大批作战物资分别储存在丹东、集安、凤城、通化、本溪、梅河口、沈阳、四平“四线八点”。

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后，于十月一日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犯，美国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边境城镇和村庄。在这紧急时刻，党中央果断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决定以东北行政区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调度指挥、负责保证。

命令一下来，后勤准备工作更加紧张了。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很快成立，并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同第一分部先后开赴朝鲜。我们又部署调整了通往朝鲜的兵站线，使作战物资沿兵站线作纵深梯次储备。

此时，后勤干部很少，技术力量更加薄弱。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从全国、全军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和司机。为此，毛主席曾亲自在电报文稿上批示：“此事急如星火。”

十月十一日，我们按照命令开始向朝鲜北部突击运送各种物资器材，火车、汽车一齐出动，到二十四日第一次

战役前,已经将大批作战物资运过江去。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敌机轰炸、运输工具不足等原因,运送物资的预定计划没有能全部完成。

就在开始运送物资后的不几天,我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见面,他就要我汇报情况。我讲完后,他对我说:

“我们这次是出国作战,同过去在国内打仗可不一样了。在国内打仗,作战物资是就地筹措,可以取之于民、取之于敌,这次可是全部物资都要从国内运过去,我们的对手绝不会让你顺利地送过去,你的预算要大一些,要有个预备数,要准备至少损失百分之二十。”我回答说:“我们已经有所准备。”彭总又说:“志愿军过江作战,要是没有弹药,没有饭吃,我可要找你算帐!怎么样?能不能保证?”说着,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立刻回答:“一定保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知道能保证到什么程度。”他一听就火了,用手指着我抬高了嗓门:“仗还没打,你怎么就保证不了啦!”因为是老首长,我很了解他的脾气,也跟着提高了声调说:“不是我不保证,我在拼命往前送!可是我的四百辆汽车才用了三天就损失了一半。”听我说完,他停顿了一会便说:“困难是不少的,但要用一切办法去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向上反映,我也想办法。可是有一点,作战物资是一定要保证的!”

时间紧,困难多,我们的工作特别紧张。苏焕清副部长兼任军需部长一直在下面跑,张明远副部长和东北人民

政府农村部部长杜者衡带领东后前方指挥所（简称“前勤”）随志愿军领导机关入朝了，东后的领导同志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机关。机关的干部也很少，这些同志大部分年纪轻，干劲足，积极性高。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吃住都在指挥部，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

## 确保战争的胜利

十月十九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向预定地域开进。二十五日，与北上之敌遭遇，从而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自此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上旬，我志愿军接连进行了三次进攻战役，稳定并扭转了朝鲜战局。在这初战的三个月中，我们的后勤工作遇到了十分严重的困难。

首先是作战情况复杂多变。志愿军入朝前预定组织阵地防御，出国后，由于敌军迅速北犯，战局急剧变化，我军随即改变决心，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这样一来，我们后勤工作就根本不能按预先计划进行了，许多新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战役连续紧张，战役间隙时间短；部队战术手段多变，前伸迅速，运输线急剧延长；入朝参战兵力猛增，后勤力量增长不大。这些都使后勤保障任务大大加重。

其次，气候、地理极度不良。这时正值隆冬，气温低

寒，傍山、盘山公路常常为冰雪填塞；朝鲜半岛三面临海，地形狭长，道路布局既不利于由北及南的供应运输，又不便于东西两线的相互支援。

再次，敌人依仗海空军优势，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作为其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初期，敌人投入各型飞机一千一百架，以后又有增加，对我运输线造成巨大压力。

面对种种严重困难，我们充分调动全体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及时研究掌握后方对敌斗争和自然危害的规律，千方百计提高运输效率，组织跟进保障。

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后勤力量。在第一次战役后，新组建了第四分部，并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其他三个分部。到一九五〇年底，后勤人员与出国时相比增加了三倍。在三次战役中，我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部署调整，做到了部队每有前伸，后勤部署也相应前伸。

同时，我们也改进了保障措施、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为了对付敌人的破坏，把主要工作转入夜间进行；在后方供应物资不能按照作战要求及时运达前方的情况下，各分部实行重点供应；发动全军动手做后勤工作，各部队都加大了携运行量，充分利用战场缴获；动员国内民工支前，在后勤系统执行任务的民工达三万五千余人。

第一次战役以后，为了解决由于敌机轰炸和夜间作战部队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我们提出向部队供应熟食和炒



子不知被什么垫了一下，随之车子猛烈颠动，我只觉得腰部突然一阵剧烈疼痛，接着便昏厥过去。后来才知道是骨折。醒来后，我的腰部疼痛难忍，无法行动。这时天色将明，我们只好决定等到晚上再走。我们把几台汽车伪装隐蔽起来。白天，我们一直藏在山上，只见敌机一趟接一趟地沿着公路围着山头飞行侦察，发现一点可疑迹象，立即俯冲轰炸。敌机俯冲时，低得紧擦树梢，车上的伪装被掠起。我们的一台大汽车不幸被敌机发现打中。等到天黑，我们继续行车，到达“志司”。

这是一个山沟，大家全住在山洞里。彭总一见到我就问：“你怎么了？”我说：“被车子把腰颠了一下。”他马上说：“没有把你颠死，算你命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围着我看，又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腰部，这才认真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吧，夜间行车要开着灯走，这样走得快。开灯走被打中是个死，不开灯翻了车也是个死，反正都一样！我就是开着灯走。”说完，他又笑起来。我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

我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还谈了这一路的感受。他边听边问，了解得很详细。谈到后来，他问我：“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些什么想法？”我说：“我有个建议，已经想过一段时间了。”他说：“那你就讲一讲。”我说：“仗打到现在这个程度，东后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今后还不知道仗要打多久，是不是能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

部?东后管国内,志愿军后勤部管国外,由东后把物资交给志愿军后勤部,再由志愿军后勤部负责分配。”彭总眉毛一扬,把手向大腿上一拍,连声说:“这样好嘛!”略微一顿,他问我:“你看志愿军后勤部由谁来当部长好啊?”我脱口便说:“当然是洪学智,实际上他早已经在管了。”彭总说:“对!洪学智这个人很能干,我向军委反映。”我在汇报时还提到,为了保证运输,应该对后方兵站加强防护,最好能配置高炮部队,我们不能只是藏,还要打。彭总连声说:“要打!要打!”很快,他就对此作了部署。

第四次战役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四月二十一日结束。紧接着,第五次战役在四月二十二日又开始了。在这两次战役中,第二番部队入朝,人数成倍增加,使供应任务也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春泛,道路泥泞,汽车运输效率很低;战役间隙极短,后勤在战前几乎没有直接准备的时间;部队作战形式复杂,攻防交替,战线伸缩突然;敌机数量猛增,从原来的一千一百架增至一千七百架。这一切,使得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成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后勤史上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为了加强后勤力量,我们充实了领导机构。特别是前勤,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指挥能力和指挥手段的七八十人的组织领导机构。同时,分部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到第四次战役时,已经有了六个分部。铁道兵、

工兵及高炮部队也相继入朝,加强了后方对敌斗争。在这期间,后勤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仅前勤系统就达十三万余人,加上配属单位共有十八万多人。志愿军后勤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由多兵种多勤务组成的合成大军,初具现代化后勤的规模。

为了适应部队作战的要求,我们固定了三条兵站线。到第五次战役时,已基本形成了四条固定的兵站线。在划分后方地域和路线的同时,统一调整了后勤部署,连点成线,并实行“分段包运”制度,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汽车每晚行驶距离,由入朝时的三四十公里提高到一百多公里。我们还实行了供应站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运量和运力的矛盾,保证了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的衔接。

为了避免和减少由于敌人特别是敌机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广泛建立了防空哨,在前勤所辖的二千多公里运输线上设置了一千六百多个防空哨位,形成了一支万人专业大军。这些防空哨逐渐发展成为既能对空监视,又能执行指挥交通、维修公路、救护车辆、清剿匪特、招待过往人员等多种勤务的机构。

在整个运动战时期,志愿军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地进行了五次战役,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我们后勤在战前准备不足、战时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作了极大努力,共向前线运送粮食十九万吨,各种枪弹二亿多发,炮弹六百七十万发,汽油二十九万桶,战救器材二百多吨

以及其他大批物资器材,收容伤病员二十万名,就地筹措粮食十二万吨,基本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在第五次战役之后,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防御战。在这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洪学智同志兼任司令员,周纯全同志任政治委员。从此,东后就不再直接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我一枚自由独立一级勋章。

一九五二年九月,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院长。我离开东北军区,到了北京。

## 后 记

我原来不准备写回忆录。一则因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是普通一兵,与许多老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相比,自己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感到没什么好写;二则自己参加革命的六十年里,所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党的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帮助教育的结果。因此,要写也应该写党,写老一辈革命家和为了革命的胜利早已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八一年退居二线后,得闲暇,许多同志鼓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出版社的同志也邀我写回忆录。他们说,这是老一代的历史责任。“责任”这两个字对我震动很大。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经历回忆出来,缅怀先烈,以励后人,的确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因此,我动笔了。

我始终认为,撰写回忆录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就会谬误流传。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本着凡本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作涉及,尽管是亲身经历的也不虚构,不夸张,以达“实”、“是”之的。

我出身农民家庭,七岁时读了一年私塾,虽说参加革命后,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写书还是第一次。加之所回忆的内容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即使查阅了大量资料,也

难免挂一漏万，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薄一波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我由衷地感谢。

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解放军出版社以及林华明、韩韵恒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李聚奎  
一九八六年二月

